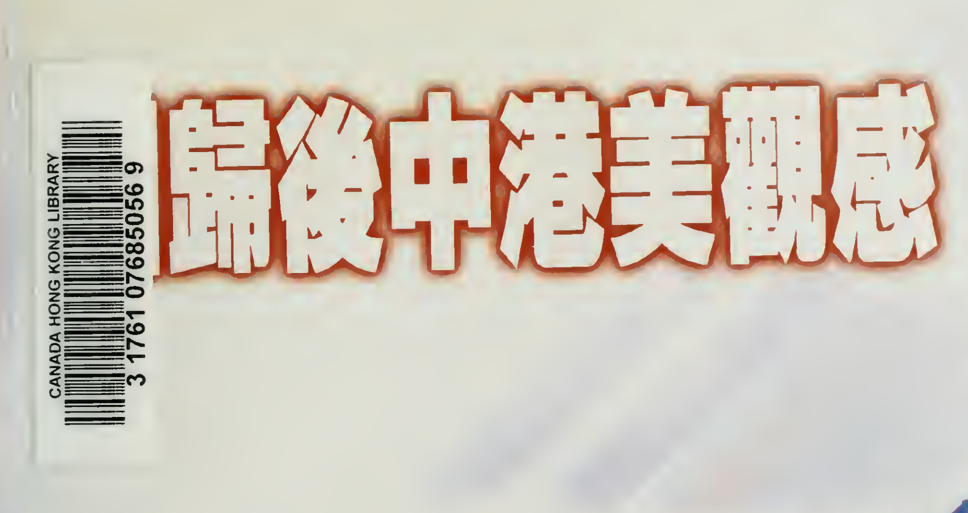


歸後中港美觀感

梁福麟 著

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



回歸後中港美觀感

梁福麟 著

廣 角 鏡 出 版 社 有 限 公 司

書名：回歸後中港美觀感
作者：梁福麟
出版：廣角鏡出版社有限公司
WIDE ANGLE PRESS LTD
香港灣仔莊士敦道195－197號八樓
7/F., 195-197, Johnston Rd., Wanchai, H.K.
Tel: 25753877 Fax: 28381079
發行：香港利源書報社有限公司
九龍旺角洗衣街245－251號地下
電話：23818251－4 傳真：23471519
承印：太平洋(永航)柯式印刷有限公司
版次：1998年8月初版
定價：港幣100元
書號：ISBN 962－226－433－6

PRINTED IN HONG KONG

目　錄

自序

這是我寫有關中、港、美三地的第六本書。書中文章原載在1997下半年到1998年上半年的「信報」。

自從香港主權回歸中國後，同時出現亞洲金融風波。有關題目筆者也曾被歐美傳媒（CNN，美國之音，英國廣播電台）訪問。筆者在美國大學任教和到中港兩地觀察，所見所聞也錄在書中。

本人雖被委任香港特別政府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本書所錄全是個人意見，不代表任何官方立場。

筆者向以下列人士的支持致謝：林行止，陳景祥，文灼非，練乙錚，黃麗君，馮偉光，陳鎮源，何秩生，蘇啓明，陳弘毅，湯維強。

梁福麟

南加州大學法學院

1998年7月20日



論投資心理學

筆者未進法律學院前獲心理學學士和碩士學位，從數十年投資經驗和觀察，和讀者分析投資心理學。

投資者不可和投資工具談戀愛，動眞情。筆者一位富甲一方的美國富商，住的豪宅，一天一個台灣大款，自動上門，出價四百萬美元，現金收購。當時是南加州地產炒風瘋狂期。筆者建議他出貨套現。無奈他夫人不肯割愛，因爲豪宅是她們數個子女長大的家園，不忍捨棄。結果地產價下滑，現在連二百萬美元出售也無人問津。

投資者切不可後悔當初。筆者一位朋友每當賣出股票後必定後悔股市上升，埋怨出貨太早。

投資不是打「政府工」，逢上班便有收入。花費在投資的精力不是和回報成正比。筆者建議這些投資者打份牛工，安份守己，存款銀行，定期收息比較心安理得。

投資者不宜跟大市走。董建華叫人不買樓，並不是你不買樓。投資是一個主觀性強的心理反應。尤其是年輕一輩，拿個學位，敬業樂業，在本行上力爭上游，也是投資的一種。公餘到大學校外課程聽演講，增加些投資專業知識，未嘗也是投資一種。世界上沒有不勞而獲，但有勞而不獲。因此有勞有獲已

是人中之王。從工作中獲利（包括非金錢的利益）最痛快。筆者認識的一個億萬富豪，生活平淡，一天工作廿小時，仍然努力不倦。

在投資前心中有估計賺到甚麼程度要收手，再重組。譬如在香港股票跌了30%，在海外股票增值10%，香港物業跌了15%，全盤投資今年是下跌。但倘若沒有資金週轉問題出現，應緊守崗位，靜中求變。

投資者應向有見識和不是賺取佣金的人多討論。懂得投資的人對賺錢之道不少樂於與人分享。向這些人請教適宜在大家空閒中交換意見和心得。這是日子有功的長期培養的交往。

改革政務官的訓練

筆者建議香港政府應慎重考慮以往「通才」式的政務官訓練是否值得修改。

英國外交部數年前而改變了招募以牛津和劍橋文哲科畢業生的傳統習慣，強迫外交官學習經濟、貿易、外語，務求使外交部更專業化，外交官不再是只談風月，徘徊「雞尾酒」會的常客。

美國軍官昇官要考試，軍部對研究學位甚注重。歷任總統參謀長不是碩士便是博士。筆者在史丹福大學的研究院，不論是胡佛中心或法商學院，碰到不少是現役軍人，更是軍方「明日之星」。不少是艦隊司令、指揮、修讀國際關係和亞洲研究課程。

筆者建議政務官在各階層上應增加處理事務的「專業」知識。不要是「半桶水」的通才。政務官走馬看花，穿花蝴蝶式的輪流變動部門雖然是有其政治目的，沒有建立「山頭主義」，沒有高官覺得沒有了他（或她）便天塌下來。但無可否認，出掌金融財政，不是靠天材橫溢便可立即成專家。

英美式的政治人物如議員或總統，他們也不是樣樣懂，但政府部門內高手如雲或國內有充足的智囊團，有問題出現，政

治人物可以收集專家意見，作出對策。香港政府內的政策科每個不是專家，因爲政務官是通才。

以前殖民地社會簡單，通才政務官可以應付自如。今天的社會，無論經濟與民生和國際社會有密切關係，不少知識是要專門性探討。

政務官的招務更應向專業或有高學歷和年資高的人吸取。讓他們能夠「挿隊」和加入專門部門。否則香港政府便是「外行領導內行」和國際日趨專業化背道而馳。

香港社會華而不實

筆者在史丹福大學法學院任教，碰到數位同道中人，也是有名氣律師，律師行高級合伙人，自動放棄高薪一年，到史丹福法學院任教和研究，充實自己知識。筆者在牛津大學法學院就讀，聖誕節也有資深教授回學院圖書館找資料。相信在香港這個華而不實的社會很難找到這些實幹派人物。

香港的政府諮詢機構，來來去去也是一少撮「大忙人」，除了本職外，應酬、跑馬、雞尾酒會、出席大小不同會議、大學董事會，那裏有空閒充實自己，冷靜地分析問題。筆者碰到的香港社會領袖，賢達對問題看法的湧淺和美國的有識之士比較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名氣和實學是兩件事。在香港，要求日賺數十萬元的大狀到大學細心研究一個問題數個月，難以登天。這樣的社會上行下效，如何製造出高科技，諾貝爾得獎人，大文豪或哲學家。當香港領導鼓吹如何提倡高科技化，筆者只能置之一笑。這回不是廖化作先鋒，而是「陳積作蓋茨」（ Bill Gates ）。

作爲學術重鎭，香港沒有條件。如果論薪酬，在史丹福大學任教和在小鎭無名學院相差不遠。但分別在追求卓越的學者並不是向錢看。同樣地，追逐名氣的「大忙人」並不是有空閒增

加知識充當顧問。

美國大學定期有「避靜」(Retreat)的安排，大企業首腦，政府部長和教授學者共渡周末，野火會，無拘無束地交換意見。

在中環、金鐘，追追逐逐快步跑的「大忙人」對社會問題、金融大勢，他們只見的是眼前的十碼，無怪筆者認識的美國「名校」港裔教授對香港沒有興趣。很簡單，香港沒有研究的氣候。

洋為中用的刑事專員

香港律政署的刑事專員（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聘用英國人，在中國領土上不是創舉。中國滿清政府簽下的不平等條約，除了割土賠款外，中國的海關收稅由外國人辦理，這是中國難忘的國恥。這些外籍海關人員從法理看是中國政府的公務員。同樣地，香港特區的外籍法官、律師、警務人員等一概是中國政府下一國兩制的公務員。

外籍人員受聘出現效忠和認同的問題，特別是處於政治敏感的職位。但香港卻是網開一面，洋為中用，在缺乏適合人選之中是務實的政策。

如果刑事專員算是技術官僚而不是政策官僚，他本身是否中國籍或懂得中文應該是不成問題。但是如果認為有個洋人在特區當官員便令國際輿論覺得香港是開放則較為牽強。

筆者預見在未來十年，香港的司法和法律界仍然依賴「外援」。同樣地香港的法律教育也是「洋為中用」的一個溫床。以往三十年在殖民地氣氛下培育的法律界仍然是以英為師，這是根深蒂固。但是將普通法完全「漢化」似乎是非不為也，實不能也。法律中文化可能是一個「死胡同」。

傳統智慧告訴我們普通法是不可脫離英文而仍然生存，等

如魚是不可在陸地存在。無形中是否能夠掌握英文技術高超的人永遠是站在英文技術較差的人頭上？這才是值得關注香港法制發展的人深思。刑事專員的任命只是冰山一角。

大學生加盟政府的動機

筆者任職的律師行和不同政府部門的辦事處設在同一大廈。在電梯上下班最慣常聽到公務員的嘆息：「眞好，今天又是星期五」，「眞倒霉，今天又是星期一」。似乎當公務員，上班是一件苦差。

筆者任教的大學有不少畢業生選擇到政府部門當律師。分析他們的動機，有以下三類：㈠外面經濟不景，風大雨大，唯有參加政府，有個鐵飯碗，待經濟轉好另作打算，這是「候鳥心態」。

㈡在政府部門學些特殊技能，將來到工商界另謀發展。在香港，以前田土廳的測量師不少轉任私營機構，學以致用外更懂得衙門運作。而且不少政府部門，朝九晚五可以兼讀些課程充實學歷。在私人機構，身不由己，看老闆面色，很難抽身進修。這些「過客心態」也是情有可諒。

㈢選擇政府工作爲終身職業。一些除了本身是專業人士如律師、醫生外，從政府工作學到的技能不是工商界大量容納，如當警察、政務官，他們的進升是在政府體制上爬行。一個人在政府工作超過若干年，耳濡目染，日子有功，自然形成了「衙門心態」。

試分析「衙門心態」的特點。內行有別，在大機構工作的僱員，日久便形成「機構形態」(Corporate identity)，「我是公務員」，「我是IBM」，「我是ABC銀行」。大機構的運作暢順依賴「各守崗位」不可行差踏錯。筆者一個同事曾任美國海軍當飛行員，軍隊中是鐵令如山，他在海軍十數年只懂駕駛一種飛機，每天訓練如何操縱，心無雜念，到退伍後才明白軍隊的「內外有別」特別之處。

「衙門心態」對外界的事物動態反應是有抗拒之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譬如在大學任教的教授，他們可以對任職機構評擊，但從來沒有在職公務員作對政府批評。由此可見就是在機構任職的人和政府公務員也有不同之處。

政府職位，只要忠於職守，不求有功，只求無過，便可以安坐釣魚船。在工商界，無論你才高八斗，一輪合併收購，愈是佔高位者愈是提心吊膽，沒有政府職位的安全感。就是在大學「不是提升便要出走」「up or out」令到中下層教職員在表現上下功夫。

不少任職政府的朋友最慣常是將自己的薪酬和商界比較。但不要忘記，在商界所承擔的風險是政府衙門中人難以接受的。正如一個當出入口公司的小老闆也是筆者的大學同學，他在天天擔心如何供養他在海外接受大學教育的「化骨龍」。

官高和寡

筆者在美國出席不少政策研討會，無論高官、學者、工商界濟濟一堂，交換意見。在香港似乎是高官制定政策在閉門造車。以前殖民地政府，一碰到難題，找些祖家權威作顧問，重金禮聘，肥水不流別人田。造成殖民地大學自形「二流」，英國高官永遠覺得祖家的月亮最圓。從此積重難返。今天的中國特區高官沒有建立有識之士的班底，自恃是今天管公廁明天管金融的「通才」，遇到金融危機，語無倫次，陣腳大亂，社會言論一致是高官和寡。

美國聯邦儲備局和政府財政部門博士級金融財政高手長期儲備專才，不少也是華爾街身經百戰的專家，猛將如雲。試問香港這班「通才」高官如何和跨國「大鱷」較量？

香港面臨的危機是如何知人善任。當格林斯平面對美國國會的責問，一言九鼎，他背後的「紅鬚軍師」已晚晚替他廢寢忘餐在「度橋」，正如跳芭蕾舞，「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工」。香港最多是「即食麵」專家，個個如陳積。但要費功夫，長期研究的「智慧團」學者非常缺乏。

當政府部門首長無料不是致命傷，但背後的班底一定要有專長，不可能完全依靠是大學二級榮譽，在衙門粢職的「通才」

學士。社會愈複雜政府仍然以「通才」作政策計劃人已不合時宜。

香港傳統的廣泛諮詢各界意見不切實際。各界的意見是以自己利益作出發點。第二，要當機立斷的危急關頭，不可能浪費時間諮詢。第三，不少政府策略有關保密，到履行前不可向外透露。因此政府部門應自設智囊團。而智囊團不可以用清一色的政務官。

地域投資風險

筆者引以自豪是數本拙著在寸金尺土租金昂貴的啓德機場書店發售。數位跨國投資鉅子也曾向筆者請教。現將心得和讀者分享。

小投資者最容易在股場，地產變成「大閘蟹」。投資風險的兵家大忌是將全副身家放在同一地域。正如亞洲金融市場的「骨牌式」的連鎖性失陷，是典型的例子。

中國儒家的因果循環在投資學上可派用場。中國的久合必分，久分必合也是同一道理。每一個市場都有週期性的起伏。有時按兵不動勝於臨危出貨。投資分散可在不同地域的循環高點出貨，低點入貨。

在未來一年是「有現金便是皇帝」的時代。當港元存款息口有9%至10%，小富由儉，大富由天。靠香港物業收租，回報率只得3%至4%極之不化算。在海外地產收租可能到5%至7%。但居者有其屋的必需條件，心理舒服也算是投資者的考慮因素。筆者建議將現金存港幣者適宜以一至三月爲期，密切觀察聯繫滙率的風吹草動。

朱熹治家格言：「勿營華屋」，「勿貪意外之財」，「居家務其儉樸」是至理名言。當富有時不可「魚翅撈飯」，當窮時「園蔬

愈珍饈」。掌握投資風險出自同一原理，不要因風險令到個人生活起居有重大的改變。泰山崩於前而面不改容，才是必勝之道。

筆者建議投資者應多讀書，多旅行，多聽講座，多發問，多看筆者拙作。不懂的要學，切勿投資自己一竅不通的項目。人家說中國大陸地產有利可圖便盲從跟隨。坊間傳聞炒金致富又跟風。

投資大師級人馬，整天埋頭苦讀上市年報，經濟刊物，走訪企業首腦。小投資者在資料上已吃虧。筆者勸喻他們不要放棄正職，連基本生活工作崗位也捨棄，更是不打自招。

再論政務官專業化

英國式的專業比較美國式是無師自通，注重在業中吸取經驗。美國式是有系統的訓練。譬如美國律師轉行任法官要參加在職前的訓練課程。美國國家司法人員訓練中心是一個龐大的學府，全國不同地方的法官，不同資歷的司法人員要參加培訓課程。英國式的法官，沒經過有系統的在職訓練，就是香港深資大律師只要被委任臨時大法官若干時間便認為有足夠經驗。

筆者建議香港政府設立公務員訓練學府。以往香港資深公務員派到英國皇家防衛學院（Imperial Defence College）或大學及美國如哈佛大學的肯尼地政府學院（Kennedy School of Govrenment）和清華大學應該繼續。在美國不少政策研究系替政府訓練人材，如上述肯尼地政府學院及蘭格中心（Rand Corporation）有博士級政府政策學位。

在師資方面，不少退休的公務員可擔任，政府架構以外的學者，企業人材也應邏致加盟，配合在職的公務員作導師。政府內部可設立研究部門。

在美國國會有獨立的研究資料中心（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s）向國會議員提供不少背景研究（background studies）。就是各州也有同樣性質的組織，譬

如加州議會有加州研究公司（California Research Corpoation）公務員專業化可提高士氣。從業員可得到公認的專業資格。特別是香港脫離英國統治後，公務員建立本地的訓練基地，可以有系統地訓練本港的公務員，更可在某程度上替中國訓練公務員，發揮一國兩制的精神。

A O 文化面面觀

社會學和人類學研究中有一「果心價值」(core values) 的概念。A O 文化可以說是牛津、劍橋學院休息室 (Oxbridge Common Room) 文化的延續。而牛橋休息室文化是英國公校 (Public School) 文化的延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香港殖民地總督，除了尤德外，每個都是牛津或劍橋畢業生，尤德畢業於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英國的傳統教育精神以訓練紳士淑女，全能全面人 (all rounder) 見稱。英國的法官、主教、外交官、政治家、軍官、律師在牛津或劍橋讀的是歷史、古典學 (Classics) 或政經。差不多絕無僅有的讀工程或醫學。香港A O的招募也追隨英國的步伐，以文法科取勝，理工者差不多是絕無僅有。當然也有例外，如筆者同窗鄺其志是物理學一級榮譽學士。讀者可翻查香港政府司局長級的資歷便證明筆者所言正確。

牛橋休息室文化特點在哪裏？尊重傳統，永不激烈進取。敬重長輩資歷，輕視銅臭。鞏固小圈子，內外有別。通才勝專家，培植下一代同樣的「果心價值」。

英國式的教育移植到香港，中學已分科，文科和理科在中四至中五已分家。在美國的大學則比較綜合。這樣的早期分科

對一個人的成長觀念有重大改變。ＡＯ一般對數字分析弱是無可避免。美國大學的商科入學，要求學生懂微積分，與工程系看齊。同樣，在美國研究經濟、金融、數學的根底要求甚高。筆者懷疑香港「通才」高官對金融和經濟的認識有多少？

正如同文洪清田在〈ＡＯ文化十四年衝擊〉一文（信報十一月二十七日）指出，ＡＯ派調在任何部門都在玩同一套ＡＯ文化遊戲。筆者相信這一套遊戲可能已不足以應付大局。

ＡＯ文化另一特點是好看不中用。正如英國的御林軍閱兵，法律年大巡禮，英女皇替國會開張演說，可說是風光大禮。講求實務效率的美國人已不承襲祖家遺風，除了當作吸引遊客拍照。

ＡＯ文化是否面臨重整？筆者相信是談何容易。「果心價值」是一個體制中最難改變的部分。

美國傳媒大革命

筆者出席一個由南加州大學傳訊學院（Annenberg School of Communication）院長高雲（Geoffrey Cowan）的演講大會。他的觀察敏銳，論點發人深省。

自從電子傳媒出現，阿貓阿狗也可自設「上網頁」（Web Page），不用依靠傳統報章投稿。全民皆可當作家，在「上網頁」大發謬論，根本不用理會甚麼是傳媒的責任，製造「煲水新聞」，政府也奈不他何。上網作家可以一派胡言，亦可以言之有理。網文可長可短，豐儉由人。

上網傳媒在現階段還不能取代紙章傳媒，但無可否認，紙章傳媒面臨銷路的壓力。新一代習慣了從電腦網落找尋資訊。加上紙章傳媒在收藏和保存方面極之不便。

在美國任何大學入學的學生要求在電腦運作上有基本知識。不少書籍已有「碟」式同期出版。有些會員名册已放棄了紙章式出版，只有「碟」式供應。

美國的書籍刊物市場龐大，不少歐洲出版商著陸染指，分其一杯匙。龐大的市場也構分銷網的複雜性。譬如，在電子傳媒網上如何收取廣告費是個頭痛問題。

電子傳媒也是競爭劇烈，財經「上網頁」也有六、七個台，

有免費，也有收費，任君選擇。

電腦業的技術改良，日新月異。而且不論硬件、軟件的折舊淘汰率驚人。

但是當科技日漸進步，教育的基礎還是傳統的閱讀和寫作是萬古常新。無怪不少「名校」仍然以保持學生的基本閱讀和寫作的高水準作爲招取新生的條件。

普通法在香港的前景

筆者最近重讀了一本由英美法律教授合著的解釋英美兩國普通法制度的異同（P. S. Atiyah與Robert S. Summers合著：Form and Substance in Anglo－American Law,1987年版，Clarendon Press出版）。

在現在和未來，香港在憲法上將自成一系統，鑒於香港有獨自的《基本法》，無論是原審法庭和上訴庭的法官，將面對不同形式的憲法問題作出闡釋。一般英國式訓練和在香港執業的律師，對憲法的闡釋毫無經驗。相反，美國訓練的律師在法院就讀時對憲法的認識很深。香港《基本法》的案例將來在海外的法律學界可能被有識之士批評，特別是香港的法律界和司法界習慣上以英為師，但英國沒有「成文憲法」（written constitution），香港可能無所適從。

英國式的法官習慣上是「指出法律如是」（What is the law），但對法律應該如何（What the law ought ot be）作出判斷則非常陌生。但在美國，不少上訴法官是法律教授，他們對法律的創新比較進取和勇於提新意見。

英國式的法官是執業大律師出身，對法律理論（legal theory）認識淺薄，但在憲法審訊中法律理論的影響甚巨，法

官要面對簇新的民生政治大問題作判斷。以筆者愚見，香港法官在這方面應走出英國的框框，向美國及其他憲法案例豐富的國家效法。

香港缺乏雙語認識的法官和資深律師，特別是訴訟大律師。在現行的制度下，很難見到有突破的情況出現。法律界是保守性強的行業，是金字塔式的運作。在未來十年，還是英語掌握香港法律界的命脈。

在大學教育中，如果香港法律學生的英文語言程度在下降，他們對深奧的普通法判辭的分析能力可能也每況愈下。將來接班的律師更是畫虎不成反類犬。法律教授如何才高八斗也難啓迪後進，因爲普通法的運作須依賴英文程度高的學生。

香港如何
改變自己的命運

筆者認識香港酒店業的高層人士，從海外旅客預訂入住酒店看，在九七年三月，他們預計在主權移交後的十月後出現大量空置房間，但預料不到的是東南亞及日韓金融及經濟危機，更是雪上加霜，難關重重。

以旅遊業計，香港是否值得一遊？筆者認識的歐美人士，他們到香港是順道到中國大陸或東南亞一帶。香港已不是購物天堂，而境內名勝有限，又沒有大型遊玩樂園如加州的迪斯尼樂園或北京的禁宮。

香港可以發展成爲國際會議或展覽中心。歐美不少大型專業年會，如全美律師或醫生年會也經常在國外舉行。因爲出席這些專業年會的旅遊開支可以扣稅，專業人士更樂意當作整家旅行的機會。

香港應儘量遊說跨國專業團體。但很可惜香港的專業人士對參加國際專業的活動興趣不大。以筆者認識，要鼓勵海外專業體團到香港舉行年會，首先要令團體的內務委員會同意。如果香港的專業人士對加入這些內務委員會興趣不大，不能從內部介紹香港，人家不會選擇香港。

其次，香港應發展本地作爲旅遊勝地，要依賴地域性整體

的繁榮。以往是日本和歐美遊客必經之地，將來可能是中國國內人到特區覽光的必定去處。以筆者熟識的學術交流計，香港是一個極具吸引力的地方。中國大學的招待處太簡陋，而香港在地理上及招待外賓的環境，比較中國優勝。

香港要改變自己的命運，不斷重估自己的價值才能從逆境中反敗爲勝。

我給董建華六十分

董建華接受美國公衆電視台（KCET）評論員Jim Lehrer訪問，董態度誠懇，有儒者君子之風，但說服力似乎不足。首先他說香港採用循序漸進方式發展民主，最後香港會達到全民投票。既然香港六百萬市民教育水準高、視野闊，爲何要他們等待？董建華不能自圓其說，若指香港人政治不成熟，對民主不熱衷，這就等如自打嘴巴。

在華盛頓，白宮對董建華的接待，有未盡全力之嫌；以一個代表六百萬人口的大城市政治首腦到訪，克林頓只給他三十分鐘，而處理方式極度低調，筆者總覺得美國朝野對特區政府仍然保持距離。正如筆者預料，香港的民主參選方式是美國極表關注的一環。

特區政府以「商人之心度政客之腹」，在極度政治化的華盛頓，特首是錯誤估計美國的外交政策，反之在紐約的財經界，對香港的看法比較和香港商界一致。但美國國會的一羣「自負甚高」的政治老將，只會將香港問題和他們的政治遊戲掛鈎，各自有「私人議程」。

華盛頓的亞洲獻金醜聞聽證會，也令一些參衆議員不敢和亞洲富豪及政客接觸過份親暱，正是瓜田李下，誰也不希望出

面支持由商人操縱的香港特區，遑論替其說好話。這是美國本土政治大氣候的影響。

董建華的公衆形象頗得體，但他的領帶太死板深色，在熒光幕上應多帶些笑容，可能他太顧慮美國人對香港民主選舉的敵對態度，表現緊張。他指出美國對香港的民主看法不同，但未能滿意解釋香港的民主循序漸進，如何配合香港的民主發展。

《華盛頓郵報》在董建華訪問同日刊登了李柱銘的文章，明顯地是和董分庭抗禮，給美國朝野一些警惕。董建華如果能夠當機立斷，應該在媒體上回應李柱銘的質疑，倘若他是彭定康或李光耀，更會爆肚反擊。有鑒於此，筆者只能給董建華六十分。

高官退而休則顧

不少金融財經或專業高薪僱員，在合約期滿後的一段時期（通常六個月至一年）不可和同類或具競爭企業服務，在法律上稱Restraint of Trade Clause（即「約束貿易條款」）。替政府工作的僱員除了普通法中合同法認為合理的約制外，政府可加上更苛刻的約束條款，譬如在退職後若干時間代不可以代表任何利益機構向政府部門游說活動。就是政府也不可禁止一個退職人員終生不能進行任何形式另謀高就的工作，否則是「勞役」制度。

高官之中以技術官僚如律師、工程師跳糟私營機構或重操故業，比較政策官僚容易得多。以前的律政司「洋大狀」退職後眷戀香港亦能執業賺到盤滿缽滿。政策官員如前布政司鍾逸傑也能成功地脫胎換骨在香港繼續幹活。丁布比在《末代港督》一書中有三處提到鍾逸傑，似乎近於冷言冷語，對鍾氏頗有微言。

筆者認為高官退休後，他們的專長不能賣給市場非常可惜，以往殖民地時期，退休的英官十居其九告老還鄉。但特區的港官，香港是他們的家園，現在六十五歲退休是壯年，若要繼續貢獻社會來日方長。香港的生活方式很難令人終日無所事

事，原則上高官退休應可以繼續就業。

但是政策官員如果在位期間，一雙後眼顧着未來的歲月，犧牲政府的利益作爲後路的安排，筆者認爲政府應該提防。

退休高官所出賣的是經驗和洞悉跟政府周旋的渠道。任何地方都有這些情況出現。正如罵彭定康最厲害的英國前駐華大使柯利達在退休後出任英商在亞洲貿易的顧問，穿梭中英兩國首都。美國商務部的談判專家一離職便跳槽到談判桌對方敵營當日本企業顧問，美國亦有退休政客當大公司「政府關係聯絡員」。天下烏鴉一樣黑。

董建華的國際形象

國際間從競選產生的政治領袖一般極關注自己的公眾形象。

戴卓爾夫人是英國第一位競選首相時聘用專人設計形象顧問，無論髮型，在電視的談吐和外表也預先進修教導和安排。列根總統前身是演員，對形象處理自然應付裕如。其他總統候選人的競選經理人其實也是形象專家。

董建華的「陸軍裝」髮型可說是另具一格，無可厚非。但他的領帶應該鮮艷一點，以打開他沉悶保守的「老土相貌」。

以美國總統克林頓和英國首相貝理雅作比較，董建華似乎給西方人士一個墨守成規的銀行家面貌。

國外的傳媒先「觀其貌」才「聽其言」。在答問方面，董建華也缺乏在不同場合用不同的處事方式。他的對答都是千篇一律的「按部就班」民主程序。

如何自保才是賣點

董建華的電視對答頗得體。但是缺乏開朗。譬如有評論家問他是否對美國人指三道四的批評討厭；他否認。事實上，從

人性言，沒有人喜歡人家批評。如果他承認了，還能夠和觀衆距離拉近一步。他可以說：「對，我們有我們香港一套。你們美國的觀點我們理解，但在現階段不能接受。」人家才覺得那是眞情流露。

如「滑浪式」的中美關係，香港的「夾隙地位」更形險要。美國對中國好，香港好；美國對中國不好，香港如何討好？當然，香港人不希望見到中美關係重回到冷戰期的僵局。但是在大氣候的壓力下，香港如何自保，發揮國際經濟動脈中心的地位，這才是董建華渾身解數的外交賣點。

海外看十五大

五年一度的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是中國大陸的盛事，也是海外研究中國政治變動的一個指標。

十五大最矚目的兩個話題是中央政治局的人事變動和國營企業進一步股份化。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七位成員身分重疊，是黨內決策人也是國家機關的首腦。中國是由共產黨當家作主，自然共產黨定下的方針便是國家的導向。

海外觀察家對朱鎔基的觀感是正面性。對他的「宏觀調控」處理，把通貨膨脹高企的過熱經濟降溫確有大將之才。但對喬石的退出則頗驚奇，因爲三年前，曾經一度揣測他可染指國家總理一職，結果他只當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委員長。

很關心落實股份制

在企業「股份化」的領域上，中國企業頗具規模的不是國有制，便是公有制，在技術和管理方面，先以蘇聯爲師，再閉關自守，經濟與外界脫節。到一九七九年鄧小平的開放政策實施才慢慢銜接。

企業「股份化」成功與否，在乎中國的法制和管理是否同步蛻變。假若「股份化」只是將國家和公家的財富轉入一小撮「特權人士」手中，中國的政治動盪只有增無減。中國的政策習慣「一鬆即亂，一收即死」。

譬如中國希望外國資金投入中國，又懼怕外國產品壟斷中國市場，摧毀國內的生產單位。海外關注中國如何落實「股份化」，希望不是一個政治口號。

律師的政治立場

去年筆者任教的法學院邀請一位南非憲法法庭法官到校演講。他在南非種族隔離政策施行的年代，屢次代表備受壓迫的黑人爭取權益，但被白人恐怖份子所害，一雙手被炸彈炸斷了。但自從曼德拉出任南非總理，他才沉冤得雪。

在中國大陸的《法制日報》也曾報道法官當庭拘捕律師，因爲律師代表客戶辯護太「落力」。

在理想的法律制度下，律師的政治立場應該不會影響他辦案的態度。但從客戶（即非專業）觀點下，很難相信律師的政治立場，不是客戶選擇代表律師的條件之一。舉例說，日本政府會否考慮聘請何俊仁代表日本利益爭取釣魚台主權？新華社會否聘請李柱銘控訴特區政府臨時立在會沒法理根據？換言之，律師的政治立場的確是客戶選擇代表他利益的重要條件。

依靠法律援助處轉聘私人執業代表利益的勞苦大衆，可能遇到一個由自己出錢聘請律師的客戶不用面對的問題。從律師專業守則分析，客戶便是客戶，無論客戶是經法律援助處轉聘或是自動上門。但是，在某種情形下，當法律援助處終止代表，客戶不能支付律師費用，律師與客戶代表的關係自然終止。但問題出於兩個情況之下：

一、當法律援助處終止代表的決定和申請人的主觀意見分析，行政因素影響了律師和客戶的關係。在現存制度下，申請人是要經過法院判決，裁定法援處終止法律援助是否合理。

任何曾經執業的律師也曾面對法律界對同一案件持不同意見的情況，譬如原審庭的判決到上訴庭可以全部推翻。一個私人聘請的律師可以有更多專業空間代表私人客戶，但是經過法律援助處審核的案件則多了一層複雜程序。

由法院判決法律援助處拒受案件的原因，也並非完全反映案件是不值得訴訟，因爲兩者之間的差距除了是專業觀點不同外，判決採用的標準也有高低之別。

二、當律師提供客戶意見時，他的政治立場是否會影響他的法律觀點？從人性觀察，很難說百分之一百可以將政治和法律分家。當然，法律界會否認政治因素影響律師專業立場。但最終判斷律師的取向還是在客戶的手中。

再論律師的政治立場

律師政治立場鮮明會被盛名所累，代表某類案件被排出於局。但針是沒有兩邊利的，有等案件則以聘請律師政治高姿態出現爲佳。如果盛名是透過深入研究專門法律，如憲法或刑法，政治立場也看作專門技能。譬如，在歐美有些民權學者教授是靠專門技能被聘請，以申張正義馳名於世。

律師也可以在迎合市場需求，將政治立場低調處理。在五十至七十年代的香港，有香港大律師陳丕士（ Percy Chan ）以專門代表左派和中國利益機構出庭訴訟著名，他可算是政治立場鮮明。

當大律師行業人數強大，自然有不同政治立場的專業人員出現，而律師眼睛也是雪亮的，他們會在照顧客戶的利益前提下，「甄才轉聘」，這也可說是律師的判斷慧眼。

筆者以前在信報刊登了一篇拙文：「政治不受歡迎的客戶」（ 見《前瞻特區未來》一書頁六十三至六十四 ）討論法律專長非政治化。但正如法律援助處處長坦白承認律師的政治導向是考慮聘請因素之一。但從英式訴訟遊戲規則中，大律師的職責是超乎客戶政治立場。譬如，大律師可代表政府起訴，也同樣代表被告抗辯，只要不是同一宗案件。如此類推，是否大律師應

該向法援處提出政治立場，以迎合或拒絕代表某類案件或某類客戶？

正如筆者所預見，司法和法律界面對政治化的趨勢是無可避免的局面。如果處理不善，香港特區可能出現法律界兩極化，一些律師爲了迴避政治立場，以市場掛帥。

亞洲不必以歐爲師

筆者和歐洲已闊別了超過十載，舊地重遊，正是「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歐洲的變動和亞洲（如中國）相比，真是非常緩慢。

筆者寄居在倫敦最負盛名的一間會所，升降機還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鐵閘式」拉門，傳真機是用「濕紙」，老大帝國還是懷舊和落後。譬如倫敦城中不少名勝區是整區劃定家歷史保留文物區，不只建築物不能拆除，加高或將外牆重整，連室內的設計更改也要批准。很多新時代的內部建設如中央冷氣系統、有綫電綫纜不能安置。當世界其作地方建築「智慧大厦」（intelligent building），倫敦仍然憧憬着威靈頓公爵的陳年國寶。

記得數月前讀到《經濟學人》的一篇比較歐洲和美國經濟分析文章，歐洲失業率高企，原因是職位缺少，但有職位安全感；相反而言，美國是職位多，但缺乏職位安全感。如果香港僱主抱怨僱員樂於跳槽，不安於位，其實是反映出就業市場生氣蓬勃，是健康的景象。

英美法律界心態迥異

以筆者熟悉的法律行業計，在英國執業的大學同窗，自從

大學畢業後加盟的律師行，很多是從一而終，甚少跳槽。但在美國流行一句口頭禪：「每個僱員隨時將他的履歷準備寄出」，可以說是天壤之別。在英國一個步入中年（四十來歲）的資深律師自歎所能選擇轉工的機會渺茫；但在美國，同年紀的人是如日中天，自信可以到處大展拳腳，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兩者心境大異其趣。

英國紳士彭定康有微詞

在英國剛巧放映了丁布比的彭定康紀錄片。和一些英國人討論彭氏的功過，似乎習慣了含蓄低調的英國紳士，對彭氏把五年內在任港督的一舉一動供諸於世略有微言。倘若不是工黨得勢而正逢主權移交同時出現，彭定康以前任閣員身份和首相馬卓安的私人關係自我標榜，似乎近於挾天子以令諸侯，以首相威信壓外交部。

評論員與六親不認

商台「名嘴」鄭經翰最近接受《南華早報》專訪，慨嘆當了電台評論後，一些達官貴人敬「他」遠之，筆者甚有同感。

如果以爲香港每天在特區首長辦公室大廈外有示威遊行的熱鬧場面是代表香港政治不和諧，是否每朝在電台上罵政府的人便是煽動民間作亂的「王八蛋」？鄭經翰只是一個政策評論員，他的存在價值是反映出一般普羅大衆的民怨心聲，政策官員可以當他是「耳旁風」，但亦可以作爲「氣壓計」。

政策評論員是一份寂寞行業，表面上十分風光，家喻戶曉，但城中權貴很難會在私人聚會上請一個評論員作嘉賓。

「口舌招尤」、「得罪人多稱呼人少」、「只懂批評，不懂建設」，這些背後的指控，評論員耳熟能詳。名聲愈大，衙門內仇敵愈多。「政府永遠是錯的」，很難和官場打交道。

在《秋菊打官司》一片，男、女主角反映出平民百姓對官員的感受，既可以逆來順受，也可以循法律或其他渠道平反或發洩不公義的對待。愈和權力接近的人，愈有辦法將自己利益保障。相信在香港「有辦法」的人絕對不會欣賞鄭經翰的偉論，但的士司機代表了中下階層的心聲，是他的忠誠聽衆。

中國傳統的父母官愛民如子。但民是否尊官如父？在現代

政策理論中，民衆要積極參與政治，官民打成一片，才是一個融洽、有生氣的社會。在一定程度上，評論員是一種緩和官民衝突的潤滑劑。

大陸英才何足懼

步入中年，同輩的下一代就讀海外大學或大學畢業，面對的選擇是回流香江，但如何面對大陸年紀相若的年輕人的競爭？將來在就業市場上是否失去了競爭力？似乎他們和家長對前途都失了自信心。

香港面對一個嚴重的現實生活問，安份守紀的做專業「打工仔」，連自置一層一千方呎的物業也成問題，耳濡目染，可能報章或傳媒誇大其辭，炒地產、炒錢幣是賺錢捷徑，腳踏實地的工作不受重視。筆者也認識不少中國留學生，對他們的長短處也略有觀察，以下是筆者的一點體驗心得。

第一，香港的服務行業應注重雙語的訓練，譬如筆者鼓勵一位在加拿大讀文史的香港大學回香港後，到一份跨國有名氣的英文雜誌當暑期見習生，讓自己接觸有關亞洲金融經濟動態的實況，以香港爲基地，視野面向亞洲。在未來十年，中國仍然未訓練出思想靈活或視野廣闊的傳媒人士。中國大學訓練的大學生意識形態保守僵化。簡單如廣告設計、財經報道、公關策劃，中國較香港落後十多年。

第二，西方的技術，如科技、理財、集資在現階段亞洲仍未能趕上。筆者的一位在美國酒店行業工作了二十多年的「洋」

朋友，被酒店集團重金禮聘回香港任主管，筆者和她討論亞洲地區爲何要聘請一位對地區沒有認識的「外援」。她坦白說出她的專長在大型宴會（如跨國會議）的市場推廣，亞洲酒店業缺乏組織和安排大規模會議的經驗和人才。在任何一個行業，如果沒有做上十年以上很難掌握行內的「增值」（value-added）妙處。香港人在亞洲的活動能力，無論在資訊、旅遊經驗，在客觀環境下是比較中國大陸同輩高超。

第三，學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市場是不斷變化更新的。二十年前，筆者連對一篇簡單的中文文章也沒有信心下筆，今天可以和《信報》讀者以文交心。香港的律師中能夠以普通話和客戶交談，自然較有市場競爭力。同樣地，能夠洞悉國外和亞洲情況的專業人士會吃香，中國的培訓仍很缺乏，筆者數回國內教學也略知一、二。

從柬埔寨看亞洲

筆者曾經透過已作古人的吳漢（《殺戮戰場》的演員，曾獲奧斯卡金像獎最佳配角獎）的姪兒和吳漢見面和午飯交談。吳漢的樣貌和衣着簡單樸實，一眼看上去他和在禁閉營中的越南船民沒有分別，完全沒有氣派，平凡老實。

筆者也曾出席柬埔寨部長級領導訪問團的宣傳到柬國投資活動。

筆者一個已退休的法學教授同僚花了一整年時間到金邊幫助柬國起草法例，重建她的法律、司法和律師制度。

東南亞諸國中，唯一沒有變成殖民地的只有泰國，爲何一些前殖民地如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在獨立後除了經歷了些「陣痛」，民生欣欣向榮，而柬埔寨、越南、寮國則每下愈況？是否新加坡和馬來西亞是英國殖民地而其他以上三國是法國殖民地？但緬甸也曾是英國殖民地，爲何她沒有走向新加坡或馬來西亞的康莊大道？

柬埔寨的動盪引發了撤僑的國際性問題。香港商界應關注這方面的動態。一個英國公民（海外）護照（BNO）持有人可以向英國領事館求助，同樣地，一個特區護照持有人可向中國求助，一個中華民國護照持有人可向台灣代辦求助。三個機

構誰最落力幫助香港人撤出一些動盪政局地區，已面臨考驗。譬如柬埔寨進一步凍結香港人產業，應由哪一方面出面要求索償，這也是值得關注的動態。香港商人精打細算，應作出比較和準備。

亞洲隱藏着不少危機，印尼可以發生反華示威，越南可以凍結外國人的資產，收爲國有。開始跨國經營或設廠的華裔商人（無論是新加坡、台灣或香港），其本身國籍已響起警鐘。

評終審庭的外籍法官

終審庭外籍法官的龍虎榜上除了紐西蘭和澳洲的三名大法官，其他是在香港殖民地時期任上訴庭的退休法官。他們是否司法「舊電池」？一份英文法律雜誌專訪李柱銘，他喜見沒有新加坡大法官被委任。李柱銘以往認爲終審庭不會有樞密院的才華長駐候「聽」，可能應驗。

筆者很失望，一個北美洲（加拿大或美國）的法官也沒有選中。北美洲有悠長的「文字書寫憲法」的歷史，憲法闡釋經驗豐富，更是太平洋舉足輕重的商業大國，香港眞令北美跨國企業到中國投資和經商的生意人失望。

筆者向一些對中國和香港憲法有研究的學者和律師詢問，香港法官不選「楊基」法官，是因爲恐怕美國「大法官」的「牛仔精神」，製造出令他們尷尬的局面，將香港的「一國兩制」判成違憲，一發不可收拾。這種看法不無道理。另一說法是美國法官不能被外國政府聘請。

一位研究中國憲法頗有心得的專家認爲，起草香港《基本法》的國內教授做夢也沒有想到香港律師會運用《基本法》提出挑戰香港政府的訴訟。因爲中國五千年歷史上也沒有發生過法院闡釋憲法，除了魏京生的自辯書引用中國憲法，頗有西方憲

法訴訟的模式。

無可置疑，法律界是保守行業和尊重先例的傳統，以前曾經在香港任法官的十數名殖民地退休「舊電池」，對香港的運作比較熟悉，但是似乎近於死氣沉沉，難有創新的見解。特別是《基本法》是一個簇新的創舉，需要新精神配搭。但是在保持「不變應萬變」的心理境況下，「舊電池」還是有「剩餘價值」。

香港回歸
宣傳的海外反應

香港回歸透過中國駐外使節的宣傳，只能在一些在與中國關係密切的團體奏效，但對美國整體而言是毫無建樹。

由支持中國的「愛國華僑」發動的大型慶祝活動，不能引起美國主流的注意，是因為中國長期統戰的對象是在美國社會缺乏影響力的華僑團體。

首先，中國外交官員表現甚小器。筆者出席城中大酒店的主權移交酒會，同場加影中英主權移交儀式紀錄片段。中英使館領導一同出席敬酒，理所當然，但當大銀幕上演彭定康離開總督府和英方舉行的「鳴金收兵」儀式，中國使節集體消失。從外國人眼中，這是欠缺風度的舉動，在外交上不夠寬容，旁觀者自然心中有數。

中國背後支持透過留學生舉辦的討論會，討論成分低，歌頌回歸立場太明顯。筆者認識的數位華裔教授用不同藉口謝絕出席，唯有由中國留學生，對香港全無認識的講者濫竽充數。他們的說服力自然打了節扣。在歐美學壇發言，最忌人家把講者當作官方代言人，若要宣傳便弄巧反拙。

在美國略有名氣的華裔學者都是中、台兩面拉攏的對象，希望透過他們，向美國主流說些好說話，這已是公開的秘密，

但是被外間認爲已被「收買」則公信力自動下降。很多明哲保身的人都潔身自愛。反而有些「愛國僑領」從中謀私，或以爲被一方看重作爲炫耀的本錢，但事實上他們在主流傳媒完全起不了作用。

一些嚴肅討論回歸的學壇盛會，也會邀請中國代表出席，但他們要接受不甚禮貌的台下聽衆盤問，中國外交使節倘若招架無力，遭台下宰割。

成功乃失敗之母

洛杉磯的中國領事館免費請筆者先睹《鴉片戰爭》一片，筆者欣然赴會，看後又閱到《信報》和《遠東經濟評論》的影評。

《鴉》片導演謝晉有沒有改寫歷史以迎合「政治正確」潮流？改寫歷史也非某國專利。兒子讀美國「反英建國」歷史，華盛頓被描寫得英明神武。但事實上，「聯邦軍」是烏合之衆，和英國殖民軍隊交戰，屢戰屢敗，以一百八十度回頭跑出名。但美國中學歷史教科書則將「聯邦軍」歌頌成長勝之師，和事實差距甚遠。《鴉》片只收視聽覺藝術官能刺激之快，不能當歷史實錄看。

筆者在美國「執教鞭」已有十年光景，香港大學畢業生在美國學壇任教和做研究者遠遠不如中文大學和台灣大學。理由很明顯，香港大學畢業生到美國深造人數太少，不成風氣。筆者一九七二年畢業於港大，是畢業生就業的全盛期，事浮於人，香港大學畢業生養尊處優，很少會「流亡」海外，從事長期的研究深造工作。三十年後在學術特別是理工方面，香港大學落後於沒有優勢的中文大學，更不如台灣衆大學。

上次回港與一位行政會議成員的港大畢業生討論香港專上教育，他不斷強調香港成功的方程式，如數家珍。但不要忘記

成功可能是失敗的先聲。

筆者中學還未畢業，暑期曾到一間山寨電風扇工場的寫字樓當英文書記，替老闆寫信到沙地阿拉伯國家取定單。老闆是白手興家工人出身的創業型人士，一天辛勤工作二十小時。筆者後來到荃灣茶餐廳當收銀員，兼任企枱，和草根階層共患難。香港的成功在我幼小的心靈中建立了不解之緣。

今天的香港年輕人比我們幸福。但成功的香港可能隱藏着失敗的種子。日本電子和汽車工業的成功，建築在日文「改善」兩字。香港優勢（Hong Kong Advantage）是自知沒有優勢，從惡劣環境實幹出來。

司法界面臨的考驗

筆者最近獲數份權威美國法律界報刊專訪。可以說，80%以上 的美國政法界對香港司法的獨立存着懷疑的態度，無奈筆者以 寡難以敵衆，以一人的渺小力量如何抵抗這個洪潮？

《基本法》159條下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成員已被選出，十二名成員中，六名是香港委員，而其中三名是香港法律界人士——梁定邦、陳弘毅和譚惠珠。以西方法律界的觀點看，《基本法》委員會有凌駕於終審庭法官上的《基本法》解釋權。如果《基本法》委員會以一人一票的投票方式，對香港法律有認識的委員只是十二票的三票，這是否意會着「外行領導內行」？就是香港三位委員的傾向是否完全以香港利益爲依歸？這是一些美國憲法學者對筆者提出的問題。

第二，很難避免的事實是，將來有訴訟涉及《基本法》的條款闡釋，終審庭將面對審訊一些高度政治意識的案件，這些案件可以關乎人身自由，甚至國家利益所在。終審庭是否以技術上法律條文迴避聽審？還是以政治原則作出判決？如果中國擔心香港有法部門仍然被大多數外籍法官或「黃皮白心」的殖民地心態本地法官操縱，中央和特區出現不協調，外國或本地訴訟當事人更難預測法庭的判決，執業律師更無從有效地輔導客

戶。

一些美國法律團體開始對香港法律刊物的獨立性打上問號，這是一個不太樂觀的訊息。以筆者愚見，香港司法界除了在審判上證明是獨立和公正，在海外宣傳上也要下些工夫。

難民心態與當家作主

今天重溫數本有關香港社會研究的學術著作（Benjamin K. P. Leung: Perspectives on Hong Kong Society 見 Lau Siu-Kai 與 Kuan Hsin-Chi: The Ethos of the Hong Kong Chinese），再反思董建華在不同場合的強調：「我們是當家作主。」

香港過去的一百五十六年殖民地歷史，是建築在難民心態的中國人上。很明顯，新加坡是唯一由移民中國人所創立的國家，無怪在某程度上李光耀的經驗值得參考，但香港有別於新加坡，並非一個獨立的國家，在心態上迴然不同。

英國人統治香港懂得利用中國人的難民心態，正如彭定康在臨別秋波的告別辭中所說，英國人建造了一個棚架，由中國人向上爬。今後特區政府是否繼續用英國人的棚架，還是建築另外一種棚架，發人深省。

香港人習慣了爬英國棚架，如何適應中式棚架？一個美國資深法官看到在特區宣誓儀式中戴上假髮、紅鬚綠眼的外籍法官面向五星旗宣誓效忠，他覺得很新鮮，認為是史無前例。他詢問筆者這些外籍法官如何在心理上平衡。事實上，在主權回歸中，無論國籍與出身不同的香港居民，在心理歷史上要作出

適應和協調。

難民心態的一個表達形式，是我只求在財富上尋求滿足，放棄一切政治參與，政治若對我不利，我便一走了之。

筆者勸喻特區政府不可向民主派人士以「打壓」或「招降」方式對待。民主派也是積極尋求政治參與的熱心人，而他們採取的方式比較接近「一人一票」的西式觀念。反觀有些自己袋中有一本外國護照而整天喊着「愛國愛港」的殷商巨賈，才是難民心態的表表者。

中國法是外國法乎

筆者五月十七日在中文大學演講中，提出一點：中國法是否外國法？在香港殖民地時代，有關英國和英聯邦普通法國家的法律，律師只要在法庭上引經據點，法庭可以接納。但中國法是另一法統法律，只能靠專家作證，法院不能主動接納，而由正方和反方傳詔證人引證。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在一九九七年三月刊登報告：「Report on Extrinsic Materials As An Aid to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在報告的 10.36 段也提出同樣問題，但沒有答案。

表面上，中國法是外國法簡直是一個不甚合邏輯的法理問題，既然如《基本法》第一條所列明：「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何來主權國的國家法律是外國法？

如果臨時立法會的設立是追溯全中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是否香港法院不可以推翻主權國的決定？《基本法》第八十三條所指出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各級法院的組織和職權由法律規定」，條文上的「各級法院」顯然是不包括終審庭。而且各級法院的職權是否包括將中國人民大會的決定作出審判？在現階段，這些《基本法》不明朗的條文可以構成香港的憲政危機。

以筆者愚見，董建華和范徐麗泰不應該在公開場合討論香港法院在《基本法》問題審訊的意見，因爲《基本法》八十五條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立法和行政執行的要員不應該增加對法院審判的壓力。

海外法律界詢問筆者，假若香港法院眞的判決臨時立法會是沒有憲法根據，後果如何？筆者回答將會是大災難降臨。首先臨立會所頒佈的一切法律均無效，甚至是終審庭首席大法官的任命也要被廢除。

筆者已在數年時提醒行家關注《基本法》，而不是盲目宣傳《基本法》，今天果然應驗。

政治評論專欄的前景

筆者和一些美國「中國通」討論他們在熒光幕上看到英國撤走香江的觀感，從而談到他們對政治評論專欄在香港的前景。

任何社會，包括美國在內，對政治評論文章有興趣閱讀者不會超過10%。美國社會觀察家Kevin Philips認爲，對社會民生政治有興趣者有以下特點：一、他們是投票者；二、教育程度高，多有大學學位；三、薪酬較高，職業是中上階層；四、參與社會團體活動熱心。最主要的一點，是他們認爲自己可以改變社會，掌握命運。無可置疑，讀《信報》政論文章的人，可能也和美國統計結果有若干相同之處。

香港人是否對政治冷感，只熱中賺錢？投資與從商者不可能置政治不理。生意幹得愈大，對政府的政策認識愈深。今天的商人要成功，對政治的觸覺愈要敏感。譬如，不少投資分析專家在跨國投資輔導的領域上就是政治評論員，只是名稱上的分別而已。

中國大陸的報章缺乏的，是與政府立場不同的政經評論，《人民日報》或《中國日報》的評論，讀者只能當作官方政策的報道。筆者曾經在美國一個亞洲研究中心宣讀「鄧後中國分析」文章。預先準備了稿本，分發給不同背景（親中、親國民黨、民

進黨、香港報章）的記者。翌日所讀到各報不同的報道，簡直不相信他們是取材於同一人所講的稿本，斷章取義是根據報章鮮明的政治立場。

香港政論文章的存在價值，在乎作者可否保存獨立的分析，拒絕作官方喉舌，否則如林行止在專欄所預言，只有西方報章的評論才能立足。

國際一流大學的氣派

大學是否財力豐富，便可成為國際一流？美國私立大學中的南加州大學可算是富甲一方，但名氣還是落後於東岸的「長春籐系」名牌大學。

用錢當然可以聘請「明星級」教授，重賞之下，必有勇夫。譬如，一些商學院名教授年薪可達35萬美元，較一般教授的15萬美元多一倍以上，學校更「眼開眼閉」地縱容教授校外兼職當顧問。

但是學者如果只是向錢看，長遠計仍非學校之福。以史丹福大學法學院的一位以《壟斷法》著名的權威教授為例，他可以到私人執業律師行出任律師，薪酬較教學多數倍，但他在7年一度的可帶薪假期（sabbatical leave）情願到司法部當顧問也不「下海」，證明金錢在某些學者眼中並非萬能，銀彈政策不能收買學者。

有些大學向外「借將」以抬高自己學術地位。長遠計，只靠「僱傭兵」為主力的大學，亦非上策。一間大學的教職員要有流動性，長期冗積「瘀血」會死氣沉沉。人事變動太頻，很難控制素質。大學培養「接捧子」的後浪，切忌「近親繁殖」。

歐美有些名校在聘請入行的助教，寧願招收「外援」也不對

本校博士畢業生「情有獨鍾」，原因是要加強流動性。一間大學要有老、中、青三類人才結合始有新陳代謝。加州大學三藩市分校法學院有獨特的「65會所」(65 Club)，專門收容在其他法學院已退休的教授，別具一格。一些大學的榮休教授(emeritus faculty)較一些「生力軍」後輩還活躍。

最後，筆者在香港各大學應否採用四年制學位的問題上，認爲從與中國和台灣啣接計，學生在大學逗留多一年而減少中學一年時間，似乎是大勢所趨。

香港與國際一流大學

最近讀到香港一份月刊討論在香港可否有國際一流大學出現。五月份的另一份地區周刊列出香港三間大學名列亞洲十大的「名校榜」。建立國際一流大學，不能虛有其名，要名符其實。

六、七十年代，香港大學的教員學歷和種族以英國獨佔居多，而中大則以台灣及美國爲大多數，將來相信會是國內到美國留學者佔優勢。是否香港人才不濟？

筆者和一些曾經到香港短期任教和穿梭海峽兩岸，但葉落歸「美」的資深教授分析，香港人急功近利，有耐心從事三至十年研究，作基層研究、紮實苦學者極之少數。筆者七二年香港大學畢業，同期打算到海外進研究院深造的同學寥寥可數。但對從事工商界、任政務官則十分熱衷。

要切切實實的出版一本學術著作，費三至五年工夫是等閒事，而其間要同時出產學術論文，以數量符合聘任「長薪」教職，更不容易。編書容易寫書難，一些成功將「著作榜」編製體得的學者以編書爲「捷徑」。

在科技基層研究上，動輒要一組數十名持博士學位的研究員和博士研究生日以繼夜工作。就是在美國，一般以教學爲主

的大學也不能在人力和資源上負擔得起。唯有如史丹福、麻省理工研究大學才可勝任。

是否只有研究大學才是國際一流名校？非也。在美國，有名震一時的學院如Dartmouth等是以教育大學本科生嚴謹而出類拔萃。

如果香港的大學沒有雄厚的資源和充足的研究人力，筆者勸喻不要作奢望，不應以歐美研究大學作模仿對象。香港應該盡量利用本身有限的資源，務求成爲亞洲重鎮，不要浪費時間、金錢去滿足虛榮心心。

明星教授和明星一樣，是有地緣和時間限制的。成龍打入荷里活只能靠功夫片，很難想像他可以拍占士邦片集。同一原理，爲何要強迫香港的大學追隨哈佛和牛津？

香港如何影響中國

西方媒介評論香港，預測香港繁榮、生活方式不變，其中一個因素是香港能夠影響中國，令到中國經濟進一步走向市場化和政治上更開朗。

江澤民的一句「井水不犯河水」，似乎應該改成在三角洲地帶的河水和海水一定會混和較恰當。

中國實行「一國兩制」，其中一個目的是抗拒香港的風氣引入中國境內，譬如中國領導人不願見到香港式的遊行請願在中國大陸出現。

香港如何影響中國？程度上和地域上如何？舉個簡單的例子，筆者出席李柱銘在美國的演講，聽衆中有不少中國留學生，他們不是民運份子，但他們對李氏的立場感興趣，會後和筆者討論。間接上，中國下一代留學生的知識份子對香港的異見人士觀念加深了認識。

筆者到沿海大城市特別是廣州，差不多認識的官員教授和律師十居其九不是原籍廣東省，中國大城市是一個大熔爐，廣州市的一般人對香港的認識之深，令筆者驚異。

香港和中國兩地溝通存着不少障礙，但兩地人民的不斷接觸，在不知不覺中造成了無形的影響力。

筆者一次在國內演講的開場白是：「本人很高興和榮幸能夠回到祖國精神污染你們」，搏來全場掌聲。中國的「拍掌文化」只是領導致辭高調的羣衆心理反應，美國競選總統的演說場合，也有同樣的「拍掌文化」出現，但嚴肅的演講，「拍掌文化」不會出現。

事實上，要影響中國須要長時間。在經濟上，沿海一帶已看到結果。但在政治上，香港似乎高估了她的影響力，西方傳媒的報道可能是一廂情願，以理想當作現實。

英商的部署

筆者到倫敦，和一跨國性英資律師行首席合夥人，亦是二十年前同窗見面。連寒喧也省了，他便開門見山地詢問筆者英資企業在香港主權移交後如何部署。該律師行在香港和國內也有辦事處，料應一手資料充足，但他希望筆者以「冷眼」作分析。剛巧筆者讀畢丁布比的《末代總督》一書，便引申該書描述滙豐銀行浦偉士和大東電訊格楊勳爵如何對待彭定康的態度告知同窗，供他參考。

再讀到信報有關顧汝德的文章，了解他離開香港令他心碎的情懷。顧氏和筆者也曾有不少碰頭的機會，尤其是在一些學術研討會，筆者曾宣讀論文，顧氏是評論員。在丁布比的《末代總督》中，顧氏被形容是彭定康的心腹「謀士」。無奈改朝換代，倘若以往英治全盛時期，以顧氏的身份與「內幕」心得，退休後在香港必然是財經界「搶手」貨。但今朝他要跑到都柏林，相信他和彭氏的親暱關係，構成壞處多於優點，重出香江並非易事。

以筆者和一些倫敦財經法律界有識之士交換意見，英國企業將盡力洗脫殖民地宗主國的歷史污漬，以新姿態出現。但問題在於中國，她是否能夠摒棄鴉片戰爭之辱，不記民族歷史之

恥，不追究舊賬？

以英國律師行，似乎在有些跨國貿易必需的專長上，它們是優勝於本港律師行。但從筆者所接觸到的跨國買賣先例，某國和中國在某一時刻的關係是和諧或惡劣，也決定了中國會否簽約和簽約的條件是荷刻或寬容。在這方面，和中國做生意有經驗的商人也會體驗到。

正如波音和空中巴士在競逐中國飛機市場的歷史作借鏡，中英貿易是否能夠和香港殖民地歷史脫鈎值得關注。

港英關係的新導向

筆者剛從英倫考察回美，看到《九七透視》分析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獨立後和英國的關係，以借鏡香港今後和英國的關係。筆者以爲港英關係無論在時間和政治氣候下，不能像新、馬與英國過往關係一樣發展。

很明顯，根據《基本法》十三和十四條，香港的外交和國防是由中央政府管轄。換言之，香港和英國的關係是透過中國外交部，而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外交則可以獨立處理。在獨立後，新、馬仍然是英聯邦成員國，以英女皇爲精神領袖。新、馬兩國初立國時，她們的國防和境內的安全仍然依賴英國軍力，到現在英國、紐西蘭、澳洲和新、馬兩國有多邊協防條約，但是香港不是在同一樣的政治環境下脫離英國，繼續和宗主國藕斷絲連。

六十年代的亞洲和二十世紀的亞洲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客觀政治環境（參考以下兩書：John Keay 著 Last Post－The End of Empire in the Far East和William Van Kemenade著China, Hong Kong, Taiwan Inc.－The Dynamic of a New Empire）。在六十年代的東南亞，中國和北越構成新、馬對共產黨擴展的懼怕心理，而新、馬兩國仍然依賴英國平衡

共產勢力。但今天中國的陰影已大部份排除，新、馬兩國和中國已建交，新、馬是東南亞協約國家裏的兩個生氣蓬勃的重鎮。

新、馬兩國的議會、文官和法律制度承襲英國，筆者在英國研習法律時的亞洲同窗，十居其九來自新、馬。但馬來西亞和英國的關係也曾出現緊張局面，譬如抵制英國貨和英資退出馬來西亞是其中一些例子。香港則處於另一個政治環境，譬如在主權回歸後，香港在民族意識上是認同中而不能像獨立國積極鼓吹獨立的民族意識。其次，香港的人口98%是華籍血統，而新、馬兩地是多元文化組織成，英文和英式傳統有助多元文化認同，已曾是宗主國的優越習慣，成爲一種凝結力量，有助同化的效力。

正如 William Van Kemenade 在他書中預測，香港將成爲中國、台灣三位一體的新經濟組合，這樣才能發揮香港獨有的威力，但是新、馬兩地則沒有這些地利優勢。

無可置疑，新、馬同是經濟成功的先例，是否由兩國華裔國民的經濟活力和生意頭腦帶動繁榮？這是東南亞一帶極敏感的政治話題，答案盡在不言中。

大學留學生的去留前途

筆者認識一批中國大陸留學生，大家雖不是莫逆之交，也算是「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不少和筆者是亦師亦友，間中把酒論「前程」。其中有數位更是筆者法學院學生，無論他們回流亞洲或滯留美洲，筆者也替他們在求職或轉職中寫推薦書。他們的動向筆者一直關注。

一位是筆者十年前在美國當他指導教授的法律碩士，他很坦白的分析其前途。九年前在天安門事件發生後的一般時間，他們在美國學有所成後，用盡千方百計，找門路留在美國。但今天選擇長期留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可能不及50%。原因不外以下四點：一、以前的留學生選擇畢業回國後國內人士會以爲他們在美洲「撈唔掂」，而當時國內的研究、教職和當顧問機會和酬勞不如海外；二、美國物質豐富，他們的配偶或下一代喜歡在美國生活；三、在八十年代前期，美國還是經濟強勁，中國留學生如鳳毛麟角，他們容易獲得高薪職位，在美國的工作經驗尤其珍貴。四、倘若他們在國內不是高幹後代，在海外紮根和國內向上爬也是機會均等。譬如，在美國大學任教只要捱過七年試用期，得了「終生任聘」教席以後到台灣、香港和大陸穿梭便身價十倍。在中國就是當教授，無論社會地位和物質享

受還是差勁。

爲何最近四至五年人心思變，打道回國者絡繹於途？原因也有三點：一、跨國企業出重金禮聘，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中國沿海的大城市和香港的物質豐裕程度上升，外國式的居住環境和生活方式應運而生。到上海有司機、女傭、子女可就讀國際學校，有不少同聲同氣的留學「回流人」共事。在美國雖然是生活安逸，但在海外精神比較空虛，要升職不容易，既然「居留權」或國籍已到手，亞洲自然是他們狩獵場地；二、他們的特長是熟悉中國大陸的市場，掌握人際關係和擁有海外企業的數年工作經驗，在海外無論言語和企業文化對他們構成升職「絆腳石」，人望高處，當「獵頭公司」列出的優厚條件時，很難不動心；三、大陸留學生的國內同輩也因爲中國開始注重技術官僚，幹部年輕化，在衙門官府當上決策重任。當留學生回國後，他們穿針引線的關係是外國企業的洋鬼子所欠缺。外國企業也看透這些利害關係，放置數名回流中國人較洋鬼子「外援」更具相對優越條件（ comparative advantage ）。外國放洋鬼子離鄉別井，視中國爲「短期觀光」的三數年逗留之地，有些更水土不服，中國是「困苦職位」（ hardship post ）。最低限度，從中國來的僱員沒有以上難題。

從筆者的觀察，中國留學生回流亞洲的比例會迅速增加。如果中國大陸政治更穩定，經濟更開放和香港平穩過渡，他們更樂意選擇回國。

特首訪美前預感

筆者近日和一批美國外交界素有研究之士談論董建華將要訪問美國一事。假若董建華在主權移交之前訪美，他還是未「入門」的媳婦，西方傳媒會把很多「假設」的問題難爲他，但主權移交後的六十天，一切順利，有目共睹，要令他尷尬的場合必然減少。而可以難倒他的地方，可能是一九九八立法會選舉的「民主」參與程度和司法制度在憲法訴訟中偏向行政主導，不敢審核中國人大的決議。這些都是技術上的挑戰，而以民生安定與外資仍然在香港繼續「生意照做」爲大前提。

董氏必然希望美國總統接見他，以前彭定康、李柱銘也有機會踏足總統府。以筆者預測，克林頓會在國會反對聲音下力排衆議接見董氏，否則中國和香港不會原諒他的不近人情。拒見董建華等於不承認他的領導地位。

董氏只選擇出訪紐約和華盛頓，反映出他對美國投資界仍然是情有獨鍾，華爾街比唐人街更重要。董氏不到美國西岸停留是一敗筆。加州的港口出入口貨品到亞洲的量與值已超過了大西洋的歐洲貿易額。美國西岸的商業重鎮如三藩市和洛杉磯，才是太平洋邊緣的心臟地帶。加州的亞裔移民全美國最多。筆者曾到加州參議院舉證，反映出加州對香港的重視。

董氏寧可先訪美國也不到英國，更反映香港特區不太重視英國關係，更不能擺出香港承認英國是歷史上的宗主國的重要性。無可置疑，英國在太平洋的影響力已退到次要地位。

如果從今天到董氏訪美之際沒有些轟天動地的大震動發生，董氏可以向世界證明，香港過渡是一片昇平，作業如常。

從法律觀點看十五大

中國共產黨五年一次的大會是把未來五年的治國班底重組。中國仍然是一黨專政，與西方的民主制度中兩黨或多黨派競爭權力大異其趣。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也可說是一黨獨大，反對黨只是零星的可以不理會的聲音。

從法律觀點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如中共中央政治局）是與國家領導階層的對等，政治局委員出掌總理等要職，習慣三權分立和兩黨對立的國會式民主的國度（如英美）評論員，對中國共產黨在權力制衡上的運作是不表稱許或欣賞的。

譬如在十五大中呼籲打擊貪污腐敗行徑，是中國共產黨「清理治國不良分子」。但既然是黨內分子貪污，開除黨籍是否有足夠的阻赫作用？如果黨籍是一種特權象徵，是否黨高於國，黨大於國？

以中國黨政軍權集於一身的政治意識形態來看，似乎又脫離了集體領導的模式，中共中央政治局代表了權力中心的成員。從黨國分家的觀點看，中共舉行大會不應該動用國家資源和國家媒介。中國共產黨應該支付租用國家開會場地及承擔一切開會費用。

中國向外界宣傳黨低於國，黨員要遵守國家法律，很難想

像香港任何一個政黨可以租用政府大球場開年會而費用是由政府承擔。

在中國大陸的思維，共產黨開會討論國家大事是理所當然，但是爲何要一些非黨員的國民承擔費用？

如果中國認眞表示黨國不是同體，首先應該在財務分家，十五大動用的費用應由共產黨支付給國家。

十五大的商業價値

外國財經傳媒獲悉在十五大中，中國共產黨宣布國內企業將進一步成爲股份企業，各向筆者打探，有評論家認爲中國共產黨是「掛羊頭賣狗肉」，事實上是在私有化（privatization）。筆者認爲無論名稱如何，股份化是正確的路綫。

有學者在《洛杉磯時報》大做文章，指出股份化只會導政特權階級進一步致富，將國家的財富轉到他們手中。因爲中國的法制未能和資本主義掛鈎，不足以保障股民的利益。這點筆者同意，但是長痛不如短痛。中國進行任何政經改革，有人受惠亦有人受苦。就是美國的大企業「向下縮型」（downsizing），也導政失業。何況中國差不多在以往的四十多個年頭是國家養活十億人口，行「大鍋飯」公有制。

企業股份化不應該是一個口號，如何將它具體化實行並不容易。首先，中國境內的兩個股票市場不可能承擔過多的企業上市，而香港的股票市場短期內亦難承受太多國內企業掛牌，國內企業要在吸引資金上動腦筋。

中國企業的低價出口貨品以吸取外資可能遭遇美國的抗拒，當貿易赤字成爲美國的政治爭議題目時，中國的生產出口

企業將出現瓶頸地帶。雖然中國有無限量的廉價勞工，但生產技術仍然是落後。

第三，雖然世界銀行行長大讚中國的經濟增長值得驕傲，開放了十九年已有不錯的成績。經濟轉型也帶來社會的嚴重問題，如環境污染和貧富差距，但從宏觀看，中國開放國內市場是無可避免的趨勢。筆者是最近和世界貿易組織（WTO）的副總監和各專家開會，他們估計在一九九九年中國會正式進入世貿，中國正在密鑼緊鼓在應付入會的條件。

從國外專家的觀感所得，他們正關注這頭巨龍在變色。

律師執業試是否可行

筆者建議香港律師公會應慎重考慮在自設律師執業試前，應參考其他國度的前人經驗。

如果新進律師只是語文欠佳，補救辦法是在大學就讀期間，將語文水準提高，和要求在中、英文的分數上到達若干程度才獲畢業資格。倘若當一個已接受了四年大學（即三年本科、一年深造文憑）的畢業生才如夢初醒，因語文程度不足不能投考律師試或獲得律師資格，於理不合。

筆者建議如果律師公會關注律師的語文程度，可以要求在大學一年級就讀法律學生參加校外（由律師公會認可的考試機構）主持的語文測驗，而不要延遲到該學生結束大學生涯，才令他失望。

語文程度試不合格是否仍然可補考，筆者認爲失敗者可以補考一次。

對於那些語文不合格者，他們不能任律師，是否妨礙了他們繼續其法律課程？一則，語文不合格者可以轉系。二則，既然有一部分人就是讀滿了四年法律，也可能因爲語文度未符合水準，早一點作出安排對他們也是情有可原。三則，正如在海外，不少拿了法律學位的畢業生是從事「非律師」行業，如銀行

界、保險界等。如果律師行業普遍化，熱中當律師者亦會人數下降。以往香港「發三師」成爲歷史陳跡。

無可置疑，語文是法律的工具。但是律師公會諸公並非語文專家。由律師公會辦語文考試很難令人服氣。筆者不排除有不服氣者告於公堂，認爲加插語文考試是有違「自然公正」（natural justice）的原則。

《基本法》訴訟多多

自從《基本法》在一九九〇年四月頒布後，筆者曾專心研究，超過20篇拙文在《信報》先後刊登。律政司署有12名「猛將」組成《基本法》訴訟組，已在六月前組班。比較私人執業律師（和大律師），他們是先知先覺，有備而戰。

無可否認，律政署可「閒置」一批律師，讓他們潛心研究未施行的《基本法》，但私人執業律師爲口奔馳，有案件接上才研究新法，甚爲短見。今天「小人蛇」的訴訟涉及《基本法》，證明筆者預事準確。

除了律政司署外，香港的法律學者也曾對《基本法》作出深入的研究（見Yash Ghai: Hong Kong's New Constitutional Order — The Resumption of Chinese Sovereignty and the Basic Law, 1997，香港大學出版社）。

將來勞工團體、工會控訴政府凍結立法局通過的勞工法例；民主黨控訴臨立會的成立沒有法理根據；地產商控訴政府控制樓價上升，一切都是《基本法》訴訟，好戲在後頭。

基本上，「小人蛇」的居留權問題關乎在立法會可否通過法例，表面上是闡釋《基本法》24條(3)，而事實上是用程序形式收窄和結束了24條(3)的原意。換言之，《基本法》被下層的法例架

空。

如果《基本法》24條(3)須要修改，麻煩更大，根據《基本法》159條，修改程序非常複雜。

筆者預見，可能「小人蛇」案件最終是由人大常委會根據《基本法》158條作出《基本法》24條(3)的解釋，而香港司法界亦以人大解釋爲標準。

補習社之風不可長

筆者以前曾在信報刊登過一篇拙文：「香港的補習文化」（參《前瞻特區未來》，頁228至229）。曾在香港讀中學至大學的人如筆者，一定當過補習老師或補習學生的切身經驗。補習差不多是東亞文化（台灣、日本和香港）的一部份。補習流行並不可怕。假如我是家長，如果我的子女眞正地積極補習，我還高興，我只能抱怨他沒有創造力，靠犬儒式記誦學習，但這比他終日無所事事還要好。

年前筆者閱到美國陸軍的一份雜誌，現代軍人的電腦操作熟練，全憑靑年人沉迷電子遊戲機，與電子熒光幕日夕相對，因此可以將技能「良性轉移」（positive transference）。

只要參加補習班沒有被騙，以筆者愚見，沉迷補習比較其他玩藝還有益。

補習社的盛行是否反映出「正規教育」之不足？一般芸芸學子也是「羊羣心理」所主導，而企業化的補習社利用廣告式的宣傳手法招攬學生。筆者認爲教育當局和消費者委員會應關注一些無知學生是否被誤導。

補習只能視作爭取公開考試更佳成績的捷徑，而不是教育眞正目的。從筆者教學經驗，一般只靠捷徑博取文憑的學生，

到了更高深研究、以自發和思維的學術境界，只懂背誦記憶的學生遲早被淘汰出局。特別是資訊發達時代，知識貯藏已到達「按撃」即可的境界，如何整理資訊和思考才是有價值的活動。

香港地狹人多，參加補習社可能也是求上進的青少年活動之一。教育界可以發展些渠道將他們過剩的精力轉移、發揮和培育。

美國人
對亞洲認識有多少

從統計數字可反映出美國人到國外公幹或旅遊的多寡：只有50%的美國人擁有護照，只有40%參衆議員擁有護照。由此可見，美國人對海外世界，特別是亞洲認識的多少。

一份商業周刊評論，美國航空公司有龐大的國內市場，導致它們忽略國際競爭。從筆者輔導美國商業機構在海外銷售產品（如建築材料或化工產品），它們對海外的知識非常貧乏。比較香港同類的商人對世界經濟的觀察，美國的確是夜郎自大。

美國商人對亞洲的認識，比較一般居住在國家中部或內陸的美國人高了不少。

美國的政要人物批評國外政經事件經常暴露出他們的無知。簡單如鄧小平開放政策落實以來，中港的經濟強勁也被政界抹殺，反而曾經穿梭太平洋兩岸的商界才領略到。問題是能夠將美國的注意力轉移者，往往也被美國本土人士針對抹黑，以爲他們是利之所在才製造假象。

即使是董建華訪美之際抱怨美國媒介對香港主權回歸作出誤導也無補於事。相反地，美國傳媒連他的到訪也低調報道。美國媒介根深蒂固的偏見，不是朝夕可消除。

整體而言，以筆者長期和美國報章傳媒的交往，只有給美國有影響力灌輸亞洲的資料，如筆者和華盛頓一些衆議員（有部分是筆者的史丹福大學的同事）會面傾談和公開討論，才略見收效。

在影響美國政策言，只靠政治獻金已被證明是「低招」，效果適得其反。但透過學術交流，在主流傳媒出文章或在熒光幕上曝光，收效雖較銀彈政策威力慢，但滲透力。

如何解決律師過剩問題

律師公會主席提出香港兩間大學培訓過量的法律學生，是製造律師過剩的原因。

以前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依賴英國替她們培訓律師，但是今天新馬兩地的法律學院出產的律師，在數目上已超過在英國畢業的律師。當香港的法律教育進入成長期，也會以保障本地人就業的機會爲己任，優先取錄本地訓練人才。筆者預見香港兩所大學將成爲壟斷律師出產的所在地，香港律師的素質控制和供求完全獨立自主，不用假手於宗主國和其他英聯邦國家。

香港法律界應向「專業分類化」的方向走。以前大律師是文武全才，之後分專打刑事官司和民事訴訟兩類。律師行業中盈利最高的是地產業務。但當一個行業的就業人數增加，自然出現「專業分類化」。筆者在美國執業十年，習慣面對「專業分類化」的競爭局面，相信香港如英國，將和美國同步走向「專業分類化」。正如醫生，律師也有內外全科的「普通科」，但「分類化」將導致專業內部重整。

法律界的就業分布地域不平均，普通科的律師可能從擁擠的城市走進新發展區。而具規模的香港律師行在中國大陸開設分行，香港訓練的律師可以往國內辦理香港有關的業務。如筆

者在史丹福大學法學院教授的學生，不少在太平洋諸國當跨國律師。他們一般的薪酬和前景令人滿意和鼓舞。同樣地，香港在地理和文化方面和中國大陸接近，服務行業如法律界應好好把握這些連美國人也想染指的「進軍中國」機會。

法律界將出現是南北一家親。只要香港律師的專業水準保持國際地位，外資律師行進入亞洲也要依賴「識途老馬」指點迷津，再進一步聯手經營。香港律師公會應該把市場擴大，招引外資律師行入境，但在聘請本地律師的要求求上嚴格，替本地律師爭取就業機會，讓本地和外國律師平分春色，互惠互利，分享成果。

以香港的地理和視野，法律界的內憂應該可以迎刃而解。

歐陸見聞

十數天的英倫旅程非常緊湊，拜會了不少法、政、學界有識之士，正是讀萬卷書，行萬里路。

筆者素來以爲美國主流報章對亞洲的報道不足，此行發覺英國和法國的媒介對亞洲的報道在質量上比較美國還不如。在歐洲逗留十數天，除了《倫敦時報》在首版報道英國情報局調查彭定康是否向外洩露國家秘密外，香港一辭並沒有在任何報章出現。正如一位曾在倫敦大學亞洲研究學院任教的資深教授對筆者有感而發，英國在退出香港後，將更進一步成爲關注歐陸發展的國家。英國已「調節」（ adjusted ）在亞洲失去香港經濟利益的新局面。在研究中國和香港的資源和人才，英國更形不濟，美國的亞洲研究才是世界中心。

筆者曾到一些以亞洲研究爲主的學術機構考察，在經費和人力上，英國和法國落後於美國，相形見絀。在美國區區一間中小型大專院校都有數名對亞洲研究有興趣的教授，但在英法只能在爲數不多的「認可」大學獨力支撐。

在倫敦筆者買了一本《末代港督》，一口氣讀完。該書的參考價值頗高，尤其是對彭定康政改期間的高潮起伏，英國外交部和港督府的意見分歧描寫刻劃得淋漓盡致。閱畢，筆者替一

些曾在彭督治港時期立下大力的港英高官和謀士在特區繼續服務的前途擔憂。

有些人在書中被指名道姓，指他們和中國「對着幹」，他們的效忠必成疑問。在英國一本具權威的政治刊物New Statesman，也質疑《末代港督》的作者是否將他以記者和「採訪主角」的「老友」身份混淆和有利益衝突。

到英倫一行最大的收獲是吸收了英國主流的各界人士對亞洲新形勢的私下分析，但是無可置疑，英國的亞洲勢力已是強弩之末，起不了作用。

留學生今非昔比

今天從香港赴美國就讀大學的年輕人多幸福，父母懂英語，教育水準高，選擇大學，父母操心。坐飛機有父母陪伴，進宿舍購置電腦、音響器材、無線電話、電子計數機，聖誕和暑期回家探親。六、七十年代的香港留學生（如筆者）父母不識英文，選學校要自己找參考書。隻身出國，家人只能提供飛機票及第一年學費，以後要靠半工讀，自供自學，畢業後前路茫茫。但有志者事竟成，一般名列榜首。

筆者同輩的子女不少已進入大學，只見他們照顧子女無微不至，有求必應。替他們開銀行戶口、申請信用卡、買汽車，一切物質要求完全滿足。學有所成回香港，有父兄關係能找到舒適的工作，如鳥籠的鳥，全無後顧之憂。台灣到美國留學的學生景況也相同。

亞洲在這20年間，經濟起飛，一些中上家庭供養下一代到美洲留學，不費吹灰之力。家長的教育也達到中、大學程度，但是代溝仍然顯著。遠的不說，筆者的兒子（十七歲）對名牌衣物、汽車款式如數家珍，反而筆者一竅不通。

現代年青人重視物質的高級享受。以前的留學生白天趕課堂，下課充「企堂」，大有其人。大學的圖書館、飯堂、實驗室

是留學生找工作機會的勝地。日常交通工具靠自行車或公共汽車。記得筆者到外洲探同學，坐「灰狗」巴士或到學生會查詢「順路者」搭「順風車」。現在的港、台留學生炫耀名車、名表、上館子，生活多姿多彩。

昔日的留學生要靠助、獎學金，讀研究院要當導師。筆者有香港律師朋友的女兒在東岸名校讀博士，已讀了五年，每年花費八萬美元。正是留學生今非昔比。

三論香港的競爭力

在海外流傳的訊息，是香港的國際地位將在五至十年內被上海取代。這個流傳是否沒有根據？

筆者在歐美參加無數的研討會，被投資界人士和財經刊物編輯追問。事實勝於雄辯。

無可置疑，上海的地位日漸重要。她是中國的名城，商業價值高於北京。一個在北京大學任教的資深教授到美國訪問時坦白說，他從來沒有考慮離開北京，到中國任何地方執教，因爲北京永遠是中國政權和文化中心；離開北京，便是如帝皇時代被放逐或是貶職。但從商的專業律師中，筆者認識的朋友，到上海是發達致富的的地方。

筆者對海外金融投資界一貫的意見，是香港地位可能被削弱。譬如筆者認識的投資顧問公司把中國的總部設在上海，減低香港的僱員，將東南亞的總部放在新加坡。香港政府應該密切關注這個趨勢，如果不能挽救此劣勢發展，香港人的就業機會和薪酬將逐漸下降，當然香港政府不能干預市場，但在吸引外商和服務行業長駐香港是當前急務。

筆者也關注台灣是歐美公司進軍亞洲的灘頭陣地，但是金融投資銀行界對台灣的法律制度和「台灣式」的辦事作風，抱保

留的態度。相反，香港雖然租金昂貴和生活費不低，但是有足夠實力的美國公司不會太計較，對香港仍然是情有獨鍾。

話雖如此，美國公司的流動傾向較歐洲公司高，它們會順應市場的轉移，短期的策略是可以將地區總部從香港遷到馬尼拉，毫無留戀。筆者認識的一間美資出版公司曾經作此打算，理由是菲律賓具高英語素質的僱員較香港便宜，現在電腦傳訊發達，地區總部不需要大量地方性僱員。

母語教學的爭議

應否用母語教學不只是香港獨有的問題。馬來西亞在獨立後，中小學教學皆以巫語教學，最近連總理也改變初衷，鼓吹英語，迎合國際競爭化。

筆者也體諒到不少家長反對強迫以中文作爲教授學生語言。特別是中上階層及高收入的家長，恐怕下一代英語水平下降，失去爭取高薪的就業機會。以筆者的觀察，香港英文水準下降原因是：一、英語應用的環境減少，以前的中學生唱的是英語流行曲，現在是粵語時代曲；二、英語教授方式落伍，教英文的中學老師本身的英語水平也不足夠，「一蟹不如一蟹」；三、要求以「非母語」的教師用「外語」教授各科，更令不少教師採用「不中不英」的方式在課堂授課，學生學的是「半鹹半淡」的語文。既然如此，不如索性用中文全面教授課程。

筆者最近參加了一個由智囊研究中心「蘭克公司」（ Rand Corporation ）主辦的教育政策研究會。在美國，不少地區的學生母語非英語。在加州50%的中小學生是墨西哥，他們的母語是西班牙語。和其他移民族裔比較，亞洲移民也以「非英語」爲母語。墨裔的教育表現奇差，而亞裔則表現一枝獨秀，比較母語是英語的白種人的公開試分數還高。但是墨裔即使以西班

牙語授課，他們也一樣落後。由此證明，選擇以母語教學並不能夠直接提升學生的學習表現，其他文化因素也構成重要考慮。

在選擇方面，有足夠能力的家長自然可以選擇將下一代送到英語國家接受中學教育。正如透過香港上一代有能力者的選擇，不少今天在香港具體面和地位者，都是在英國接受中學教育，譬如首席大法官李國能、律政專員馮華健。

但教育政策是從社會整體着手，不是方便有選擇的一小撮人。

再談母語教學的爭議

不少家長誤解了母語教學的目的，母語教學和減弱英語能力是兩回事。在歐洲，瑞士人和荷蘭人是語言天才，能夠說流利兩、三種語言的人甚衆，但他們的母語可能是在世界上極少人懂的荷蘭語。

既然香港是中國一部分，從民族尊嚴的立場看，精通中文是國民教育的任務。何況，中文是世界五大語文之一，以人口計是最多人用的語言。懂中文是有實際需要。

從教育心理學角度分析，用母語教學令學生瞭解課程較外語見效，這是有科學根據的。特別是中文和英文是屬於兩個不同的語言體系，兩者是沒有「正面技巧交替」(positive skill transfer)。換言之，中文運用技巧高超不能幫助學習英文。如果家長能夠相信科學的根據，照理應該支持以母語教學。

以前香港的社會風氣是重英輕中，子女就讀英文中學，不論英文水準極差，也較中文中學受器重。以筆者多年來在香港和海外教學經驗，香港學生以往的英文根底不錯，在海外進修和講學，英文的表達能力比中國大陸和台灣高，和新加坡可爭一日長短；但最近期則在明顯地退步，這個現象極令人關注。

事實上，在小學和中學，最重要的科目是語文和數學，只

要語文和數學根基穩健，其他的理科科目如物理，文科如歷史便得心心應手。

筆者鼓勵香港中小學家長對母語教學多發意見。而政府應該從教育研究的結果，解釋母語教學是合理的和能直接令學生得益。

三論母語教學的爭議

讓筆者批評香港的英語教學。首先，假若教師本身的語文水準差，很難教到好學生。一般在小學教授英文的老師，很多沒有接受過正式教授英語的訓練。教歷史的教地理的也濫竽充數，老師的英文修養、措辭、發音、閱讀能力根本是「自身難保」。第二，老師的母語非英語，連日常會話和英語基本運用也沒有掌握能力。第三，忽視了英文欠佳的學生是會影響他們閱讀所有英文學術教科書的進度。第四，語文教學是活學活用，生動而多姿多彩的活動。不能在課堂上「依書直說」的枯燥教授。筆者中學時學英語，有英語辯論、英語朗誦、說英語周，還替校刊寫文章，五花八門。在香港缺乏英語接觸的華人家庭，更依賴校方的刻意培養應用英語的場合。

再說中文教學。香港一般人輕視中文，已成風尚。至今很多筆者的朋友很驚奇，以筆者一介「番書仔」能夠寫一篇也可登得上《信報》的文章，難道一個母語是中文，讀了中文二十載的香港人，連一篇普通中文文章也應付不來？香港的中文刊物和台灣及大陸的略有分別。提高中文水準應加強培養閱讀興趣。即使在美國，大部分青少年課餘沉迷電視，閱讀書報的人數每下愈況，一代不如一代。

香港不少人以考試爲教育的唯一目標，學生在應付考試已筋疲力盡，何來時間閱讀課外書籍？筆者相信，要求香港的家長放棄考試競爭是難若登天。香港本身是一個競爭性強、弱肉強食的社會，在現階段，只要家長認識到中國語文好對就業有幫助，他們自然會以務實的態度，去鼓勵子女多讀中文。

論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市場

筆者在最近讀到美國不少報章的財經版，討論美國的大學畢業生面臨就業的選擇較他們的期望低，譬如當租車公司門市職員、賣二手車經紀、洗車公司監工等。

香港的情況又如何？三十年前，筆者中學會考畢業時，已有同學進著名會計師當會計見習生（ trainee ）以實習學徒的方式考取會計師執照。今天，就是會計系的榮譽生也要競爭一番。筆者一位朋友的女兒在加拿大大學會計系畢業，但香港的著名會計師行也把她拒於門外。大學學位成爲很多行業基本入行的條件。在美國，金融界的的要求更高，如無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很難「紮職」升級當經理。可見世界性的學位風愈吹愈烈。

有些行業如大律師公會更醞釀要求大學二級榮譽以上的法律畢業生才可入行，以菁英選拔作爲標準。事實上，有些著名律師行在招募新秀時也有內參「不聞名」的學院或等級名單。

就是日本，以往只要進入名校（如京都大學或東京大學），不論閣下在校的成績高低，大型的株式會社（如三菱）或大銀行（如三和）均會取錄。聽說最近大學畢業生在供求方面僧多粥少，大學的表現已被考慮。

美國大學非常緊張外界對它們排名的次第。筆者任教的史丹福大學，它的商學院曾經從榜首跌到第三、四名。院長立刻召開緊急大會商討對策，更動用公關部門質疑排名的標準尺度。理由很簡單，校方不希望排名落後，影響學生的就業市場。

香港七間大學的排名先後理應對畢業生的就業有影響，香港傳媒沒有美國有系統的統計數字，但並不排除僱主已心中有數。

排名可能對一些新建設或剛認可的院校不公，因爲有龐大的畢業舊生網的學府比較照顧後進，而舊生「人丁單薄」的學校便會吃虧。

如何跟大陸精英爭一日長短

筆者在亞洲「打滾」的年代，碰到不少亞洲區的外援（Asian expatriates），其中以新加坡和菲律賓籍的中層管理人員，在跨國公司中最備受重用。他們的英語水準和專業知識剛巧是亞洲所缺乏的。筆者在美國大學任教法律學院和執業中也教授和結交了不少對亞洲有認識的律師，就是一些剛離校門，懂一點普通話的美國法律學生也是「搶手貨」。香港面對的競爭對手不只是中國留學生，而是亞洲各國的精英。

無可置疑，跨國公司在選擇從事到中國辦事的人員，中國長大的自然有他們的優越條件。

但中國留學生未能滿足市場的需求，原因是他們是仍是以理工佔多數，他們的數目和市場需求有很大的距離。中國理工留學生不少是研究生，他們的就業市場是研究院和大學。他們在跨國企業的經驗和西方社會的人際關係，還未到爐火純青。譬如，在市場推廣、宣傳跨國公司形象和企業上層溝通還沒有足夠的經驗和自信。香港應該在這方面保持優勢。

在中國華南沿海一帶，香港已儲備豐富的經驗。但在長江以北的中國，香港的優勢還未建立。一間美國公司到北京設辦事處，它會選擇一個從北京大學畢業到美國留學的中國人駐

守，一個只懂廣東話的香港留學生自然被冷落。但是香港人的商業頭腦，以及對東南亞和台灣的認識並不是一個北京中國人可掌握。譬如，跨國公司要調派一個亞洲僱員從北京到新加坡或台北，它的對象會是香港人而不是北京人。這不是一個假設而是事實。中國是「獨腳戲」，而亞洲才是「大銀幕」。香港的年輕朋友不用氣餒，只要香港仍然是亞洲的商業重鎮，大陸精英不可能完全取代你們的優勢地位。

筆者也曾和國內，台灣和香港律師共事。兩岸三地的作風有明顯的分別。香港的律師專業水準較高，和外國律師接觸的作風和經驗的作風和經驗，中國大陸一般和香港還有很大的距離。台灣的金融機構還是保守內向，但在高科技上進步。香港應利用本身的「本錢」，鼎足而立；在知識和技術競爭中，香港要洞悉大勢。

香港政策研究的前景

以數字統話，北美洲（加拿大和美國）出產的博士佔了全球50%以上，但仍然足夠提供他們就業機會。香港的專上學院出產的大學畢業生和高等學歷人士，是否會有人滿之患？香港是否已進入醫生、律師、牙醫供過於求的地步？

人口比香港還少的所謂先進國家如紐西蘭、以色列在十數年前已面對這些飽和局面。筆者在歐洲曾和數位高等教育計劃人士討論這些問題。

以美國計，很多獲博士學位的研究人才已進入政策研究，脫離學術研究。譬如獲社會學博士的人加入市政府人口分布計劃統籌，犯罪心理學的當警察部門顧問，學經濟的加入私營金融機構。雖然當教授仍是博士的主要晉身行業，但就業市場的多元化在亞洲（如香港和台灣）仍是他們夢寐以求。

在香港，社會調查研究已非常成熟（見劉兆佳等編，Indicator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1995，由中文大學出版）。香港政府的政策（如就業、房屋、治安）如何依賴這些研究結果？令筆者費解是為何最近兩本有關香港的權威書籍：The Hong Kong Advantage 和 Made By Hong Kong 由「外援」學者編著。

筆者並非主張學術「排外」。如果美國的社會調查和導向性著作外國人主編，必然引起轟動。筆者建議香港政策導向的研究應該以海內外學者携手合作，比例上可以是五十比五十。假若這些研究由外人操縱主筆。香港土產學者和研究生便失卻了寶貴的參與研究經驗。最可惜的是，五至十年後這些研究會否在實踐和實行上碰到難題？跟進上造成人才脫節？香港仍然停留在學術「半殖民地」地步，永遠依賴外援。

民生與政治

一位身家過十億的香港上市公司總裁兼大股東兼十數年朋友到訪，他勸喻筆者多寫些有關民生和建設性文章，少寫政制及「挑剔」特區政府的「謬論」。他的一番話語意深長，目的是指點筆者迷津。

以筆者的美式思想，民生與政治是混爲一體，是錢幣不同的兩面，見仁見智。商界人士和文人的思路大異其趣。特別是商人對當權人士，多以迎合取悅爲上策。

美國媒介慣用的「社會工程師」（social engineer）一詞是政客和政治評論員的代名詞。一些民生問題如減低稅額、小學由半日制轉全日制、大學本科課程由三年改四年、政府增加公衆房屋，表面上是民生問題，再深一層分析，是社會資源分配的多寡，也是政經相互交織的問題。

財經界和政治問題很難分別討論，譬如香港財政司動用十億元去挽救泰國貨幣危機。數年前美國也用同樣手法去拯救墨西哥瀕臨崩潰的經濟。各界議論紛紜，支持和反對參半。當然泰國和墨西哥的前因後果是有分別。但觀察諸國的辦事方式可以借鏡，舉一反三。無可置疑，香港社會對民生關注是理所當然，任何形式的政府亦以解決民困爲優先考慮，衣食足始知榮

辱。

討論民生而不涉及政治是沒有可能的。既然筆者以論政爲己任，自然參考不同的國度，以海外諸國的經驗來求證香港的政策運作和施行的可行性。

律師論政也有甚多盲點，譬如律師對經濟模式多是門外漢。第二，律師的本能反應是一切政策透過法例推行。但法律往往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第三，律師習慣從案例中找尋原則，但政策研究是達到目的後才認定原則。在邏輯思維上，律師長於分析而欠果斷。

全球視野，地區行動

美國企業在世紀末的口號是「全球視野，地區行動」（think global, act local）。美國商界醒覺，以美國本位的商業策略並非放諸世界皆準（見Gareth C. C. Chang在《洛杉磯時報》，九七年十月十二日文章：Global Thinking: Good for Business）。

香港的競爭力並不是靠香港的市場，在人口數字方面，香港人雖然購買力不弱，但比較中國和東南亞，香港市場仍然不算龐大。正如信報刊登的數篇頗有啓發性的文章中，提到香港成爲軟件工程重鎮，相信還有一段距離。

筆者在過去十年不斷警惕香港政府，要保持護照和香港人到世界各地公幹辦事的活動自由和資訊的暢通，才是製造香港全球視野的先決條件。

事實上，產品製造和服務性行業是沒有明確的分野。譬如產品設計（由高級女服到T恤）、製品廣告、存貨管理、發行分銷網都靠產品製造商合作。設計服飾的技術和如何替產品售後保養是關連性的服務「價值加重」功能。不少外國入口中國的汽車缺乏保養的廠房配合，造成產品不能暢銷的運作問題。

筆者建議香港在配合地區行動上作出貢獻，譬如在服飾設

計上鼓勵年輕人的創造力。香港在珠寶設計上領導世界。正如瑞士是酒店服務人才的訓練先鋒，香港也可學習，將來香港訓練的酒店經理，可以到中國任何一個城市的五星級酒店當總管。

香港的會所如香港會、鄉村俱樂部等的模式，可以在中國和亞洲移植。會所是英美遺留的產品，正如賽馬是英國人的高等交際場所，再配合中國人對賭博的興趣，製造了「香港式」的賽馬公開博彩，是典型的地區行動，在世界任何地方也不能夠像香港般發揚光大。

中國國營企業的估值

美國財政部長羅拔・魯賓出身是投資銀行家，以精打細算馳名。他到中國訪問，在西安市參觀一間國營企業，總裁向他解釋該企業的資產，魯賓最精闢的問題是估值的會計師是否中立？

筆者最近在南加州大學國際研究中心宣讀了一篇文章：《中國是否在走上資本主義的康莊大道？》該研討會是由大學和德國的智囊中心合作舉辦，在研討會中參加者對東西德統一後，如何將兩個不同的經濟系統合併最感興趣。德國學者之中，有一位是西德政府派到東德調查東德國營工業的市場估值。他的論文給我們研究中國國營企業股份化的觀察有啓發作用。

德國專家承認，東德的國營企業被西德經濟學家高估了價值，很多東德工業產品的製造生產過程落後和陳舊令他驚駭。資產根本是負面價值，產品完全不可能在公開市場上競爭。東西德的合併是資本主義把社會主義打垮，東德人也承認他們的制度不能在資本主義掛帥的國度生存。

從德國專家的經驗，我們可以警惕如何將中國的國營企業作出符合經濟原則的估價。

筆者曾經輔導一間外資高科技公司和中國的合資工廠「拆股」，他們最後不歡而散，一個原因是外資高科技在中國境內不能生產，錯不在中國沒有技術人員而是中國境內的空氣中的塵埃成分太高，高科技產品會被污染，不能迎合市場需求。香港是否能夠成爲高科技發展中心，也應該考慮一些環境因素。

一間美國機械生產大公司到中國合資，由工程師先頭部隊到中國廠房觀察和作出可行性研究報告，貶多於讚。其中一點是中國廠房油漬遍地，對工人的安全構成危險。無怪筆者十年前在香港處理的工業傷亡訴訟案件所見到的原告以大陸新移民居多，他們對工業安全的設備視若無睹。

當中國國營企業準備到海外集資，外國商團會對中國會計師如何估值的方法認眞研究。這是筆者參加該研討會最有價值的收獲之一。

中美敵對下的香港

讀到英文的錢學森傳記，記載五十年代的世界頂尖級動力工程教授錢學森雖然已入美籍歸化，但被美國聯邦調查局監視的描述。《林思齊傳》中寫到美資賓士域保齡球廠，拒絕在霍英東公司當業主的星光行安裝器材。楊振寧到香港演講，出入有美國情報人員作伴，防止他和中國人員接觸，連帶和中國大陸居住的親戚通訊也遭禁絕。五、六十年代準備到美國留學的香港學生恐怕被跟踪，在申請期間連國貨公司也避之則吉，我們不希望見到中美兩國再次進入冷戰仇視局面。

有美國「中國通」警告，在美國研究中國的學術界，中國留學生的年輕教授將是「接班人」，並提出「黃禍」將至的聳人之言。

筆者在本報曾寫了一篇〈外國制裁中國香港怎辦？〉（見《前瞻特區未來》，頁90—91）。在美國國會獻金聽證會中，突出有中國商業關係的力寶集團和何東集團，反映美國是「項莊舞劍」。中國是美國的勁敵，中美敵對的立場也被一些有政治利益的政客和激起中美仇視的外國政治實體（如台灣）漁人得利分子利用。

香港處身在一個「殃及池魚」的險境。在美國，一般的輿論

對香港回歸是被「同文同種」的英國牽着鼻子走。筆者也曾不厭其詳地指出香港是對美國友善的地區，香港人不願被牽進中美對罵的受害境地。香港人吃加州「新奇士」橙是世界之冠，荷里活文化在香港已水乳交融。美國商會在香港是美國境外會員最多的一個。

中國派到外國留學的年輕一輩，以美國爲首。美國應該珍惜這些文化交流。中國的經濟開放是迎合美國國策，香港應在這方面下些工夫，充分發揮橋樑作用。

也談大學鐵飯碗

在美國有一句笑話，「只有退休人士才有鐵飯碗」。大學的「終生任聘」也是危機四伏。首先，從初級教員到博取「終生任聘」，在名校如史丹福大學，要經過七年之久的試用觀察期。不少學者懷疑，要等待這個「特惠」須長年捱低薪兼「受氣」，是否值得？

很多大學受經濟不景氣所襲，有些科系被削，連教授、系主任之職也被除去，有「終生任聘」的教席要提前退休，不少年齡還不到五十。有些已年前停止加薪，終日誠惶誠恐。有些學科較有市場價值，如醫學院的研究，經費也縮水，大學強迫醫科教授到醫院「睇街症」，對研究有鴻圖大志者也迫於無奈，既然要重操故業，爲何不早年「下海」？

就是做研究，也有時尚和落伍之分。如研究愛滋病可以一舉成名，但研究魏晉南北朝詩歌則難望「大頭相」出現《時代》周刊封面。現在流行資訊網絡、跨國貿易，十數年前則無人問津。沒有鐵飯碗，大學可以隨着潮流，應運而生，不合時宜，提早收爐。

當教授學者面對殘酷的市場調節，除了受研究的流行風氣主導，還要看學生選擇修讀科目多寡的物競天擇——學院式達

爾文進化程序。沒有足夠學生修讀的科目首當其衝。有些式微學科，教授爲求自保，分數「賣大包」，逢人派A，有教無類，永不落空。

當大學教授也作生存計，甚麼崇高的理想也不能當飯吃。基金雄厚的長春藤大學還可以唱其高調，但在依賴政府和公衆支持的美國大學，教授學者也是「做一日和尚敲一日鐘」，管他「終生聘任」與否。難怪美國的博士研究生多是外國學生。

香港式的中國法研究

在香港研究中國法，筆者也算是開山始祖，在一九八二年已開始積極參與中文大學的中國法講座，同期的學者有張鑫、翁松燃、廖光生、關信基等。一九八五年兼任香港大學法律系中國法講師，同年陳弘毅剛進港大任講師。一九八六年澳門東亞大學首創中國法文憑，筆者是顧問教授，收集了大量英文有關中國法的刊物，爲學生編訂閱讀指引。一九八七年開始在美國數間大學教授中國法。也曾回祖國交流，幫助中國法律學者到美國研究和給中國不同的訪問團培訓。

以筆者的實踐經驗中，在香港研究中國法應該建立獨特的風格，既不可盲目追隨國內風氣，也不可完全採用歐美的模式。

如果香港研究中國法是追着國內的方向，永遠是在北大、復旦、中山、政法、人民衆大學的後面。中國大學的教授年薪不及香港教授五十分之一，以經濟成本論，極不化算。無可否認，在國內的大學中，有歐美學位和研究經驗的中青輩已經漸露頭角，他們也不會欣賞香港的邊緣式地位（marginal status）的中國研究，他們才是正統，香港只在「偷師」。

歐美研究中國法面對的問題在三方面：第一，在歐美爲了

迎合西方口味，只能採用西方治學方式分析中國的意識形態，充其量只能烹出「西餐口味的中國飯菜」，在中國人眼中是不倫不類，既膚淺又與中國實情脫節。第二，西方人士對中國文化和歷史的認識和香港有一段距離。懂法律的教授只懂中國的皮毛，懂中國歷史的又不懂法律。兩者兼備的人絕無僅有。第三，在歐美研究中國法是冷門的「地區性」研究，熱中程度和國際學術的支持是非常有限；倘若不是中國貿易能夠製造些就業機會給法律系學生，爲了學術才研究中國法可謂門堪羅雀。筆者必然是身受其害的倒霉教授，在美國任何法律名校，中國法是「可有可無」的選修科。

事實上，在歐美刊物撰寫中國法的洋教授，來來去去都是那一小撮人，除了是從大陸到美國留學的研究生。其中數位筆者也曾是他們的導師，一般香港人對中國的認識是身體力行，從實際經驗出發，到中國經商的生意人洞悉中國的本能極高。正如筆者在香港大學任教時，有一學生十三歲才從中國移居香港，每月回廣州一次探親，如果筆者胡說八道，她一定心裏有數，只會令她鼻視。

中國學者探討中國法缺乏比較和批評的深度。香港可以將中國法和西方的資本主義法制比較和觀摩。法律是人文科學的一支，法學研究是和哲學、經濟學、歷史及科學結成一體。筆者經常和中國到美國進修和研究的學生和學者共事，他的長與短處，筆者略知一、二。香港應該取他們之長和棄他們之短。

香港這本書很深奧

姜恩柱慨嘆香港這本書很深奧。習慣在中國大陸政權下生活的高級幹部，如許家屯到了香港，從他的回憶錄中窺見他們對香港式的資本主義社會確是認識膚淺。

不少中國大陸留美學生被聘請回香港任職前，不論是香港的大學或專業單位，他們也向筆者這個「香港通」了解情況。

首先，要認識任何社會便要主動參與，不可閉門造車，尤其是表面和內涵是大異有趣。香港所發生的事情和歐美傳媒所報道也非完全脗合。香港算是一個讓不同聲音大鳴大放的社會。沒有長期在香港居住和入世的人，對香港是瞎子摸象。正如佛利民時常讚賞香港的經濟自由原則，只是非常表面化的觀感，香港商業界中仍然存在壟斷性企業。

筆者認識一個畢業生，在美國各州投資地產的成功生意人向他請教，發掘他無往而不利的投資不同地域的成功秘方。他不斷每天閱讀當地報章，洞悉人口分布、經濟走勢，居民年齡、就業情況、生活方式。跟着到該地居住，建立社區關係，到市政府調查研究，聘用當地專業人士作輔導，身體力行，儼如一個人類學家到落後部族的觀察。

姜恩柱要學懂香港，切忌自我禁閉，但無奈他身份敏感，

他接觸的本港人士可能只講些他喜歡聽的話。筆者建議他讀些有關香港歷史、社會的中英文書籍。

美港大企業的總裁和政府部門首長有下屬將有關資料收集（英文是briefing），讓「老闆級」能夠在最省時間的情況下明白一些複雜問題的來龍去脈。這樣的「即時滙報」是靠閱讀者本身對問題有基本認識，才能吸收。

姜恩柱曾任中英聯絡小組中方成員及駐英大使，如果他能拋棄他社會主義和民族主義的兩副眼鏡，認識香港並非難若登天。

律政署十步之內豈無芳草

記得在殖民地時代，筆者在香港任大律師，有些行家從律政署「跳槽」到私人機構執業，無論華洋種族，他們對律政署貶多於讚，衙門內幫派林立，人憎鬼厭。

十步之內豈無芳草？筆者認識數位牛津大學畢業的英籍前輩在律政署內任職，是敬業樂業的一羣。其中一位資深檢察官是筆者牛津早一年畢業的學兄，起訴刑事案件，頗有君子風度；公餘和筆者交換法律笑話書籍，爲人風趣幽默，筆者對律政署的官員並非完全是負面的觀感。

但律政署也有一些令人討厭的有「白人優越感」的大律師，同樣地，在私營執業的法律界，也有自以爲英語比華人強，但在祖家「拍烏蠅」才到殖民地作威作福的「混帳傢伙」。

筆者希望在主權回歸後，香港能夠清理一下司法和法律界的頑劣分子。在華籍律師中，也有不少崇洋媚外的民族自卑類。有些洋法官和裁判司實行「一庭兩制」，見到洋律師或假洋鬼子律師出庭便網開一面。但對英語帶本土口音的華籍律師則黑口黑面。能說流利英語並不見得其法律觀點超卓。

在殖民地時代，一切以英國爲尚。從接受法律訓練開始，華籍學生便產生自卑感。筆者在英倫學習法律時，一些英國的

法律同輩只是平庸之輩，但一到殖民地便受寵若「驕」，不可一世。相信這些殖民地殘餘仍然盤踞香港司法和法律界。

筆者認爲法律中文化是「剷除」這些落伍人士的辦法。爲何在中國境內，仍可容忍不尊重本土文化背景的外強「中」乾的特權人物？

畢業即失業是誰之過？

香港衆大學的社工畢業生面臨失業，是否政府的錯？

筆者任教的法律學院，每年學校替學生尋找職業，也是頭痛問題。在美國專科畢業如會計、法律、劃則師、醫生、學校完全沒有保證「全民就業」的承諾，求職以市場調節主導，閣下找不到合意的職位，不要埋怨或怪責校方。

人力統籌就業市場並不能百分之百啣接。只有天國才有供求平衡。在美國，學生選擇專業訓練很關注供求問題，有些特別技能和中層管理的職位如護士永遠是缺乏人才，香港的護士供應也不足，其中原因是護士多女性，薪金不高，不少從事護士工作的女性結婚後便脫離行業；護士的工作環境比教師吃力，因此教師沒有護士的高流失率。

筆者認爲香港政府能夠做到的，是引導選擇社工的年輕人投入護士訓練。譬如將護理升格爲大學學位課程，特別是亞洲人對「四方帽」情有獨鍾。選修護理有獎、助學金，受訓期有薪金，以這樣的措施將人力轉爲正面供應。

是否受了社工訓練便要當社工？筆者認識的社工畢業生轉行的甚衆，當政務官（如梁寶榮）、運輸局、律師、機場管理的大有人在。二十來歲的年輕人不要一成不變，要懂得靈活變

通。

大學訓練不能學以致用，是否浪費資源？這是無稽之談，不少讀完大學的女性，全職當家庭主婦，相夫教子，難道她們是浪費人力？

筆者勸喻失業的社工系同學動些腦筋，靈活運用知識。

洋大法官的去留

香港華洋雜處，筆者素來主張只問才能，不問種族，發揚香港精神。在美國，和一些中國留學生傾談，他們都曾收看香港主權移交儀式的電視節目，十居其九的中國留學生，覺得特區司法界中衆多的洋人大法官是非常「礙眼」，尤其是李國能的普通話更令他們耳目一新。

筆者最近到英國考察，英國本土的大律師行業都是人滿之患。香港的洋大法官、洋大狀要回流「祖家」找到一份職位，插針難下。雖然是同文同種，到殖民地流放的英國人回家也受排擠。特別是有些英國行家，覺得「次流」貨式才到殖民地覓食。既然在香港賺了大錢，不應該回流搶他們的飯碗。正如一名曾長期在香港幹活的英籍大狀，回流後仍然在大學當教授的朋友一語中的說：「他們仍然有一份工，不應該埋怨特區政府薄待他們。」

如何能夠解除大陸的中國人對洋人在香港特區仍然享受特權的觀念？筆者曾請教一位中國大陸法律副教授，他認爲香港既然是以中文爲法定語文，不懂中文的法官和律師應該在五年後不能繼續在香港任職或執業。

筆者再向他解釋，不少有中國血統的法官和律師也是中文

「有限公司」。是否以種族爲劃線，便是種族歧視？他的解釋如下：一、中國血統的法官和律師，只要他們是中國籍，便應該給他們十年期限，讓他們增加中文語文的應用能力；二、外籍人士到中國境內任職政府官員，不可能連中文也不懂，這是基本條件。

不知香港的洋人大法官聽了中國法律教授的分析，如何替自己辯護？

政策研究與市場導向

美國的政策研究智囊團最近大展拳腳，從大學象牙塔殺出市場，筆者出席了數間不同性質的智囊團主辦的半學術演講會，舉行的場地是大都會的商會、會所和政府部門，遠離大學校園。不少政策研究中心招兵買馬，一貫從事學術的清高學者一改常態，跑到外間找尋顧問或政策計劃（policy project）機會。特別是有關經濟民生、外交政策的題目最搶手。譬如，研究教育的選擇「改進新移民的學習態度」、「問題青少年的就業處理」；經濟學家講貿易赤字的調整、企業重整技術、股票投資的策略。題目愈是入世愈容易籌款。

在商學院任教的名牌教授情願放棄教工商管理碩士班，轉教收費昂貴、招收企業經理的短期課程，目的自然是把自己的專長以「高姿態」傳授給學以致用的大公司管理階層。

美國的企業有兩個可愛之處，首先，管理階層崇拜外界專家，筆者在慈善機構任無薪董事，機構的籌款聘顧問，甚至連夏令營的管理也請專家給意見，替各式各樣的專家製造就業機會。而專家的名聲愈高，收費愈貴。

政策研究員中，曾任職政府或大企業的過來人更吃香；如果香港的退休高官能夠到學府中浸淫一下，或者文筆流暢和能

言善辯，加上良好的人際關係，簡直是如虎添翼，一篇意見書便洛陽紙貴，無怪政策學者正勤力撰文刊登在各大報章及著書立說。

香港和中國是政策研究的處女地，筆者認識一位曾在香港的大學執教鞭、現回美重操故「職」的教授，他認爲香港的政策研究還停留在剪報的未成熟階段，有高等學位或專業資格的名士對任職政策研究只好望門興嘆。

亞洲完蛋論

年多前筆者參加一個亞洲經濟研討會，由史丹福大學經濟教授古克明（Paul Krugman）主講，他預言亞洲的強勢經濟國家如四小龍、馬來西亞和印尼將面臨經濟萎縮。當時確是駭人之言。

上周筆者也出席了兩個亞洲經濟學術會議，一個是由筆者任教的大學和新加坡南洋科技大學合辦，另一個是亞太經濟協會（APEC）專家的學術會議，筆者得到以下的心得。

過去十年間，亞洲諸國只關注經濟增長的比例分數（Economic growth comparative percentage），特別出口主導的增長，而忽略了境內的制度改革，但當出口飽和，或新興的經濟如中國以更龐大的勞工密集和成本更低的物品出口，東南亞的「半先進」經濟景況造成失調。

專家們指出印尼、馬來西亞和泰國沒有積極將金融市場開放和國際化，欠缺公債市場（bond market），更容易造成貨幣危機，專家批評馬來西亞總理馬哈蒂的閉關自守政策和一些國家不將本國金融市場開放給外國機構是「鴕鳥政策」。

筆者和數位新加坡教授談論香港以新國爲師的利弊，獲益良多。事實上新加坡也有一本難唸的經，但新加坡的「形象管

理」（ Image Management ）較東南亞其他國家運用得宜，一個平凡的女孩化粧成雍容華貴，要明白新加坡的內在運作，不可只靠道聽塗說。

各國專家同意未來亞洲經濟將受中國的影響最大，有些專家矛頭指向中國，將東南亞的貨幣危機歸咎於龍的傳人，似乎研究中國的經濟和政治在未來幾年間仍然是市場暢旺，但是亞洲將面臨經濟調整而並非完蛋。

香港的競爭力

一間美資極具規模的成衣製造及分銷商，準備把位於香港作爲中國區總部的辦事處搬到深圳去，估計每年可節省五千萬港元。他也準備把香港的員工從三百五十人減至三十人。原因是香港租金昂貴，成本過高，特別是在中國用香港薪酬的十分之一，可聘請同樣水準的員工。從這實例可以警惕香港的競爭力已今非昔比。

一些在美國工作若干年的金融界朋友回流一族。回歸前打道回港，結果上班後發現任聘他的外資銀行主管部門是大陸留學生，年紀和資歷較他少，但是懂得在中國「拉關係」，極受器重。

七十年代以前，香港大學替新加坡和馬來西亞培養了不少人才，新加坡近日已派學生留學往北京大學等中國有名氣大學進修，吸收中國知識。

除了在人才培養方面，香港面臨競爭力的考驗是如何繼續成爲外資進入中國的跳板；同樣地，中國如何充分利用香港的國際關係。香港的成本不高，本來是沒有多大問題，因爲以往中國沒有任何地方可取代香港。但未來五至十年，以經商無國界爲原則的外商，只要可以減低成本而增加盈利，他們是不會

對香港「動眞情」，眷戀香江。

當中國大陸人口的購買力增加，任何中國沿海的大城市人口都比香港多，以分銷網計，到廣州、上海、北京、武漢開設分公司以節省費用和開創新市場計，香港的特別地位只會被削弱而不會被重視。

香港唯一可取勝的是她健全的金融制度、資訊發達、出入境自由、無外滙管制、港幣與外幣兌換容易，否則只靠人口和地利是難以維持競爭力的。

燒乾了的律師

俗語云：「做哪行，厭哪行。」英語更來得簡單：「燒乾」（ burnt out ）。

讀到《亞洲華爾街日報》報道，筆者的一位法律界前同事董馬可，放棄了律師專業，搖身一變，成爲亞洲電視的新聞報道員。新聞報道員在美國是萬衆矚目的鋒頭人物。全國性的電視網如NBC、ABC的新聞報道員直接影響電視台的收視率。他們的地位可以媲美電影明星或政治人物如總統。

《亞洲華爾街日報》更提到董君因對律師行業的「收費時計」（ billable hours ）生涯產生厭倦，故放棄了專業。

筆者認識的步入中年的「燒乾」律師不少，有些借酒消愁，有些離異找新歡，有些自我放逐，也有不少轉行，重新找尋生命的眞諦。

除了律師，其他專業如牙醫、會計師「燒乾」的數目也可算高。筆者認識的牙醫轉行做地產，會計師開餐館。但很奇怪，大學教授和從事創造性行業如作家「燒乾」程度比較低。美國的統計數字指出，大學教授是各行業中最具滿足感的。專科醫生較家庭普通科醫生的「燒乾」率低，商業飛行員的「燒乾」較律師低。

根據麥克倫（McClelland）的「需求層次表」（hierarchy of needs）分布，當人飽暖後不是去思淫慾，而要求滿足更高層次的需要，譬如社會地位和自我的快感。

無怪不少已略有儲蓄和兒女成才的「中坑」專業人士或管理級人馬放棄高薪的刻板生活，轉行當非牟利機構的幹事，情願收較低薪酬甚或免薪服務，回饋社會。筆者在不少大學或慈善機構的董事局，結識了這一類「燒乾」了的律師。

如何解決
中國的人口問題

一個生活比較富裕的國度如美國或香港，如果沒有移民，本土的人口增長是負數，即使國民的生命延長，但在生育方面，在美國是平均每家庭1.35至1.75。

但中國沒有移民問題，要控制人口增長，便正如朱鎔基所說，解決最令他發愁的問題唯有靠教育和科技。

應增加女性受教育機會

筆者認為環顧各國的人口控制歷史，強迫性的「一胎制」只能局部控制人口。長遠計，政府要令國民自動自覺地「減產」，才是兩全其美。

以美國人口計，不同族裔的生育數字有異。拉丁裔的人口增長最快，除了他們佔新移民的比率高外，一般教育程度低，信奉天主教（反對墮胎），農業背景。但奇怪，在受過高等教育的天主教徒或是拉丁裔人，他們的生育率比較沒有受教育的同輩低。

在不少發展中國家如巴基斯坦和印度，一個生育高低極有關連的社會現象，是當地女性受教育的普遍程度和女性生育孩

子數目成反比。

由此可見，在控制人口上，中國應大量增加女性接受教育的機會。愈有教育的女性，愈容易向他們配偶說「不」。

科技與人口控制的關係，沒有教育一樣直接關係。科技反而是導致人口膨脹原因之一。最簡單是當醫療進步，生命延長，自然令人口老化。但是人口老化並非迅速增加人口的主因，原因有二：一、一般生育是青年人，而生育才是人口失控的原因；二、當醫療進步，同樣出現教育普及，這類人無論在任何國度，對多產都沒有多大興趣。

人口流動不應制止

人口失控導致不少社會問題。就是在美國，家庭教育的多寡往往是和青年問題掛鈎，「多產」者在某些文化體系中被視爲不負責任。中國的傳統思想「多子多福」變成社會罪人。

在消極方面，香港亦不希望成爲中國大陸人口「出口站」，香港本身已飽受人滿之患。但沿海省份富裕而中部落後，人口自然大量流動，就是政府立例禁止人口移動也是徒勞無功。

從聯合國扶助貧窮國家的經驗，解決人口問題的第一步，是將農村的教育從最低層開始。不少發展中國家在教育上本末倒置（如印度），政府只顧面子，提倡高等教育，但長期忽思小學教育，特別是在窮鄉僻壤，文盲過多。中國應密切注視。

人口流動不應制止。因爲透過流動，財富和訊息才可交流，雖然人口是一面倒的從貧窮地區往富庶沿海走。但不要忽視所謂「盲動」的流動力，他們是將沿海的財富和訊息帶進內陸的「媒介」，如果沒有他們，訊息交換和財富分配更形僵化和落

後。

中國人口的暴漲也可歸「功」於毛澤東的「農村」式不合時宜的國家策略。倘若過去中國領導層明瞭世界大勢所趨，人口問題的嚴重性，可能今天中國的人口問題不致是朱鎔基列爲第一號令他「發愁」的頭痛難題。

博雅教育
在港的接受程度

筆者適逢其會，參加了嶺南學院的課程介紹日，並參觀了其他在屯門的校舍，更聽了三度校友（皇仁、港大、牛津）陳坤耀校長的致辭，解釋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的目標和理想。

美國博雅教育自成一格

正如陳校長所說，博雅教育在美國已根深蒂固，深入民心，但在美國境外，包括歐陸它還是一個簇新的觀念。換言之，嶺南學院是否能夠成功地建立學術江湖地位，須要讓博雅教育在香港獲學界和學生接受。

美國的博雅學院自成一格，以卓越的本科生育爲號召，研究爲輔助性質，博雅學院捨棄綜合大學以專業學院（如醫學、法律、工程）而在某些本校生課程上力求精益求精。

美國的著名博雅學院如Dartmouth, Williams, Smith, Pomona, Occidental, Scripps, Haverford, Wellesley等，它們的畢業生在進研究院、專業學院及就業的出路不下於名牌大學如耶魯、哈佛、史丹福和普林斯頓。博雅學院歷史悠長，不

少畢業生的後代是一脈相承，捨名牌大學而步父兄後塵，選擇博雅學院。這個風氣須要假以時日，不是朝夕可以培植，嶺南學院在這方面較吃虧。

香港學生與家長未能接受

以就業市場計，在香港這個講求投資回報率的務實社會，僱主對博雅教育的欣賞和接受程度，也影響了中學畢業生和家長在選擇學府的導向。老實說，一間只收「人棄我取」的大專院校如逆水行舟，不進「必」退。筆者認識的一間著名美國投資銀行，在招募金融分析員這些高薪僱員時，對博雅學院的畢業生情有獨鍾，它們要求入行的年輕人，旁涉古今中外的政治經濟大勢書籍。因爲這些行業的專有技術可以在職訓練，但是個人的性格和視野是在學院中建立。

博雅學院力拒人口膨脹的趨勢，學生人數不會超過二千，務求在密切的師生關係上增加思想的溝通。正如牛津、劍橋，是以學院爲教學的學生生活起居的核心。大學的教育除在學科的灌輸外，如何面對日新月異的世界和與人相處的技巧，均不可忽視。教育不是濫發文憑的工廠，筆者素來以母校爲榮。成功的教育是學校和學生培育了終生不解的關係，在功利主義掛帥的社會是沙漠上的一片綠洲。

香港是否缺乏人才

美國的十九世紀末，人口由東岸大量西移，加州是「尋金熱」之地，美國人的口號是：「向西望，年輕人。」同文佘永賢指出香港僱主寧願高薪招請有經驗的僱員也不花錢培養後進，在美國也有同樣情況出現，並非香港僱主短視，唯我獨尊。

今天香港的口號應該是：「向北望，年輕人。」讀到香港的另一篇就業市場文章：《北上與不上》。從宏觀看，北上似乎是大勢所趨。就是外資或港資機構在未來數年「有中國經驗」可能是就業的先決條件。老實說，天下沒有老闆無條件地替下屬爭取就業競爭力，唯有靠個人「偷師」成才。

當然，聘請大陸同業素質的僱員只需五分之一香港薪酬，這已是公開的秘密。因此，香港僱員力求把自己素質高於中國大陸同輩。從筆者觀察大陸大學畢業生和香港作比較，兩地最優秀的是不分伯仲。中國大陸的教授方法是教條式，學生對老師的授課是被動的。香港切不可將大陸的一套搬過來，只要香港人才能夠保持靈活頭腦，將歐美的方式套用配合，我相信僱主寧願請香港訓練人才去管理中國的企業，香港才繼續有競爭力。

香港的企業文化和國外較相似（見Wang Gungwu和

Wong Siu-lun 合編的 Dynamic Hong Kong: Business & Culture, 1997）。對中國國情和人際關係的掌握，自然是大陸僱員較容易應付。但不要忘記，中國對國外的認識還是薄淺。香港扮演的角色是中介性質。中介任務是邊緣性的，中介人只要將兩種不同的文化融洽及和諧化，而不是要在兩個文化體制中扮演主角，香港唯有履行這個角色，才會眞正發揮效用。

演辭「槍手」不易爲

讀到本報余錦賢介紹董建華的兩位英文「槍手」內情。「槍手」一職不易幹。美國已故總統甘迺迪的「槍手」Sorenson是一名華爾街律師。列根的「槍手」離任後到史丹福大學讀工商管理碩士，寫了一本有關史大讀MBA的個人觀感。他在暑期到梅鐸（Rupert Murdoch）的公司任梅鐸私人助理。畢業後棄南到胡佛研究中心當院士，是筆者史大的同僚，專寫社論。

當政要的「槍手」除了文章優美，政治敏銳，還要和老闆同聲同氣，老友鬼鬼。「槍手」懂得老闆的風格，不少全職「槍手」是政要的入室弟子，有些「槍手」幹得有聲有色，再進身成爲政要的特別助理。譬如克林頓在首次競選總統的競選演辭文膽，也如克林頓是牛津大學的羅德獎學金得主（Rhodes Scholar），克林頓競選成功，入主白宮，他便當了白宮總統發言人和私人助理，儼如首席「太監」，跟出跟入，是總統的喉舌兼線眼。

當「槍手」可享和當權者「無限制的親暱」（unrestricted access），官位低而權力大。不少「槍手」退役後著書立說；企業首腦也樂於聘請他們當文膽。有錢有勢者最渴望得到這類健筆人馬替他們效勞，以抬高身價。

有些政治蓋世人物，天才橫溢，撰作演辭不假手於人，邱吉爾是表表者。

英國的政客如米高福（ Michael Foot ）、曾健士（ Roy Jenkins ）出口成章，學富五車，著作等身，前身是報章專欄作家，也不用聘「槍手」。英國的政客一般能寫得「兩手」，相反地，美國的要人出書多依賴「鬼魂作家」（ ghost writer ）替他們執筆。

當「槍手」可以得到寶貴的內幕知識，在白宮有隊「槍手」長駐，有深資與初級之分，有些大學畢業生到白宮當兼職，工作範圍是替首席「槍手」翻查資料、起草稿，是「學神槍手」。

誰說「槍手」不需訓練。

研究中國法的起步點

從筆者十七年來教授和研究中國法的經驗，而目睹香港法律界興起「中國法熱」，和讀者分享些觀感。

一、香港的法律界運作沿於普通法，法官判辭是解釋任何法例最崇高的文獻。但在大陸法制中，司法的判決沒有約束力，解釋法例最高的機關在中國大陸是全國人民大會，換言之是「立法解釋」（ legislative interpretation ）。「司法解釋」只能約束在審訊案件的結果，其他審訊法官可以將它作參考或引用解釋的法理，但是不需要追隨它作判決。所以在大陸法制下的法律工作者，和學者並不積極研究法官的判辭。但在普通法學習法律的學生，從進入法學院便開始學習如何分析法官判辭的技巧。甚麼是判辭的「主因」（ ratio decidendi ）？甚麼是「次因」（ obiter dictum ）？特別是上訴法院重要案件的「主因」是約束原審法庭的判決，更值得考查和分析。

二、學習中國法是中國政權研究的一部份。中國政治上以法律作爲統治的工具，表現得很坦白和「露骨」，不像普通法的法官，不太願意以政府政策作爲判求的依歸，政策只是「若隱若現」，政策也從法理觀點配合，不能開門見山地指出政策高於法理。

三、在普通法法制下，政府在頒布和執行法例也要透過合法的立法程序。行政機構立的附屬立法（ delegated Legislation ）也不能超越它被授的權力，否則「附屬立法」是越權（ ultra vires ），而法院可判決它無效。但在中國大陸，「附屬立法」的解釋法權歸於執法機構，譬如中國海關有權解釋海關條例，司法部不可以侵犯行政機關的「全權解釋權」（ exclusive explanatory power ）。

四、認識中國法可以從中國法律學生所讀的教科書入手，因此懂中文差不多是基本條件。香港法律界如何供獻給中國法，筆者在〈海外研究中國法的價值〉一文粗略提出（見《前瞻特區未來》一書，頁192至193 ）。

美國人看香港股災

筆者出席一間著名投資銀行替客戶安排的全球投資策略研討大會，筆者演辭中最具號召力的一句是：「我昨天從香港回來。」主席認爲美國（甚至全球）的股市下滑是由香港帶動，除了「香港感冒病毒」（Hong Kong flu）輸出外，這是史無前例的香港威脅。

記得筆者從香港返美帶回來不少參考資料，如書籍、公司年報、基金報告、政府指引、大學院系動態、雜誌、報章，整整兩個行李箱，連海關檢查員也爲之側目。這些「背景資料」是充實任何關注亞洲財經研究員的精食糧。

無怪筆者總覺得美國財經分析家的觀察缺乏深度，理論和圖表雖然多，但內涵非常空洞，尤其是欠缺了認識亞洲的感情。

美國投資界對「聯繫滙率」可否不受衝擊而繼續維持，最感興趣，揣測維持多久與付出的代價，更是人言人殊。

投資者轉向美債

當然有些對主權移交捕風捉影之輩，更利用港股大瀉作爲

抨擊特區經濟衰退的藉口。

似乎美資在短期內會對亞洲公司以注資作爲吸引投資者的方程式態度謹慎，除了「炒家」仍想趁火打劫，一般保守投資者會轉移目標，投資美國債券。

不少所謂有識之士估計香港經此一役後，需要五年才可恢復元氣。

假若特區政府爲了維持聯繫滙率而加息，導政地產價格下滑，表面上是幫了特首一個忙，令到置業人士可居者有其屋，但是如果香港經濟全面蕭條，受害的也是勞苦大衆，可能是得不償失，有其利必有其弊。

海外投資界是否將香港的股市當作東南亞金融同一體系，從數位分析員的觀察報告結論，他們把香港和新加坡、馬來西亞一視同仁。香港應該彰顯自己的地位和特色，力挽狂瀾。

再談香港的競爭力

香港的競爭力已成為特區政府的政治口號。競爭力是比較性的，以賽馬比喻，一隻第三班馬很難和第一班馬競跑。問題是香港和誰競爭？Michael J. Enight 等合著的 The Hong Kong Advantage 第八章指出，香港的勁敵是新加坡、上海、台北和澳洲的悉尼市。

香港的競爭力完全是在「人的資本」（human capital）。筆者最近參加了由蘭克研究中心（Rand Corporation）舉辦，以「高等教育的危機」為主題的研討會，主要的關鍵是競爭力。（註）

香港的競爭力應該是香港人的競爭力。首先，大學學位是未來十年的最基本學歷，有學位者做以往只是中學已足夠的職業。沒有大學學位的就業人士薪金將停留不動甚至下降。有學位的就業人士薪酬會上升，教育程度的高低主宰了人力市場的分配。

在美國，大學花費在培訓每個大學生的金錢增長率，在過去二十年超過通貨膨脹率，但政府撥款高等教育的發展沒有增長。結果是一、大學被迫增收學費；二、大學主動向私人及私人企業籌款；三、大學開始認識到開源與節流的平衡收支。筆

者預計香港的高等教育經過以往十多年來的擴充和大興土木，未來十年將是美國經驗的反映。

從競爭力看，如果香港人懂得在個人教育的投資，譬如校外進修、學懂普通話、電腦技術，甚至多拿一個碩士學位，他們的人力市場價值將增高，而社會整體的學歷增高，也構成強勁的競爭力。

環顧美國，高科技發展最盛的地區同時也是著名大學的鄰居，如蓋茨（ Bill Gates ）在英國選擇歐洲總部，也是對劍橋大學情有獨鍾。

董建華希望香港成爲高科技中心，以筆者的看法，在現階段香港缺乏客觀的有利環境。譬如北加州史丹福大學的周圍是高科技的搖籃，也是「冒險資金」（ Venture Capital ）的集中地。在亞洲「冒險資金」仍然不成氣候，高科技的創業人士的心態和生意手法亦是另創一格，和傳統的服務和產品製造商有很大分別。物以類聚，他們「一夜致富」的上市招股風格和亞洲的「炒賣」式地產大亨如何合作，這才是商業文化衝突的問題。

註：蘭克研究中心的近著：Roger Benjamin和Stephen J. Carroll: Social Contract: The Fiscal Crisis in Higher Education (1997).

聘外籍英語教師好處多

筆者一位律師老朋友揚言，倘若他兒子要接受母語教學，他立即送他到國際學校就變成放洋做小留學生。筆者素來強調香港若要保持國際商埠地位，英文是我們的命根。我們不應把英語看作殖民地的遺產（見C. K. Lau著Hong Kong's Colonial legacy; A Hong Kong Chinese's View of the British Heritage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7年）。

筆者小學就讀天主教學校，由母語英語的愛爾蘭神父教授；中學是殖民地名校，由正式英格蘭教育官當英語教師。他們雖然不是萬世師表，但教得筆者英語朗朗上口，起碼說起英語比一般台灣及中國大陸留學生像樣，文筆雖不甚優美，但應付英文考試可算是一帆風順，無往不利。

由母語是英語教師教導有四大好處。㈠說英語時用英文思想，切不可腦中用中文思想而再翻譯；㈡培養良好的學習習慣，譬如中學老師禁止我們用漢英和英漢字典，遇到不懂的英文生字翻閱英文字典；㈢學英語要懂得英語活學活用地交談，不只是死記文法；㈣英語是英語系統文化的灌輸媒介，英文掌握到家自然會多讀、多聽和多寫。這些優點是終生受用。

不以民族大義犧牲前程

納稅人多花些錢聘外國英語教師是物有所值，不是殖民地孤臣孽子拉着英國祖家不放，香港人切不可以民族大義犧牲了下一代前程。

醫護疏忽與社會問題

在美國醫護工作人員控訴法院專業疏忽是閒話家常。一個執業醫生，無論是私營個體戶或任聘醫院，如無專業保險，可能賠上了個人財產，一被指控誤醫，官司纏身。

從社會整體觀察，醫護工作人員如關注病人的權利是可提高專業本身質素。當然貧富不平均，富人所享受的醫療照顧自然比較貧窮的人佳，但是醫護疏忽是不可以因爲病人是勞苦大衆而情有可原。否則醫生對待病人以價錢作標準，醫德盡失。

以筆者曾在醫療界服務和人體傷亡賠償訴訟的經驗，最近香港的誤醫事件可能只是冰山一角，而不是個別情況。

首先，在醫療界，當有經驗和資歷高的人員缺乏，一些靠有高資歷工作背景操作程序的服務，由一些較淺經驗的人員或不是正規訓練和註册的「輔助」行業操作。就是在美國一類先進國家，爲了節省昂貴醫生費用，很多以前是註册醫生才能操作的程序改由醫療助理（ Medical assistants ）處理。

第二，當人手不足時，一些本身已很忙碌的專業人員要兼顧更多病人或將工作時間增長或將和病人接觸的時間減少。目的是在最短時間內做到更多的專業工作。譬如一個入院的病人，要一個某程度資格和經驗的醫生見面檢查和錄取病人症

狀，由於某程度資歷的醫生人數不足，入院的病人改由見習醫生和護士辦理。在表面上，外人是不會明瞭醫院在弄甚麼把戲。而在一百個入院病人中九十九個正常情況下是無事故發生，運作如常。但是百分之一案件中，有些病症變化是見習醫生不能體察，錯處就在此發生。在整體醫療服務上百分之一機會疏忽可能以往是公衆能夠接受的程度。但當社會消費者權益高漲，加上傳媒和輿論支持，醫療專業一向高傲和故作神聖的服務態度面臨衝擊和考驗。

總統千金進史大有感

史丹福大學別名「農場」（ The Farm ）大學建築在一個前身是農場的校園。美國西岸計，史丹福認了第二，沒有大學敢認第一。除了加州理工學以諾貝爾得獎人之衆和學生的成績之高比較史丹福有過之而無不及。但史丹福的工程系排名亦高於加州理工，是無國之冠。

筆者在史大任教時，也有三位「終身制」教授是港裔——分別任教於經濟系、統計學系和工業工程系。筆者只是兼職客串性質的一名法學院講師。三位名師中，兩位是港大和皇仁畢業生，可算是港人之光。

今回美國總統千金捨棄東岸名校如哈佛、耶魯而取史丹福，令史校名震全國。

明年申請史大的中學畢業生競爭更激烈。史校的新生入學處主任寫了一本如何進史丹福的書，介紹極神秘莫測的入學甄別程序的「內幕」。

譬如只是「書蟲」式的滿分SAT申請人可被拒於門外，如果是超卓的「非學術」成就入選，只包括「代表國家滑雪」或世界級「圍棋」選手。史丹福面臨太多亞裔申請人，亞裔的競爭局面比較其他少數族裔（ 如墨西哥裔 ）更是僧多粥少。不得其門而

入者不要驚異。

族大也有乞兒，從筆者在史大任教的經驗計，史丹福亦有平庸之輩。事實上在人生路途上，能夠進身名校，當然值得驕傲，但並非一登龍門便無顧之憂。人生如戰場，僅是一場少接觸並非註定是「長勝將軍」。

史丹福位在北加州，四候如春，天氣環境比較嚴寒的東岸「春藤系」大學爲佳。表面上學生和教授衣著無拘束，但學術風氣並不是外表所看到。

美國是弱肉強食的社會。在名校中要出人頭地，以筆者所認識的學生中，不少是野心勃勃，孜孜不倦的「幹勁派」。正如總統千金希望畢業當專科醫生，不靠父蔭。

會考狀元的浮沉

記憶筆者在皇仁畢業時一個同窗是狀元，他是港大入學試四優得主，考美國大學入學試（SAT）數學滿分，天之驕子。獲得獎學金進入加州理工學院進修物理。一到頂尖大學才知自己渺小。同班同學兩個都是入學滿分，尤其是些猶大裔同窗，大學一年級已和研究生，教授一起參與研究計劃，該香港狀元結果鬱不得志，以平庸的成績結果，在人生旅程中亦不見得脫穎而出。人生如坐升降機，有人到二樓便求去，有人扶搖直上，更上一層樓。

當一羣人智商差距不大，成功與失敗在乎「非智能」因素（Non-intellectual factor），譬如人格訓練，毅力，人際關係，領袖才能等。

名校如史丹福大學招收新生，在客觀積分試中固然有一定水準外，更注重申請人全面的表現。只懂讀書而無當義工經驗，幫助他人，或體育球類活動沒有參與者不得其門而入。有些申請人年紀輕輕曾經克服了人生的礙礙，如家境不佳，校外兼職，充份表現出過人的魄力，就是分數差一點也可被取錄。

以筆者教授經驗名校的學生一般觀察，他們的求知慾高，領悟力強，舉一反三，而且衝競野心十足，活氣充沛，歎觀止

以。正如「The Hong Kong Advantage」一書作者*描寫香港人，下午五時下班的傭員，要不是趕「兼職」便是公餘進修。

一般考試成功者，當然和個人成就成正比，但並非100%。考試卓越者也不要自驕，環顧香港發跡之士，試場落弟者亦不少。讀到一份財經刊物「Euromoney」採訪郭鶴年，他對學富五車的工商管理碩士望而生怕，自以爲書本知識便可在商場百戰百勝，郭氏所言不無道理。

註：Michael J. Enright, Edith E. Scott及David Dodwell著The Hong Kong Advantage. 1997年牛津大學出版社。

英國高等教育的背後

讀到鄭耀宗校長「走馬看花」式的訪問三所英國大學和程介明教育院長討論英國取消「教授終身制」的來龍去脈的兩篇《信報》文章，筆者有以下補充觀感。

英國大學的教研人員歷年皆出現「人材外流」的局面。「中國通」的鼻祖，如在哈佛的MacFarquar，耶魯的Jonathan Spence是英國人，哈佛的著名歷史教授Paul Kennedy也是英國的「輸出品」，「中國季刊」的主編David Shambaugh已從倫敦轉到喬治，華盛頓大學任教。英國的亞洲研究可算是「名存實亡」，人材凋零。就是「中國季刊」（倫敦大學亞非研究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的「旗艦」）的文章投稿人十居其九非英國大學學者，以美國學者的佔大多數。美國的「亞洲研究學會」（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在密西根大學設總部）的每年例會中，差不多沒有英國學者宣讀文章。在理工和財經等學科，英國人材外流更嚴重。就是法律研究，不少英國學者都跑到加拿大，澳洲和美國，這些普通法國家，人望高「薪」是也。

筆者以前也是「時報高等教育附刊」（Times Higher Educational Supplement）的長期讀者。英國的大學可以分

成三個系統：

㈠古老大學（如牛津、劍橋、Durham，和蘇格蘭）*；

㈡紅磚大學（如百明翰，曼徹斯特）；這些大學設在十九世紀，校舍由紅磚砌成）；

㈢新生代大學（其中不少前身是理工學院，改組而成）

三個系統有不同的「建校哲學」，古老大學以出產政治、宗教、大文豪爲己任。紅磚大學則注重理工和「中流砥柱」的行政人才；新生代大學則注重教學而將研究放在「第二位」。

以筆者熟識的三所英國大學計（牛津、倫敦和百明翰），學校的風氣和研究導向是有明顯的分別。就是倫敦大學中的不同學院亦各有所長。

在研究方面，通常在英國大學考取博士學位所花的時間比較美國短。英國最快速途徑：拿了學士學位二、三年後可完成博士論文。但在美國，博士課程中的修讀期要三年，以後才開始論文撰寫，爲期二至四年。美國的博士課程中要必修一個外國語言，但在英國是沒有這樣規定。無怪筆者在中文大學任教的美國博士嘲笑英國博士不夠「博學」。

* 倫敦大學不同的學院創建在不同年代，很難籠統般放進同一類別。

超級無敵的慈善富豪

蓋茨，梭羅斯，端納，胡應湘，他們是否本世紀末的超級無敵慈善家？

研究善慈家的評論界指出這一批新派慈善家和上一代的有明顯的分別。一則，以前的慈善家是臨終後才運用他們建立的基金，但新派慈善家是在有生之年已鉅額捐款。二則，新派慈善家在行善上也主動參與，譬如他們捐款的目標極明確，而帶有政治意識，特別是梭羅斯，他行善是在表揚一定的政治意識形態。三則，新派慈善家的跨國影響力可以說是代替了國家。當然超級富豪本身已是觸目人物，不需要捐款助長名聲。但無可置疑，透過捐助，和有系統的培育他們在不牟利的慈善事業，他們的跨國形象再不是滿身銅臭的剝削資本家。而且明顯的政治目的，使他們在國內外的地位正面性的提高。

正如上屆競舉美國總統的富豪富比耳（ Forbes ）和貝羅（ Perot ），他們自資競選費，動輒數百萬元計，就是落選，他們個人和生意企業的知名度成爲國際領導地位，物有所值。

儘管超級富豪行善的動機是慈善爲懷，但亦不能排除有「另項議程」。鑒於他們並非「被動式」的捐款，更具有替他們生意「打開門窗」的含意。譬如端納揚言捐款聯合國是否替他控股

跨國的傳媒CNN製造國際和諧的氣氛，將來在世界各角落播放，無往不利。

慈善家本身是生意人，他們捐贈與機構多有附帶條件。他們的捐贈機構如何花費，捐款也由他們作出主張和控制。事實上賺取他們的捐款也非輕而易舉。

記失落的一代

歐美報章最近刊登了一列「懷舊」文章，追踪六十年代（「嬉皮士」年代）的「花人」（Flower People）。這些覺悟前非，重回大學，讀工商管理或專業，現在是高薪階層，女的相夫教子，男的略有所成。有一部份仍然是失落，吸毒，反傳統，潦倒，一事無成。兩者成了強烈的對比。

筆者也認識數位同年同學，在六七年文革式暴動中「造反有理，愛國無罪」，當了上左派支持份子。放棄了港英的傳統學校教育，半途失學，到國貨公司當售貨員，因爲和香港社會脫節，沒有被承認的學歷，活到中年，還是幹些低下工作。以爲可以在回歸後中國對他們另眼相看，但事與願違。見到些替港英服務最熱衷，努力爬學歷的「不屑份子」還是特區的新貴。甚麼「愛國不分先後」騙取他們的青春，後者捷足先登。他們後悔身先士卒的盲目愛國，寧願如筆者認識的特區高官一樣，靠近政權，擁有吃香的學位，或如筆者一樣流放海外，還有一點跨國市場價值。

失落的一代，有其天眞可愛的一面。他們的浪漫派無拘無束的性格和一些營營役役的功利派大異其趣。筆者工作的律師事務所有一位「法律助理」，他是倫敦大學哲學碩士，但不屑到

法學院修讀，情願終生當助理，不計名利，空餘時間看小說，哲理書籍。他也懶得出文章，將名聲流傳後世。終日「牛仔褲」一度，依然顧我，像魏晉南北朝的「竹園七賢」，玩世不恭。

親近權貴自然是享有不少甜頭，名成利就，光宗耀祖，無怪有些爲國犧牲的暴動期急進份子，年入中年後，覺得國家出賣和辜負了他們。

筆者在史丹福大學任教，碰到的中國高幹子弟學生，他們野心也不少，對西方，學歷的崇拜程度比較我們香港人還要狂熱。無他，他們懂得在社會主義中失落也是沒有人同情的。

蓋棺定論話富豪

中國成語「蓋棺定論」是有英美法理根據，在法律上，對已作古人的誹謗官司是不成立的。筆者是博覽中外古今傳奇的「發燒友」，但對香港和台灣坊間大量湧現「還在人間」的富豪傳記只在書店「速讀」，從來沒有購買和收藏。

筆者認識一位專門替富豪服務的律師朋友，他說得精闢：「眞正認識富豪的人是不會閱讀他們的傳記。」言之有理。任何在商界這個「大污缸」浮沉過的人都明白菩薩心腸，只靠克勤克儉，日行一善是難成巨富。就是在捐款行善上，富有兼慷慨的慈善家如蓋茨，梭羅斯也有其捐獻目的。譬如蓋茨的鉅額捐款與培養年青輩對電腦運用興趣有關連。

如果希望閱讀富翁傳奇便可掌握致富秘方，就是讀馬經可以在馬場得心應手一樣的成功機會。蓋茨在哈佛大學讀了一年便退學。是否每個在大學退學的人可成爲首屈一指的巨富？正是各有前因莫羨人。

要明白人生百態，讀莎士比亞劇集。要在股場百勝，讀上市公司年報。富翁畢忽（ Warren Buffet ）以讀上市公司年報爲娛樂，他更要閱讀不同類書籍才懂得經濟走勢。這些資料是富豪傳記中沒有記載的。

對賺錢感興趣，敬業樂業，一天廿四小時還不足夠應用，身體力行，經常和賺錢「同好」一起的人是成富人的先決條件。

筆者認識的富商中，沒有一個是懶洋洋提不起勁的享樂派主義者。無論是學術研究成長袖善舞，容易滿足者，難成大器。賺了一億的想搏十億。正如著名大學任教的深資教授，他們著作等身後還是孜孜不倦地研究著書。

亞洲叻仔(女)何處覓？

美國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創先河，聘請了一位台灣背景的商科教授專題教授海外華人經商策略。在香港商界，潮州，上海和廣東邦鼎足而立，三分天下也。

筆者留港期間和數位億萬「基金掌門人」討論香港精英的共通點，似乎叻仔，叻女的最終歸宿還是家族生意。筆者牛津大學法學院先後屬同窗，一姓廖，一姓鄭，皆潮陽人士，相繼出掌金融跨國企業後重回家族集團，做其一哥。

叻仔，叻女如果是雄心萬丈，學有所成，開始時對家族成員眾多，皇親國戚的生意沒有多大興趣。相反地，在華爾街羣雄角逐，在體力處於顛峯狀態的青年輩，的確是充滿了挑戰性。

在亞洲經商除了生意頭腦精打細算，人際關係是不可缺少的基本條件。叻仔叻女在海外只能夠達到「專才」被承認地位，但再上一層樓，呼風喚雨，靠父兄世伯的提携，洞悉亞洲人的風險管理手法並不是歐美人士毫無文化傳統下可掌握（見Geoff Hiscock著：Asia's Wealth club: Who's Really Who in Business－The Top 100 Billionaires in Asia, 1997）。

亞洲叻仔叻女就是名校高材生，擁有高等學位，他們對學

術或功職，十居其九沒有興趣。美國的世家大族如甘迺迪，洛克菲立，布殊等皆捨棄家族生意晉身政壇。在台灣、香港和新加坡學府和政府也不能吸引他們。事實上亞洲的大企業也是家族大股東操縱，和歐美的上市大財團分庭抗禮，文化傳統分野極大。

拿了專業資格的叻仔叻女也甚少長期在專業上紮職。無他，輔導人家賺錢不如運用本身知識謀利。特別在亞洲，當專業顧問，如果是富甲一方的後代，很難作出客觀的判斷去教導利益衝突的其他家族企業。

記黃錦燊任大律師

筆者是「眞情」片集的忠實觀衆，黃錦燊是「有型有款」的中坑「小鬍子」。

事實上當大律師並非一般人認爲那樣艱難，但能夠成爲成功的大律師卻是不容易。當筆者在七十年代考取大律師資格，大律師考試的深奧程度比律師還要低。當律師要實習兩年，而大律師是取了資格後才實習一年。

以前中國封建社會，當「戲子」是下九流。當「狀棍」地位也不見高得「戲子」很多。可以說是同病相憐。今天當「明星」，如成龍、周潤發，被跨國尊崇。連克林頓競爭總統時也要靠荷里活衆星「綠葉扶持」。

大律師公會對會員自我宣傳視爲行業大禁忌。英國著名大律師John Mortimer是喜劇作家兼小說名家。在法庭上他也是頗受尊敬的前輩。大律師從政而知名者不少，如英國首相貝利亞，前內政大臣Howard，前外交部首長Malcolm Rifkind。以前香港首席大法官羅弼時也曾寫了十數本法律界嬉笑怒罵式的「無厘頭」小說。

大律師要「出人頭地」唯有靠在法院打官司，受法官賞識，同業尊重，律師重金禮聘。在美國不少律師從政，當學者，小

說「寫稿佬」，評論家，投資顧問，林林總總，打出知名度容易。假若黃錦燊在美國，他的演員技術和背景可大派用場，可惜在保守的英國制度下，他的演員身份會阻礙他當大律師的專業。

大律師的技巧易學難精。「拍烏蠅」的倒霉大狀只可替人補習或「爬格子」，不可到街頭賣涼茶或拍廣告片。不少失業的有型英國大狀轉行當戲劇演員、傳教士或「淘古井」，娶個名望淑女，有空打馬球，以談吐風趣博得歡心。筆者的牛津大學同學中有大律師資格者「娶」入名門後，當了古玩鑒賞家，當然他也被鑒賞而進入了「侯門」。

香港遇股災靠朋友

筆者曾預言香港的平穩過渡與安定繁榮，從海外觀察，依賴兩個因素：一、香港居民的國籍與旅行證件；二、聯系滙率。倘若香港人不能自由進出他國，香港護照不被承認，香港的國際地位盡失。似乎在這方面世界各國對香港還是情有獨鍾，給香港特區護照持有人不少方便，化險爲夷。

在聯系滙率上，筆者只是一界門外漢，專業知識有限，但從商業常識看，倘若香港貨幣出現大幅波動，香港的金融制度必定被催殘。最近由國際基金發出的公報，支持香港的聯系滙率，證明了香港的海外朋友，拔刀相助。國際基金「一句頂萬句」，無論曾蔭權或董建華如何力揭聲嘶地捍衛港元，海外的聲音是一個強而有力的「強心劑」，發揮效力最威猛。

國際貨幣狙擊手並沒有政治陰謀，向香港落井下石，他們的行動完全符合商業謀利行爲原則。香港各界應該以理智克服情緒，切不可步馬克蒂爾的後塵，將金融風波升格爲宗教聖戰。香港的一貫作風是遇患難，靠朋友。正如在護照承認的處理方面，香港主動遊說外國爭取最大的勝利。同樣地，在處理貨幣衝擊上，香港也要努力向外國解釋立場，不利因素可消除。

香港股市價格下瀉而影響全球各國股票市場實在是對香港的欣賞。可能這是阿Q精神被發揚。最低限度，香港已成爲舉足輕重的國際市場而並不是一個無關痛癢的一潭死水。國際金融界是一條小村落，在資訊發達的世界中，從業員互通消息很快速，香港的一動一靜，海外「大鱷」很容易掌握，香港更應珍惜已建立的形象。

急功近利的大學生

筆者十一至十二歲，每逢暑期，被父母迫每周五天，花一小時，到灣仔書法家謝熙的書齋學習毛筆中文書法。在潛意識的驅使下，學懂了有恆心地靜坐，將心猿意馬的童心約束。

和數位大專教授傾談，他們不約而同慨嘆今天大學生情願當補習教師也不跟隨教授當研究助理，無他，當助理薪酬比不上當補習教師。香港同胞不要嘲笑在中國大陸「發明原子彈不如賣鹹鴨蛋」。筆者讀大學，整整用了一個暑期收集資料，寫了洋洋數十萬字的論文。教授找筆者當助理，「校對」文章的備註，無薪酬一樣樂意效勞。目的在增進知識，將來深造博取教授的推薦書。

用今天大學生的角度看，似乎是得不償失。從筆者讀書經驗計，大學遠離俗世，也有意想不到的脫俗清高的一面。西諺云：成大業者從少事幹起。大學生應該珍惜三年的大學生涯，盡力爭取知識，參加多元化的羣體生活。不要斤斤計較薪酬。學而後知不足。

筆者不會怪責大學生急功近利，有這樣的社會自然產生同樣的大學生。當香港樓市暢旺時，地產經紀行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不少年青人放棄正業，投身炒業。這些投機取向並不是

長期建立專業知識的計劃。但社會的風氣主宰了不少大學生的短線牟利的視野。

美國的大學生又如何？當就業市場緊張，大學生也很關注畢業後出路，特別是在美國，中下階層學生並不依賴父母的供養，他們是以借貸渡過大學生涯。僱主在聘請大學畢業生利用他們的弱點，以利誘之。但大學生爲了進身大企構，在校成績是一個考慮因素。因此雖然他們也是急功近利，但在學業上不會荒廢。

論政與炒股

一些香港老朋友勸喻筆者行文教導港香股民「炒股」勝於寫些論政文章。以炒外幣而名震世界的梭羅斯（George Soros）是醉心研究世界政治大勢和政治哲學的發燒友。他一出擊，全球的國家財政部長從夢中驚醒，一提到梭羅斯不是肅然起敬便是恨之入骨。

就是香港的股市和地產市也是和政治牽連。以筆者從專業眼光看，財經金融界是購買政治分析資料的最大主僱，輔導投資基金的專業人士更是政經文章報告的忠實和長期讀者。

股市的小股民，散戶只識跟風，如演粵劇，胸前一個「勇」字的兵丁，行又行先，死又死先。

投資和論政是兩種不同的腦部活動。論政者並非是最盈利豐富的投資者。但投資者不可完全不參考論政者的觀點。

諸位股民亦時有所聞，股價分析派系林立，有走勢派（Chartists），實力派（Funadamentalists）等。但正如鄧小平的白貓黑貓論，派別不要緊，最緊要幫客戶賺錢。同樣地，政治警覺性高的投資者對市場分析，風險分散，紅籌股的市場價值，雖然不是百發百中，但雖不中亦不遠矣。

筆者認識不少專業股民，他們鮮以自己全部資金作賭本。

股民要懂政治學上的羣衆心理學。最簡單的道理，如替人投資和動用自己資金的股民投資策略亦有分別。外資基金大戶更是有別天壤。不同國度組成的基金亦不同。

以筆者長期和金融財務界接觸，結論是一般小股民只靠道聽途說而下注，正是股市上下波動中的被溺者。

名校出英才論

筆者母校皇仁書院以會考狀元出產地見稱，在特區衙門高官中也是名列榜首。和筆者七年窗下的鄺其志，許仕仁，林煥光，黎慶寧皆是局長級人馬，許淇安是師兄輩。養馬講配種，名校出英才。在英治時期的精英是否會被「愛國」名校取而代之？筆者素來鼓勵競爭，有競爭才有進步。皇仁好，香港好。香港好，皇仁更好。

論教育，筆者幸運曾在三大洲執教和就讀「所謂」名校：皇仁、牛津、港大、史丹福大學。可以說是過來人。現和讀者分享些內幕心得。

名校要在招生上下功夫。人類智慧不是平等的。智商的分佈統計是根據「貝氏曲線」（Bell Curve）。如果學校收的是智商「鑼底橙」，無論校內的教師如何個個是孔子再世，也無能爲力。說來奇怪，智商並不是和財富成正比。譬如，皇仁的學生甚多家境清寡，中下階層甚普遍。現在的新移民行列中可能隱藏不少明日之星。

名校是講風氣，風氣可以靠傳統保持和延續，但並不是傳統便可成風氣。譬如筆者任教的史丹福大學，歷史甚淺，不足一百年。風氣的形成便靠校長和教職員。教師不須才華出衆，

但要懂得管理完善。牛津大學能夠名震海外，連現任美國總統和英國首相皆是校友，成功在教學嚴謹，學術風氣濃厚。

學生的成就表現不可只靠公開考試論英雄。「少時了了大未必佳」，學校要培養學生孜孜不倦的自學精神而不是「私塾」式的只求背誦，缺乏思考的落伍教育。

筆者歡迎在港英統治時期被歧視的「左派」中學參加競爭名校的行列。讓百花齊放，角逐中原。

施政報告的功用

當董建華在臨時立法會宣讀他上任後第一份施政報告，美國財經記者立刻來電，要求筆者作評論。他們對特區第一份施政報告的關注程度比較以往殖民地的同樣公告興趣高。

施政報告可以說是政府發出的一份極重要的公開文件。說明政府在來年的政策民生措施。唯一可以和施政報告平分春色的是財政司的每年財政預算。筆者對海外傳媒的忠告是單獨閱讀施政報告是不足夠。譬如在增減稅收，政府的儲備金增減等資料，是在財政司預算所刊載。「六軍未發，糧草先行」，財政預算解釋糧草分配，決定了施政的落實。

施政報告也是老闆給下屬的工作指示，政府架構內部門眾多，部門與部門，部門與上級的溝通，不能排除有利益衡突。施政報告綜合了各部門上呈的資料，由協助特首制訂施政報告的單位，如中央政策組，過濾和去蕪存菁的編寫。來年不同政府部門的工作皆以施政報告作大綱。

施政報告和上市公司董事局編製的年報也類似。納稅人做如眾股東，他們有權要求董事局解釋把他們交入政府庫房的金錢如何運用。當然，納稅人交稅非選擇性和自願的投資，但政府對人民應該是將利益惠及他們。因此市民對施政報告作出反

應也是理所當然。

美國總統每年一月也向國民發表他的施政告詞，視爲全國矚目的大事。這是民選制度下一個公開性政府的應有的措施。香港首長的施政報告可以說是互相輝映。

至於施政報告內容是否空洞，言之無物或是發人深省，見仁見智。同樣地，不同的上市公司的年報也採取不同的風格。筆者唯有讓「眼睛是雪亮的」讀者作出結論。

戴妃之死與英皇室前途

筆者曾經在英倫居住六年之久，最近舊地重遊，到英國考察和遊覽兩周，對英國的認識不深也不淺。

英國的傳統，如皇室的延續，反影映英國的制度中的結構是從「非金錢」(non-monetany)的觀點辦事。以皇室的豪華排場，週遊列國，遊手好閒，勞民傷財，歷來工黨議員及一些政論觀察家質疑皇室的存在價値。英女皇依利莎伯是全球首富之一，雖然有別於其他資本家，她是不可以變賣家產。

爲了平息民間爭議，女皇自動要求納稅和將皇室成員（可享受特別優惠）的數目削減。但她的子女及兒媳（如莎利「前郡主」）的奢華享受，盡情揮霍，被媒介挖出，使皇家蒙受指責。

在英國，雖然不少國民對皇室仍然尊敬，但他們終日不事生產，桃色醜聞屢次傳出，女皇在提拔查理皇子（快將年近五十歲）爲君主也無期押後。

十六年前，戴妃出現，一個天眞無邪，貌美如花的女孩子，下嫁和他年紀相距十三載的皇子結婚，而她們甚少共通興趣。結婚不久，婚姻生活亮出紅燈。傳媒將公衆人物的一舉一動，私生活揭露。坊間小報大事宣揚，皇室和傳媒打官司，的

確在保守的英國人眼中是有辱國體。

戴妃不恥丈夫的通姦行爲，屢勸不改，自己又去「偷食」，導致婚姻破裂，戴妃得到國民的同情。以今日的道德觀念的標準，戴妃雖然是公衆關注的偶像間中行差踏錯，但她「私隱」長期被侵犯，加上戴妃好於行善，製造出英國「親善大使」的公關形象，知名度大增，民間更替她不値。

戴妃的不幸英年早逝，搏得世界和英國的敬仰。今回要看英皇室查理在續緣上如何處理。英國皇室在帝國逐漸消失的數十年間，依賴女皇的步步爲營，極度克制的作風，才將皇室的尊嚴慘淡經營。下一任君皇可否另創風格，迎合在轉變的國勢，拭目以視。

狗仔隊與名人法律保障

名人又稱「公衆關注人物」。「狗仔隊」是探幽發奇，「二仔底死跟」，鑽牆鑽隙，拍攝名人「背向人間」的神秘鏡頭，以重金賣給傳媒，一紙風行，或一鏡震動。

美國最近就戴妃玉殞香消後，公衆辯論應否立法約束「狗仔隊」活動，從而保障名人私隱。

法律權威（如哈佛大學教授Alan Dershowitz）見解，英美普通法國家已足夠的法例保障，不用立法將名人的私隱權進一步以特權式「保護」。

首先，不少名人甚歡迎傳媒的關注，要搏出名時，自暴私生活才引起公衆的注意，所以如何界定到甚麼程度是受保障，法律的灰色地帶複雜，要執行法律造出不少麻煩。執法者也不樂意承擔這些吃力不討好的職責。

最重要的一點是「狗仔隊」要公之於世的鏡頭或消息是言論自由的一部份。如果名人可透過公關向媒介發布「正面」形象消息，公衆也有自由去將「眞正事實」揭露於世。譬如一些政客滿口仁義道德，岸貌道然，儼如葛培理一樣，但其私人道德則殺人放火，淫人妻女，公衆應該感謝「狗仔隊」將他的眞面目，敗德行徑公方於世。如果法律限制「狗仔隊」的報導自由，是否給

與名人「無反證」的自我宣傳空間。

資訊也是依據市場規律。如果沒有公衆的好奇心，「狗仔隊」所得來的資料不值一文。不少名人是間接靠「狗仔隊」的一臂之手，滿足公衆的「偷窺慾」而從中取利，以「知名度」去「搵真銀」。他們對「狗仔隊」有選擇性的愛恨交織。爲何政府要干預市場規律，控制某類消息的傳播？

不同的名人也有不同的暴光程度。要參選的政客，搏「出位」的艷星，希望出頭的作家對「狗仔隊」的容忍程度可能有別於已解甲歸田的名將，嫁作他人婦的過氣女星。立法以誰的標準作爲保障的公平準則。

寫在江澤民訪美之前

自從江澤民在黨的地位經過十五大的「認定」，今回「啊啦」訪美自然是鄭重其事，以大國元首級到訪美利堅合衆國。

希望江澤民來「洋基國」不要在公開場所「梳西裝」被外國記者拍照留念。

大塊江也曾在西方傳媒亮相。從外貌看，大塊江頗有「開麥拉面孔」，他間中爆一兩句「番文」亦是外國人津津樂道。

江澤民這次訪美，相信他和克林頓關室談心於白宮，自然會講到中美關係。香港問題已被董建華跟克林頓探討過。

台灣將會是江克之談的一個爭議題目。台灣涉及中國主權的敏感地帶。沒有美國在太平洋的軍力保護網，如最近簽署的美日安全條約，和美國輸出軍火給台灣，美國國會的公開支持台灣獨立的鼓勵，台灣的李登輝不會囂張地挑戰中國大陸。

第二個主要對話題目是中美經濟關係。美國商貿界人士甚關注與日俱增的貿易赤字，中國的龐大市場還是高不可攀，中國經濟上的改革，如「股份制」的設立，中國如何加入國際貿易組織。

第三個題目是中國輸出武器給與敵對西方陣營的「不友善」國家，直接威脅歐美日等國。而再談到中國的軍力在亞洲的擴

展，亞洲整體安全平衡。

筆者認爲中國的民主進展，如釋放異見份子將會輕描淡寫地略提。這個題目還是留給要爭取選票的國會議員公開質問江澤民算了。橫豎克林頓沒有機會競選連任，美國憲法只準總統兩次四年一任。

筆者相信來年三月倘若朱鎔基眞的當了總理，他會在上任短期內到美國取經，向資本主義大國學些「撥活經濟」之道。筆者認識美國華裔經濟教授，他被朱鎔基當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的期間諮詢，朱氏對美國的金融管理興趣極濃。

海外鼓吹香港學

筆者獲悉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和約克大學分別有香港歷史的課程，吸引不少就讀學生。兩所大學聯手經營的「加港資料中心」是北美洲收藏香港典籍的重鎭。筆者任敎的史丹福大學胡佛中心也有香港典籍收藏。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多倫多大學的東亞藏書也對香港書籍收藏有濃厚興趣。英國的亞非研究學院，牛津大學的現代中國研究圖書館也曾購買筆者拙著。美國的東亞圖書館更是星糴棋佈（見Directory of Asian Libraries,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出版），其中以國會圖書館收藏最豐富，哈佛燕京圖書館其次。

筆者素來鼓吹歐美大學應有系統地收集有關香港的書籍文獻，作爲開設「香港學」課程的準備，在香港，研究香港社會，歷史經濟政制的學者已達到成熟期，假若歐美（包括加拿大）的大學和亞洲如中國大陸及新加坡能夠實履「香港學」課程，香港和外國學術交流更普及，香港學者不用似賴研究中國才能建立學術威信。

很明顯加拿大大學教授香港歷史比較美國熱衷，原因是不少移民多倫多的下一代對香港還有一段情，他們自然對課程參與有積極表現。但是雖然在美國也有不少台灣移民，未曾見到

「台灣學」出現。原因可能是台灣留學生以理工爲主，以往懂中文的台灣留學生進身「中國通」比較適應美國大學的需求。

當海外對香港認識增加，自然對香港國際地位鞏固。最低限度，海外人士對香港的批評或意見比較客觀和有資料支持。灌輸香港的知識應該以大學爲基地。一般海外人士對香港和他們生活起居無關係，很難提高他們的興趣。唯有一些對美國策略有影響力的中上層要認識香港，因此在大學教課香港學是起步點。

香港學者到海外交流，宣讀論文可以香港爲中心；各院校出版社贈送書籍到海外東亞圖書館；香港知名人士到美國商會，研究中心演講。這樣水銀瀉地式的遠交近攻的部署，令到大學當局主動開設香港學課程。

香港的股民心態

股民皆是同林鳥，股難臨頭各自飛。這是典型的香港「盲頭烏蠅」式股民心態。

投資是藝術還是科學？投資股票有「實力派」與「走勢派」兩大派別。但股民的心理可能影響股市上落更大。特別些富可敵國的跨國基金，掌握股市民盲的神經敏感症，魚肉百姓。

筆者和一個來自「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經濟學教授討論全球股災。他正在研究資本主義股市，準備著書立說。筆者建議他自己入市，從行動解釋股市運作。

事實上，個人投資亦非完全理性和合乎邏輯（見龐寶林著《賺錢有道》，滙訊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就是完全理性也不能穩操勝券。股票投資也有客觀標準，盈利或虧負是以指數上落爲指標，俗稱是否「跑先過指數」（do better than the Index）。

投資學上一個基本原理是風險承擔力。有投資者盡地一鋪，全軍覆沒而面不改容。也有人虧了10%本錢便牙痛咁聲，金盤洗手。投資是看個人主觀成分。當然愈上了年紀愈謹慎，切不可連「棺材本」也輸完。

股民跟風也是犯了兵家之大忌。無知股民是後知後覺，甚

少「先天下之知而買」，大部份是「後天下之慌而賣」。陣腳一亂，甚麼長線、短線、中期拋諸腦後。美國大富翁畢以忽（Buffet）遠離華爾街，住在美國中部一小鎮，連股票熒光幕也懶得看，但他持的股票節節上升。由以可見，終日坐在金魚缸，荒廢正業的股民難成大器，他們最容易葬身火海。

靠股場的貼士下注，成功比率和馬場下注一樣。炒交投疏落的「蚊型股」風險更高。研究投資要懂得閱讀上市公司年報，洞悉利率走勢，更要有自知之明，坦白承受風險的高低程度。但是符合以上條件仍然不能擔保百戰百勝。

筆者勸香港股民安份守己，居者先有其屋，敬業樂業，略有儲蓄後剩餘金錢才去買賣本港和外國股票。沒有精神或興趣者只可買值得信賴的外國基金，從此便可安寢無憂，衆人皆醉我獨醒。

美國人眼中的魏京生

江澤民到訪美國，必然承受了多方面的壓力，甚至來自美國總統克林頓，要求他「放人」，否則魏京生的保外就醫沒有來得這麼容易。當然，魏氏「轉軚」，改變初衷，自願離境也是原因之一。

有些美國學者將魏京生和孫中山比較，似乎有些牽強。今天的中國和滿清政府也不可同日而語。正如美國朝野官方指出中美關係不能建立在兩國不同的人權立場上，其他爭議境域，譬如貿易赤字，中國進入國際貿易組織，台灣問題同樣重要。

旁涉不少美國報章對魏京生到美國的評論，沒有甚麼轟天動地的影響。在美國鼓吹外國人權運動可以說來來去去都是一小撮人，這並非人權問題不重要。

美國參衆兩院議員插手國外人權，相信在提高自己的政治舞台成份比較多於眞正關注外國人的遭遇，以人權的壓迫程度相信在非洲小國和中國沒有多大分別，但中國是大國，自然是有新聞價值。而魏氏確是最具觸目的世界級人馬。

美國官方在釋放魏京生事件上以低姿態處理，佔盡風頭的是民間團體和一些支持中國民運人士。因爲接踵而來的是在溫哥華舉行的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大會，中美要再接頭商討解救

亞洲地區的經濟困境，中美兩國不希望兩國合作被人權問題複雜化。

美國名牌大學邀請魏氏演講訪問是理所當然。但是當中國人權領袖相繼出國，相反地，令到美國在向中國加壓上減少了一個出師有名的爭議題目。

從各方面的報導，美國人最關心的不是台灣問題，剩下來令中美關係緊張而波及美國民生是中美貿易赤字在不斷上升，迎頭趕上日本。這才是美國人的政治壓力關鍵。

保外就醫法理何在

將在服刑的囚犯保外就醫可能是中國司法部的創舉。

首先，是否中國監獄沒有足夠的醫療設備，替患病的囚犯治病？倘若這樣情況出現，筆者建議中國改善監獄醫療設備。

在中國，比較魏京生患更嚴重病症的囚犯是否可以保外就醫？如果是魏京生私人要求保外就醫而政府也容許，這個論點更荒謬。在甚麼情形下司法部會接納囚犯的私人要求？

保外就醫的囚犯痊癒後，是否要重回監獄接受沒有完成階下囚的餘下刑期？如果保外就醫者可免除再服刑，法理何在？就是否特惠？

在接受醫治的保外囚犯病人，他們的治療費用由中國政府承擔，保外就醫的囚犯的費用由誰負擔？

到海外就醫更是無邏輯可言。國家與國家互相交換服刑囚犯，有先例可循。從國際公法論，兩國應有雙邊條約約束，或多邊條約簽署國，譬如根據日內瓦戰俘交換公約，兩國交換戰俘由紅十字會安排。美國和中國沒有簽署雙邊條約交換囚犯，魏京生也非戰俘，海外就醫是否取決於政治動機？

從法律角度分析，沈國放所言的保外就醫就是㈠司法部獨立行動；㈡完全依照中國法律，似乎是難令對法律有認識的

「行家」信服。

沈國放並非法律界人士，這個問題應該由司法部長蕭揚解釋。

從刑法論，保外就醫的囚犯仍然是囚犯，以中國法論，他是被剝削政治權利的國民，這樣的囚犯如何可以申請到護照離開國境？

中國既然是「法治」國家，國家行爲也是依照中國法律，將中國囚犯送到國外就醫是法律界的一個大笑話。

沉默的一羣

——中小型企業老闆

筆者的宏觀討論香港的競爭力忽視了香港沉默的大多數：中小型企業的老闆。因此筆者刻意和數位代表這類默默耕耘，年約四至五十歲的草根小老闆詳談他們對問題的看法，以補充筆者之不足。

其中一位是曾經僱用三、四十個員工的出口貿易商人。最近他的公司裁員和電腦化，員工減至五、六個。香港的成本，租金高企，衆所週知。他代理出口的廠家十居其九已在大陸設廠。在定單疏落之際，他也炒樓和買賣股票當副業。子女有些在海外和香港進大學。他希望下一代也能在中、港創業。他沒有移民打算，生於斯，長於斯。自從中學畢業後，他從商已三十年。香港的風霜轉變他已習慣了。香港是他的家，他擁有數物業單位收租。

從他的角度看，他所擔心的是香港的中介角色，以服務外資採購定單的利潤下降，生意愈來愈難做。而中國廠商已開始直接和外商接觸。目前他的生存空間是以高效率、快速搜集國內廠商的生產資料，替外商「超水準」的服務，鑒於中國的制度官僚化，欠缺靈活運作的經驗，加上他三十年的廣泛經驗，仍然是如他所說賺些蠅頭少利，站穩崗位。

另一位上海貫籍的電器產品出產商，年介六十，在香港設廠已四十多年。他向筆者解釋香港的房地產中的工業廠房沒有人炒賣，十數年來沒有升值。廠房搬進大陸已是無可避免，但他不排除公司的非生產部門也跟隨廠房移師大陸，以配合生產線。在香港請一名大學畢業不久，實際經驗淺的工程師，月薪二、三萬是等閒。在中國，清華大學的工程科畢業生，月薪二、三千已很滿足，從僱主的觀點看，他們選擇的方向是顯而易見。他很難想像香港如何保持競爭力。

筆者從他們的交談中，覺得香港商界的確是充滿了不少務實而且洞識大局的沉默苦幹商人。他們對生存的警覺性高，和他們探討切身問題比較「學院派」的賢士更腳踏實地，香港政府應多聽取他們的高見。

司法獨立與魏京生外放

筆者出席了一個討論中國進入國際貿易組織面對難題的論文宣讀大會，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舉行。美國法律教授Paul Stranberg指出中國面對八大難關，其中一項是中國司法制度不是獨立運作。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沈國放強調魏京生保外就醫是中國司法部的決定，不是行政或外交的管理範圍。這個說法令海外法律界懷疑。

如果決定魏氏出國完全是中國領導階層的主意，開門見山地說清楚，不用掛上司法獨立這個官冕堂皇的招牌，反而令人舒服，對中國司法的尊敬更沒有被抹黑，沒有產生此地無銀三百両的自欺欺人之感。

就是在美國三權分立的國家，外交國策是行政當局全權主理，總統的外交政策連司法部也不能干預如果總統是依照他被授權範圍辦事。同樣地江澤民可以引用他以國家元首的權力放逐魏京生，這樣才是光明正大。

魏京生事件的結果是中國希望以爲用司法出招，以抬高「法治」，可以說是事與願違。司法獨立不可能是無中生有，是要長時期的建立，不是政治家玩魔術，變戲法。海外的評論界

也不是那麼容易被騙。

筆者在美國教授中國法若干年，最難是令洋學生相信中國的法制以西方模式運作。相反地，如果坦白指出中國的法治，以中國文化歷史作背景，不會發展成爲歐美一般的司法獨立，信服力比較高，人家接納程度也提升。

下一會的好戲是魏京生如果被香港學界邀請到院校演講，香港政府會否批准他入境？

亞裔參政與母國政治

從駱家輝回台山家鄉啓發到亞裔移民美國參政，扶搖直上，是否恐怕母國政治被牽連？駱家輝是華盛頓州長，該州是波音和微軟兩間首屈一指的美國企業的總部所在，中國是波音的首號客戶，微軟也念念不忘中國龐大的市場。以亞裔居住在美國衆多計，華盛頓州並不如紐約州和加州。

在某程度上在亞裔衆多的州競選官職並不如沒有衆多亞洲人居住的州。原因很簡單，正如孫中山說中國人是一盤散沙。要依賴亞裔投票是能成氣候。相反地，母國的政治分歧更造成競選人的負累和包袱。

居住在美國中國人的團體從政見論是四分五裂。從中國大陸和香港移民的有親中和反中。反中之中又有支持民運，有些則是長期住在美國和中國脫節。從台灣來的背景更多元化，有親國民黨、民進黨、新黨。有支持李登輝，有反對李登輝。一言以敝之，總是吵吵鬧鬧，互不相讓。有些人靠中國政府或台灣政府關係致富，有些要到大陸經商，各自有議程。

就是在學術團體中，界限也分明，河水不犯井水。在美國競選爭取美國人支持，倘若走進這樣分庭抗禮的漩渦，花費不少精力，但得不到選票，事倍功半。

在美國官職如果不是透過競選得到便是被委任，染指高職者最忌被傳媒報導和國外政治勢力掛鈎，瓜田李下，格外留神。特別是有中國血統的移民後代更以認同美國價值觀念作爲疏遠中國的護身符。

最令亞裔高官尷尬的場合是一般美國人誤解他們對亞洲有專門的認識，就是他們的專長與亞洲毫無關連也被冠稱「亞洲通」。筆者也懂到不少亞裔高官對中國、香港和台灣發表些「謬論」。

股災後的亞洲新形勢

最近筆者又出席了十多個亞洲金融研討會，包括張五常教授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宣讀論文慶典。也和美國衆議員數名闢室談「政」。

假若人民幣貶值，中美貿易逆差變壞，美國朝野會大聲疾呼，中國進入國際貿易組織的困難百上加斤，兩國在討價還價上更具爭議，香港的邊緣地位更是唇亡齒寒。

香港最重要的關頭是支持全民就業，雖然樓價下滑，只要香港銀行的樓房貸款不出壞債遍地，相信評估金融機構不會將香港銀行評價向下低估。

中國華爾街集資將會出現困境。美國國會對中國企業在美國金融市場集資已開始關注。政治的「雜音」會令到不少金融財團左右爲難，成本增高。就是跨國的製造商如「Nike」也設立人權基金，企國挽回它們在海外剝削工人時壞聲譽作出挽救。

海峽兩岸形勢緊張已導致不少台灣資金流入美國，造成加州亞洲人聚居的地點的地產升值。但美國向亞洲的直接海外投資不會減少，尤其是亞洲貨幣貶值，美國的投機份子會在適當時機趁低入貨。但這些投資是非常選擇性。

中國企業的難產和破產已是海外金融刊物的頭條新聞。中

國政治家再不可能袖手旁觀。世界銀行也有詳細分析。如果中國樂意接受外界意見，解決辦法是中線（即五至十年）可見轉機。

上海的商業樓宇空置率在海外家傳戶曉。相信中國中央會全力培植上海的經濟地位，而香港唯有自力更生，靠自己保持競爭力。

在東南亞的金融危機中，新加坡似乎仍然是鶴立鷄羣，衆國皆亡我獨驕。但無可否認，新加坡也遭遇到些餘震，譬如它的鄰國向新加坡的進口會減弱，新加坡的資金不會如以前的積極輸入鄰國。

經濟學只可指出大勢趨向，個人理財則以個別例案爲準。

中國留美學生的經歷

錢寧著的《留學美國——一個時代的故事》（台灣麥田出版社出版）是記載他在留學美國六年來所見所聞（一九八九年八月至一九九五年五月）。從申請大學，美國領事館簽證，單位批准，考試，入學，讀書，生活（包括性生活），工作，交通，人際關係，融入美國社會，回流或逗留，這一切都是留學美國的中國人面對的問題。

書寫得不錯，以錢寧本身是中央領導人錢其琛的兒子，能夠坦白和公開他的思維，確是難得，其中語重深長的評語不少：「中國政府愈管不住你的時候，對你就愈好。」（頁313）「在一個講究輩份資格和充滿清規戒律的社會裏。」（頁320）「那種要求個人無條件爲國家或民族做出犧牲的東方式的傳統『愛國主義』，對這一代中國留學中的許多人已漸漸失去了召喚力。」（頁274）「對留學生而言，祖國愈抽象愈容易愛，一旦具體了，愛起來就困難了。」（頁272）

從香港到美國留學而選擇居留的人，在筆者的認識中，沒有從中國來的存在心理壓力和國家民族的情意結，讀了這書，對中國留學生的心態明白了多許多。

錢寧在書中也有不少矛盾的地方。譬如在書中頁301中，

他認為台灣留學生對讀「一個美國學位找一個工作，甚至開一間雜貨舖或影帶出租店，也就算是圓滿的人生了。」錢寧是否要求每個留學的人也要「天將降大任於斯人，必先勞其筋骨，餓其體膚」，整天要以救中國為大任？似乎他對台灣留學生存有偏見。台灣留學生在台灣和美國的成就較中國大陸留學生高，這是捷足先登。筆者碰到的中國留學生，對美國的物質生活追求不比其他華裔低。

書中的「綠卡結婚」、「異族通婚」，留學生顛沛流離，穿山過州找工作，這些題材也沒有多大可讀價值。在美國居住的留學生所碰到活生生的例子，耳熟能詳。

當然留學的目標，因人而異。誰是成功，誰是失敗，很難定斷。錢寧對資本主義也是一知半解。金錢在資本主義社會如美國當然非常重要，但在美國上層社會，有錢並非等於一切。錢寧只見到在美國初立足的留學生買股票，便認定他們和美國的價值觀念一致。美國的「個人主義」追求強烈也有團結和諧的一面。美國有窮人、吸毒、黃色企業、貪污、搶劫、強姦。沒有人說美國是天堂。以走馬看花的過客角度，書中部分反映出錢寧還沒有脫下有色眼鏡看美國。但相比《中國可以說不》，這書算是值得一讀的上好佳作。

醜化中國居心何在

要醜化中國不用靠香港電台。要美化中國也不用靠香港電台。

愚民政策是任何政府企圖美化國家的手段。首先，全國農業大失收報道成大豐收，天災人禍不准報道，迫害知識份子，封殺批評政府的異見人士，國家形勢永遠是一片大好。最後連自己也欺騙。成功以海外仇視中國當藉口，外界的報道完全封閉。國內要知道國家境內發生事故，唯有偷聽外國電台。這樣的封閉式社會有甚麼前途？

跑到香港定居的中國人，或到中國辦事、公幹、居住的香港人，根本不用香港電台替他們介紹中國的近況。如果說醜化中國，連《鏡報》的文章也應被禁止刊登。

中國境內的水災、地震如沒有在港香揭露，哪有香港人捐助救災？那麼報道中國災難是否醜化中國？誰能控制香港媒介對中國事物作選擇性報道。

筆者到國內短期講學的所見所聞，向香港和海外解釋，是否醜化中國？如確有其事，國內大學應該將筆者拒諸門外，但爲何它們要邀請我回國？在此澄清筆者從來不聽香港電台節目，但經常收看《九七透視》等優質節目。

中國拍的美化國內的宣傳片，沉悶得要命，中國使館請我看的《毛澤東傳》，演不到一半，80％觀衆已離場。比較具有娛樂性的《鴉片戰爭》也缺乏叫座力。

因爲中國以往刻意美化自己，脫離現實，才令外界認爲她是「狼來了」叫得太起勁的牧羊童。中國謹記不要聽信國內老糊塗之言誤國害民。

再論大學畢業生就業市場

五、六年前美國大學畢業生就業市場曾經出現不景，從筆者的觀察香港正面對同樣的問題，將有以下情況出現。

有能力再在學府逗留的畢業生可供讀碩士，或法律、商業碩士這些可增加市場競爭力的學位，尤其是一些注重中層管理訓練的大學實用課程非常吃香。從海外經驗所得，大學也是「待業」人士的過渡避難所。

有些是「豬頭骨」的職位變爲競爭對象。譬如以前沒有大學畢業生有興趣「充軍」到黑龍江，離鄉別井，現在爲了「五斗米折腰」，找些次選的職位。

以前大學畢業文憑已是「護身符」，以學歷來說便足夠。當人浮於事之際，懂門路，人際關係學便派用場。當文憑不值錢的時代出現，文憑以外的因素便是僱主招聘條件。

大學畢業生碰到的「入門」問題是僱主要花費金錢和時間訓練他們，所以不少美國大學生在未畢業前在課外或暑期實習，希望能夠增加些學府以外的實務經驗，連帶所及，一些暑期兼職位置也吃香起來，特別是些有訓練性質的崗位。

香港各大學的畢業生還要和一些海外大學回流者競爭。而後者可能長輩在香港中上層社會薄有名望和有社會人際關係廣

泛；而本土大學生來自中下階層，本地生在依賴「人面」打進企業會吃虧。一般平庸本領的大學生要獲得取錄，靠親戚後台更形重要。

以前不吃香的科目，如護士、工程和醫療技術員、電腦操作員，因爲人才奇缺，可能變成有吸引的行業。就業市場變化是走在社會經濟的前面，若要生存，衆大學畢業生謹記這道理。

美國第一

當亞洲金融貨幣風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之際，美國成爲經濟的一枝獨秀。美國的雜誌報章這回「自我」膨脹，篇篇文章「自我」讚不絕口。

誰說日本管理一流？誰說甚麼「品質圈」所向無敵？誰說亞洲四小龍是經濟奇跡？實在是不堪一擊，美國企業短視是壯士斷臂。美國人沒有日本人的儲蓄？對，美國人的花費是刺激經濟。美國的雄厚金融市場首屈一指。美國的民主作風遠近馳名，美國的高等教育，美國的高科技，美國的人才，美國的政制，總之是一大堆自圓其說。相信未來五年，美國佬的氣焰和驕傲，將達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以來的另一新高峯。

在國家人才的培養，筆者對美國是口服心服的。別的不提，美國國民捐款給不同形式的高等教育可是說舉世無雙，香港應該學習。從集資到風險資本（venture capital）的選擇性高科技投資，美國的基金多元化，這些金錢與科技凝結的力量，資訊和人才的高度結晶也是美國人值得自豪。

美國人沒有英國人的尊崇傳統，故步自封，懷念昔日帝國的強盛，而不遠瞻未來。亞洲人對制度的健全化較美國落後，亞洲仍然是以賢人政府作爲最佳選擇。筆者服務於美資大機構

有年，深明美國人對制度的改進，在於人選技術才幹而非人事關係，這是亞洲企業值得借鏡的。美國人可以標榜一個從零開始的新移民，布衣卿相，或出掌大機構，表現出她是一個人才的大熔爐。只要你有才幹，美國給你平等的機會，這才是美國第一。

羣衆心理與政府政策

禽流感風波是羣衆心理學中所研究的「羣衆歇斯底理症」（ Mass Hysteria ）的一種表現。香港政策處理禽流疫政策的對與錯，可以作爲操縱羣衆歇斯底理症的成敗。但是政策的判斷不可能原全由染了「羣衆歇斯底理症」的社會作準。

譬如出現銀行擠提，並不是金融制度崩潰，而只是銀行客戶產生信心危機。政府有責任平息羣衆的歇斯底理症，但不可能干預健全的金融制度。

信心危機頻頻出現，也反映政府在推行政策上失當。數年前美國的儲貸銀行（ Savings & Loan Instituitions ）出現大規模的倒閉，政府把他們的資產賤價而沽，但沒有如香港的銀行擠提出現，可以證明政府的政策高明之處。政府擔保十萬元以下的存戶退款，一般百姓沒有恐慌性的提款，反而是有秩序的解決。可見香港式的「羣衆歇斯底理症」是可以防止的。

香港地少人衆，「羣衆歇斯底理症」的蔓延快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特別是中下階層不滿的情緒要找尋渠道發洩，政府的觸覺要敏鋭，對症下藥，安撫情緒，治標治本，兩手準備。

傳媒是否加油添醋，將「羣衆歇斯底理症」惡化？筆者認爲傳媒只是傳遞訊息的媒介，不是原兇。譬如發生銀行擠提，很

難想像是由報章鼓勵讀者可以到銀行提款。傳媒爲了爭取有新聞價值的報道，報憂不報喜是職業習慣，政府不宜用高壓手段控制，應保持處亂不驚的態度。

朱友藍的哲學

朱友藍在香港總商會演講，勸喻外國商人到中國經商，要明瞭國內文化，入鄉隨俗，入境問禁，理所當然。

但是朱氏忘記了外商在中國的容忍程度是有限的。中國的口號是「平等互利」，但當利潤和成本相差太遠，外商對中國便不感興趣。

簡單如追討欠款無門，動不動便要找朱鎔基出面干預，這是人治社會的典型辦事方式。是否沒有渠道接觸朱鎔基便是永無翻身之日！這樣的作風和中國封建時代，一介蟻民要尋冤得雪，須上書中央有甚麼分別？外國商人不習慣或不適應中國的一套，是否中國應改變？還是外商應調節？

中國不要以爲有十二億人口的市場外商更「流口水」。倘若中國是風險高的地域，外商要求的利潤更高才有興趣跑到中國來。市場價値並非絕對的現象。

外商習慣了吃牛柳、沙律，中國不能強迫人家吃臭豆腐、南乳，無論閣下的臭豆腐如何香噴噴。

當中國市場愈是陌生，愈難打進，一些「中介人」便應運如生。這些「中介人」良莠不齊，不少自稱有特殊關係，可直達朱鎔基，但他們的「關係網」則無從稽考，信者得救。眞有辦法者

替外商解決了困難，外商也不會欣賞中國的「封閉制度」；騙去外商金錢仍然未能解決困難，更令外商卻步。

朱友藍應該檢討對待外商的作風，而不應怪責外商不懂中國的商業文化。懂中國商業文化的人如筆者，也要搖頭嘆息。

高薪打工仔面臨失業

別以為月薪十萬、生活優哉悠哉的高薪打工仔心安理得。筆者碰到數名這些高薪一族私下大吐苦水，他們想知道美國同類人士如何應變面臨失業和如何自保。

在美國，不少夫妻是「一家兩職」，夫婦自力更生，一個失業還有一個在業，危機可由另一半承擔，共渡難關。

美國家庭的儲蓄少，不少是李白信徒，「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外國人一般沒有儒家思想的階級觀念，一到失業，便放棄體面的包袱，從零開始，職業不分貴賤。大學教授去當售貨員，經理出任「行街」。不少有企業管理經驗的經理以一半薪金當不牟利團體的總管，美國地大人疏，不少人離鄉別井到別地覓食。

美國人的善變適應，香港的中層人士應學習，譬如增加些電腦技術、學普通話、到大學校外課程重溫課程、投稿報刊。筆者兒子就讀的中學中，不少科學教師是國防工業收縮其中被解僱的工程師，正是「馬死落地走」，天無絕人之路。

正如同文曹仁超說，要懂得積穀防飢，不懂開源唯有節流，謝絕高級餐館，子女海外留學可能要變掛，申請本地大學，每年外埠遊覽轉到海洋公園。找職位不要斤斤計較，薪酬

或頭銜，散工照殺。

一九九八年是居安思危的一年，不少高薪商界人士戰戰兢兢渡日，老闆級收縮開支，必然向高薪者大開殺戒，人人自危。

失業並非世界末日，即使美國總統離任也要面臨失業。每個人最低限制應該有六個月失業的「糧餉」，失業期間應保持身心平衡，積極找尋新機會，香港還是一個充滿希望的福地。

再論ＡＯ文化

筆者拙作前文「ＡＯ文化面面觀」刊登後，意料不到贏了不少衙門內外的共鳴，當然有高官面斥筆者對ＡＯ文化認識膚淺，外行人胡言惑衆。

事實上，筆者對ＡＯ制度的優點也非常欣賞，譬如以廉潔計，他們是亞洲其他地方難比較的。但是在專業精神方面，其實可以改進的地方仍很多，只要在技術上改良，簡單如在調職時接位者有五年任期；在上任前增加新職的專業知識；或安插中途由其他專業領域轉行的人士。這些措施可以將政務官的系統多元化，一則可增加士氣；二則政府和外界有「活動門」，兩者得益，何樂不爲。

ＡＯ過檔政府專業部門當首長已是有先例可循。現在的新聞處處長及人民入境事務處長就是眼前成功的例子。

政府是一個龐大而複雜的組織，掌握一個部門的運作並非易事。因此頻密的調動已是不合時宜的措施。如果在商界，聘請一個行外人士當首腦是不可想像的，何以在政府則可行？在情在理，都難成慣例。

在大型律師行中，調動只是限於低層的「初哥」律師。學習過程就是在外交界，調動也沒有ＡＯ制度的頻密。

至於調動能否防止建立「山頭主義」則見仁見智。在一個公開的政府架構中，如美國，從來沒有人擔心「山頭主義」的存在，因爲權力來源自四年一任的總統和經常變動的參衆兩院。換言之「山頭主義」和「通才領導」可能是魚與熊掌。

爲甚麼在這動盪的時刻才質疑文官制度的存在價値？理由很簡單「港人治港」的成敗是視乎治理香港人的素質。

美國人眼中的亞洲金融風暴

以亞洲金融風暴作主題研討會成了新氣候。在美國，東西兩岸有不同的看法。東部的專家（如在國會聽證的聯儲局主席格林斯平和財政部長魯賓）以爲亞洲的經風波對美國整體經濟沒有產生令當局值得關注的影響。

但在西岸不少評論觀點不同，他們認識到以太平洋沿岸的三個州（加州、奧納岡州和華盛頓州），50%以上的進出口是和亞洲有關連，雖不致是唇寒齒亡的親切，但波動是難免的。

綜合美國西岸的觀察有以下的結論：

一、美國和日本應否共同或分別負上責任防止亞洲經濟進一步惡化。美國恐怕亞洲出現社會和政治的動盪，特別是香港、南韓、菲律賓、泰國和中國出現新的政治領袖。極可能在馬來西亞和印尼的選舉中，在位已久的總理不能連任。這些新面孔是否能夠獨立地解決國內的問題成疑問。

二、在未來的一至五年，美國的出口到亞洲會減退。同樣，美國在亞洲的直接投資仍可能採取觀望態度，但美國出口貨品的價格不可能下降。以美國出口總值計，佔全國的經濟只是小部份。亞洲市場並非亞洲人自以爲那麼重要。

三、透過國際金融基金向亞洲注資將成爲國會的爭議項

目，美國和亞洲的貿易差距會增加。

四、亞洲的民族情緒會被當地政客挑起，製造出美國是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者的形象。

五、反通脹出現的可能性極高。

六、亞洲企業在美國的投資縮小，亞洲資金退回到亞洲國家。特別是美國的高科技產品的出品會減少。

七、中國經濟地位是一個未知之數。中國國企重整的成功與失敗，極可能是人民幣貶值的導火線。美國學者一致公認無論亞洲，特別是中國，不可能依靠出口來解救國內危機。

八、亞洲各國應檢討政治制度的內在缺點，進行改革，否則經濟將停滯不前。

假如香港還是殖民地

筆者被一名美國大報的編輯問到口啞：「假如今天香港還是英國殖民地，政府管治和特區如何比較？」首先，筆者教訓了他一頓，歷史是沒有「假設」的存在。正如一個英國外交家說：「天主只給我們一條試管作實驗。」言下之意，是政府施行的措施推行後，不能從頭再來一次，試驗其他辦法。治國不是在實驗室內進行科學考證，等於毛澤東說搞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首先，值得商榷的是，治港的班底是否有足夠的魄力和經驗管治特區？這個問題關乎在主權回歸後香港甚至海外的期望是否和英治時期一樣？從選民登記冷淡的反應和一般對民生關注的熱烈舉動，包括五月廿四的高投票率顯示出羣衆希望選擇投票產生立法會議員作爲他們的代言人。用集體示威方式向業主要求減租，也是史無前例。倘若集體談判取代合約的神聖，令人耳目一新。筆者當律師的經驗所得，業主可以選擇商業租戶的利潤或收入的百分率當作租金，只有這樣業主和租戶同舟共濟，否則在法理上業主是不會被租戶威脅毀約而減租。這是合約的神聖。

在香港不少租戶被高昂的租金所累，在結束營業清貨大減

價貼士：「無良業主」的告示，羊毛出自羊身上，業主也是靠租戶維生，何來無良？

和英治時期的香港比較，不少變化也出現眼前。以前英皇室訪港是夾道人羣揮動英國旗歡迎。現在中國領導人到訪，行程秘密，警衛森嚴，是否兩國的處理手法不一樣？爲甚麼楊尙昆、喬石訪港不可以讓羣衆夾道歡迎？

不是筆者對特區政府苛刻的批評，而是從冷眼旁觀中，看到假如今天還是殖民地，情況可能不一樣。

企業監察崩潰

企業監察是企業管治（ corporate governance ）中最重要的一環。假若香港的上市公司出現的倒閉危機在美國發生，股民一定大興問罪之師，將公司的董事告於法庭，控告他們集體失職，更嚴重的甚至是欺騙股民。

筆者參加了數個企業管治的研討會，明瞭到亞洲企業最缺乏的是企業監察的觀念。譬如，上市公司法定的非執行董事忽略了他們的責任，隨便讓企業行政人員濫用企業的資產，投資高風險買賣。企業中的核數委員會（ Auditing Committee ）如同虛設，對企業賬務管理和資金運用的核對全不關注，簡直是管理階層的「幫兇」。

一個健全的金融制度，除了官方的監管機構能夠發揮「外在」（ external ）監管，企業內部的「自律」（ self-discipline ）更重要。

「物必先腐而後蟲生」，亞洲企業董事局是「朋庇為奸」的「老友式」互利制。一間企業向外界招請非執行董事找些相熟，不會向董事局構成威脅的商界或知名人士參與。出任非執行董事的名譽蓋過實質上監察的責任，試問多少非執行董事眞正在內務上曾經挑戰企業決策人的判斷，而投下「不同意」或者「不

信任」票？甚至退職抗議？

美國是有比較公開和健全的企業監察。首先，投資顧問行業的分析員對「賬面」以外（ off the balance sheet ）的企業資產管理極之關注。上市公司聘用的主管階層知識和操守，是他們深切研究的項目。美國的各種傳媒也極之主動和苛刻批評企業的表現。

在美國，因爲有銀行存款賠償保險制度，任何銀行主管在聘用前先得政府部門批准，才能上任。監管銀行的政府部門，除了州政府，聯邦政府中有六、七個之多。到銀行查賬的核數員如穿花蝴蝶。銀行僱員中有指定的「遵守職員」（ compliance officer ），如果有違例行爲被揭露，「遵守職員」會惹上「刑事責任」。

在亞洲的開放任性的毫無監察制度下，不少可以及早防止的不負責任企業活動一發不可收拾。亞洲企業的活動透明度之低，更造成企業管治的危機，企業上層架構可以爲所慾爲。

今回亞洲的金融波動絕對不會在美國發生，亞洲企業應上了一課。

母語教學與跨國經驗

自從筆者在信報寫了一篇文章支持母語教學後，被一羣關心子女前程的香港母親質問居心何在。其中一位最令我慚愧，她的論點跟所有父母一樣，包括筆者的雙親在內，他們希望子女和筆者一樣能夠在海內外接受一流的跨國教育，到牛津和哈佛進修，到史丹福大學任教，更可以到說英語的國家執業。難道筆者能夠達到的，他們的子女不能？該讀者對筆者的稱譽，受之有愧。

事實上，在海外任教大學的華裔人士，不少是台灣大專業或香港中文中學（如培正）肄業的，數目較香港大學畢業生多不下十多倍，證明了在香港英文中學畢業，根本和在海外謀生全無關連。

說穿了，香港家長主觀上認為不能在英語國家覓食，便是沒有前途。無可否認，筆者的上一代對子女能夠順利到海外升學是一般「難民心態」和有望子成龍的期望，筆者對該作為母親的讀者非常諒解。亞洲裔移民在海外能夠名列前茅，與父母注重教育的程度有很大的關係。

英語是全世界最廣泛應用的語言。筆者更期望香港的英語水準不會下降。但不要忽視香港人中文的水準，和教育的目的

不僅是教英語那麼簡單。

一位香港律師行家已立定志向送他的子女在海外讀中學，鑒於母語教學執行在即，他的觀點和一些中上階層的香港精英相同：「看看香港哪個行業飛出鯉魚門還能生存？」

似乎香港政府提倡的母語教學，沒有多大說服力。

香港人的政治智慧

香港人的政治智慧滿分，香港人的政治參與熱心則零蛋。記得筆者在七〇年讀港大時，大學學生會會長一職懸空，無人問鼎，連參選幹事也無人問津。難道港大學生全部是白痴？道理很明顯，殖民地政府不喜歡地方精英參加政治活動。有志從政者，可考慮在政務官，當時鼓吹民主政治參與只會帶來畢業後就業麻煩。這是典型政治智慧滿分的表現。

筆者在香港和美國也幫助數位朋友競選議員。在香港，一般普羅大衆對政治的敏感性極高。別看美國人投票率高，但一般美國人投票是追隨認同的政黨路線，有不少投票者是看競選人是否樣貌端正，有「開麥拉」面孔作標準。筆者和一些香港普通百姓，如廚師、小販等談論民生，不少人頭頭是道，他們知道甚麼是對他們有利的問題，實實在在，絕不「無厘頭」或超乎現實。

香港式的政治智慧是「交換式」的。我要放棄外國居留權，沒有問題，你給我甚麼交換？高官厚祿還是香車華厦？董建華的呼喚大家「愛國愛港」，你有甚麼開價？如果政府連一個「經濟城市」也無能管治，自然把「愛國愛港」拋出窗外。不少人批評董建華缺乏政治智慧，就是他不明白香港人的「交換式」的政

治。彭定康是政治高手。在過渡期間，經濟高峯自然令願意作出政治交換的子民極之滿足，將來若出現「爛攤子」，則閣下自理。短暫的快樂換來永恒的記憶。

不同的時期有不同的政治人物出現。雨果說得妙：「你可以抗拒百萬雄師，但不能制止將成爲時尚的新意念。」

假若特區政府無從接受將成時尚的新意念，香港的政治智慧會毫無保留的抗拒。

又是文革之害？

筆者替一位從中國到美國留學、攻讀法律的畢業生在美國律師行覓得一職，他很感動地說：「在美國，美國人和香港移民的人樂意幫助他，但是中國大陸的同輩排擠他，落井下石。」

自從中國的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一切倫常人情被催毀，一般人不拔一毛而利天下。中國物質缺乏，個人上進機會有限，假若幫助了別人便是將自己機會減少，助人成爲「不」快樂之本。

在中國大陸的圖書館，書本毀壞程度極之高，不少學生撕毀書本，連累其他學生沒有資料，這是一個國內大學教授所揭露。

本來同是天涯淪落人，相「助」何必曾相識。正如筆者介紹學生就業是舉手之勞，施恩莫望報，做個順水人情，提拔後進是教授的責任，何況是血濃於水。

一位在國內從事合資機構經理有年的朋友描述中國企業內部的相示廝殺、結黨結派、爭權奪利的文化特色，的確令人感慨萬千。

最奇怪的是，筆者就讀牛津大學時的中國學生會是沒有中

國大陸留學生參加的（那是一九七四至七六年，中國還沒有開放）。中國學生會的成員是新加坡、馬來西亞和香港華裔學生作骨幹，大家相處非常融洽，投入籌備農曆新年聚餐，又舞龍又舞獅；學校嘉年華會大家穿傳統中國服出席，齊心合力宣揚中國文化，不談政治。

最近筆者侄兒就讀的美國中部一間著名大學的中國學生會在競選幹事出現紛爭，一會分成兩個敵對團體，全部是中國大陸留學生，最後勢成水火，鬧出雙胞。這個現象，是不是文化大革命的遺孽？

再論政務官專業化

英國式的專業較美國式是無師自通，注重在業中汲取經驗。美國式則重視有系統的訓練。譬如美國法律轉行任法官要參加職前的訓練，美國國家司法人員訓練中心是一個龐大的學府，全國不同地方的法官、不同資歷的司法人員要參加培訓課程。英國式的法官則沒經過有系統的在職訓練，即使香港的資深大律師只有被委任臨時大法官若干時間，便認爲有足夠經驗。

筆者建議香港政府設立公務員訓練學府。以往香港資深公務員派到英國皇家防衛學院（Imperial Defence College）或大學及美國如哈佛大學的肯尼地政府學院（Kennedy School of Govemment）和清華大學應該繼續。在美國不少政策研究中心替政府訓練人才，如上述肯尼地政府學院及蘭格中心（Rand Corporation）有博士級政府政策學位。

在師資方面，不少退休的公務員可擔任，政府架構以外的學者，企業人才也應羅致加盟，配合在職的公務員作導師。政府內部可設立研究門。

在美國國會有獨立的研究資料中心（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s）向國會議員提供不少背景研究

(background studies)。各州也有同樣性質的組織，譬如加州議會有加州研究公司（ California Research Corpoation ），公務員專業化可提高士氣，從業員可得到公認的專業資格。特別是香港脫離英國統治後，政府建立本地的訓練基地，可以有系統地訓練本港的公務員，更可在某程度上替中國訓練公務員，發揮「一國兩制」的精神。

合約神聖與市場經濟

這篇是一位在港從事投資事業的朋友提議筆者「獻醜」的文章，哈佛大學法學院教授Charles Fried寫了一本叫Contract As Promise－A Theory of Contractual Obligation的書（1981年，Harvard University Press出版）。當合約簽署之際，雙方如過是以友好眞誠和沒有被壓迫或誤導之下完成交易，合約的神聖應受尊重。簽署後，即使市場有變動，不能單方面改變合約履行的責任。這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市場主導法律。單方面違反履行合約，便是毀約承擔合約中受損一方的經濟後果。

在計劃經濟下，合約只是國家督導資源分配的工具，只要監管合約的機構命令合約兩方，根據改變了的計劃，可以更改履行合約的行爲，並不算毀約。

用集體談判，增加壓力，導致合約一方放棄更改合約的條款便是違反了市場經濟規律。社會輿論更不可視這種行爲作合理和公平。

在某種情形下，法例可容許集體談判，譬如在勞資談判，工會可代表工人集體向資方商討，原因是個別工人的薄弱地位不能和資方抗衡。

法例不容許的集體談判，是違反了市場規律。法律只能保障「經濟公義」而不是「社會公義」。法官不能因爲同情租戶而准許他們毀約。同情歸同情，法理要分明。

大業主是否坐享「不平衡的討價還價地位」（ unequal bargaining position ），似乎在資本主義的普通法國度中，還沒有先例可循，很難想像香港會背道而馳。法官更不會立例（案）重租戶而輕業主。

經濟逆境如何求存

月有圓缺，人有三衰六旺。筆者曾讀過不少美國企業管理層人員被解僱後如何重振雄風的書籍。

首先，不要自暴自棄。最重要的是不要以爲失業便無面目見江東父老。一切生活起居和以往一樣，主動和積極找尋新的機會。可以在朋友的辦公室寄居，當其顧問，印上名片，一面求職，一面和以往同僚朋友保持聯絡。在這方面，美國人的「面皮厚」值得我們東亞人士學習。筆者服務的律師行合夥人被解僱，一樣可以和「前度」同僚打哥爾夫球，開生日派對。我的遭遇可能明天便發生在你身上。既然所有職位皆沒有安全感，大家都是同路人。

經濟轉型被解僱，可以趁機修讀一些課程，增加競爭力。香港工人失業，跑到街上當小販，這是代表有生存能力，發揮香港精神。

進攻是最佳的防衛，這是足球比賽致勝的道理。當面臨困境之際，更要鼓起勇氣力爭上游。尼克遜蒙羞退位總統，餘生之年還念念不忘捲土重來，晚年著書立說，周遊列國。如果他因爲「水門事件」而一蹶不振，哪會有他退出政壇後的第三春。

居安思危，有些職位朝九晚五，薪金不高，可考慮在公餘

兼職，如寫稿，教授課程，或學多樣謀生轉業技能。不少創業者起步時將嗜好職業化，譬如律師成小說家，玩電腦者轉業電腦顧問，好美食者當餐廳老闆。筆者認識一位外交官，放棄正職改任報章餐廳品評專欄作家，吃盡全球名店，亦人生快事。窮則變，變則通。留得青山在，哪怕沒柴燒。失業的金融界朋友，還要記得每天（除了周日）讀《信報》。

競選中傳媒的角色

在不少西方國家，在競選期的一切政黨辯論，要給不同黨派競選人同樣的上鏡時間，平分春色。

事實上，傳媒讓候選人有不同曝光程度，直接影響他們獲選的機，當然，在商言商，政黨或獨立候選人也要花費金錢去買宣傳政論上鏡時間。但是，如果傳媒履行服務公衆的義務，應該邀請不同的候選人發表政綱或是辯論，不能厚此薄彼，以控制曝光率以滿足傳媒的利益，無論是商業上或金錢或迎合傳媒管理階層的立場皆如此。

外國人士到香港監察選舉過程是否公開，公平和公正，亦會考慮媒體如何壓制某類在政綱上和當權派對立的候選人的不公平待遇。

傳媒選舉不報道某類政治參與者也非社會之福。譬如在台灣，民進黨初露頭角之際，以採取在立法會打架、搶咪、辱罵的極端手法去爭取媒介的注意力，這樣「先下手為強」的負面宣傳結果是民進黨知名度大增，但外界對台灣的立法會尊重程度大減，香港不應該步他們的後塵。

在台灣有賄選、買票等腐敗行徑出現。要禁絕這類行為，傳媒也需要言論自由的保障。以前有些採訪記者接受「紅包」，

但當記者薪酬高，有專業尊嚴，是不會因爲有經濟利益而胡作胡爲。

傳媒要迎合觀衆的口味，倘若香港有資格投票的羣觀認爲他們所選出的立法會議員，在他們日常生活中不能產生作用，他們也懶得理會，而傳媒更不會浪費功夫報道。

從《香港情懷》看港大歷史

香港大學的歷史便是香港的歷史。在香港大學還沒有成立之前，殖民地政府認爲有了皇仁書院（前身中央書院，俗稱「大書院」）已足夠培養統治香港的人才。這是赤裸裸的「買辦」製造廠。但民國初年的伍庭芳、唐紹儀和孫中山都先後畢業於「大書院」。

《香港情懷》一書中寫的香港大學是八十年代的高等學府，在本質上已和筆者熟悉的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的港大不同。

文灼非對明原堂的描寫細緻入微，曾住宿舍的港大學生和走讀的同輩有明顯的分別。他們對宿舍生活的留戀畢生難忘。文氏「罷課」一年當學生會幹事，似乎和一般港大學生趕着走出校園「搵食」的心態背道而馳。

明原堂在筆者就讀港大之年是以「土」著名。「土」的相反詞是「fit」。當時港大宿舍中，大學堂「賊」，聖約翰堂「斯文」，利馬竇堂「招積」，康寧堂是「散仔館」。記憶中，筆者第一年級時康寧堂的堂主是蕭若元。

最理想的宿生安排是將不同年齡、家庭背景、宗教信仰和學科的學生混爲一體，特別是一些專科學生如醫學、法律、工

程，鑒於他們的科目較狹窄，如果能夠常與一些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的同學交換知識，將畢生受用。筆者完全同意文灼非的見解，宿舍是培養通識教育的最理想場所。

文灼非對港大中文系的個人體驗和歸屬感寫得令筆者感動，特別是他在中文學會作出的貢獻和投入的精神。很奇怪，筆者多年生活在中國人的社會中對中國文化毫不關心，移民海外才在寧靜的晚上朗讀唐詩三百首，也對文灼非的《香港情懷》愛不釋手，重讀了數遍。在國外才開始明白到中國文化和歷史是值得我們保存和發揚。同樣地，香港的人脈、掌權也應珍惜。

跨國專家混水摸魚

兩個在《經濟學人》(Economist) 執筆的記者合著了一本可讀性甚高的書：The Witch Doctors: Making Sense of the Management Gurus.John Micklethwait 和 Adrian Wooldridge 作。Times Books 出版，1996。不少所謂商業管理大師其實是企業黃綠醫生，與江湖術士沒有多大分別。

就是學院派中的所謂名師，頭銜多多，但所研究的是沒有理論根據，雖然不至於無中生有，但學術上也講潮流，一雞死，一雞鳴。遠的不說，數年前大力吹捧的日本式管理生產專家，似乎已經銷聲匿跡，轉到其他項目。

該書兩作者拿了數位管理學「名士」的著作，作深入淺出的分析。其中一些是經不起時間的考驗，但因爲他們有超乎平常人的推銷本領，有等成爲一時最暢銷作家。他們更開壇講學，動輒賺到數萬元演講費。不少大企業搶先恐後地邀請他們作顧問，儼如偶像。

大約兩年前，兩個美國管理專家「出術」將自己出版的書大量回購，製造數字，成爲最暢銷書籍，希望搏得虛名，企圖把知名度提高。被拆穿西洋鏡後，反而自圓其說，自辯懂得推廣市場，可算是無恥、敗德。

管理學建基於社會科學，本身是帶有價值觀念和文化意識，很難找到放諸四海皆準的金科玉律，更難找到沒有時空限制的大道理，直接造成「信則有，不信則無」的邊緣學派。無怪當牛津大學動議開設商業管理學院時，不少校內學者投反對票，認爲商業管理學不值得在該校設立。

有些研究跨國管理的學者，著作重視觀察而缺乏考證，讀起來如《西遊記》般，只見孫悟空在翻「跟斗」，令人眼花撩亂。

亞洲——投資高風險區

財政司司長再三強調，香港並非如外界所誇張渲染那樣已是一潭死水，這是觀點與角度之不同。讀到一本有關風險資金（venture capital）的新著：Finding Your Wings－How to Locate Private Investors to Fuud Your Venture，作者是Gerald A. Benjamin和Joel Margulis. John Wiley & Sons, Inc.出版，1996年。香港如果能夠繼續保持金融制度穩定，可以成爲風險資金集結地。

從最近不少香港個人投資者被證券行「魚肉」，證明了香港的私人投資市場和集團市場跟美國不同。美國的僱員參與企業的退休保險和免稅投資成爲風尚。他們很少像香港牛頭角「順嫂」般盤踞「金魚缸」前，按電腦按鈕追踪股市行情。相反，美國的集團投資企業成行成市，擁有的資金富可敵國，衆「錢」成城。香港應該考慮向同一方向進發。

問題出在亞洲被歐美金融視爲高風險地。一位金融界資深專家透露，有遠見的美國金融企業可能正在趁火打劫，洞悉亞洲股市不振和企業缺乏資本，以賤價出售給美國集團。如果香港的股民能像美國一樣集資，可以將劣勢扭轉。既然打不過它們，唯有和它共榮。

風險資金是一個嶄新的觀念，在亞洲是否流行還是未知之數。如果華籍人士還停留在家族企業運作和非高科技而勞力密集的工業，似乎將水土不服。有異於美國投資集團的龐大和高淨產人士的選擇性投資興趣，亞洲還要成長。倘若成功，香港將走在亞洲諸國之先。

律師的薪酬

跟香港法律界行家和教授閒談，話題自然離不了律師的薪酬，似乎名成利就的從業員和潦倒的「蘿底橙」，活在兩個不同的薪酬社會。有從業不到十年的「大狀」自購辦公廳兼用三千萬元自置居所物業；亦有新進「大狀」要靠補習英文才能維持生計。有出價月薪四萬元的跨國律師行招聘見習律師找不到適合人選；也有八千元月薪的見習律師職位，數百人申請爭一職位。

如果以薪酬論本領，克林頓是最倒霉的一個，他活了五十多個年頭也未曾自置居所，任州長時年薪四萬，靠執業的「愛人」養「夫」活「女」。

香港的社會風氣是完全以一個人薪酬衡量本領。當法律教授自然不能和成功的律師比較。如果認為這個制度不合理，人家會批評你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主權移交前，香港政府人力統籌官員估計香港律師會出現大量移民。結果是相反方向，不少「外勞」律師湧入，而移民者小貓兩三隻，回流者大有人在。

和一些大法官閒談，他們也感嘆香港的高薪律師對加盟司法部不感興趣，在美國有才幹者出任公職是有理想和政治野心的律師。筆者在史丹福大學的同僚中，不少自知如果放棄執教

鞭而下海，肯定薪酬倍升，但是人各有志，還是以作育英才爲己任。

所謂物與類聚，香港資深律師著書立說的比例，和歐美同業比較簡直是難成氣候。以前怪責殖民地政府不主動培養法律研究，今後是「一國兩制」的特區，筆者還沒有看到有甚麼轉機。

香港政府整天叫嚷香港有高質素的服務行業，但是證據拿不出，從跨國宏觀看，香港的法律界只能培養金錢掛帥的下一代。

前人作孽，後人當災

莎翁名句：「前人作孽，後人當災。」（ The evils that men do live after them. ）。這次特區政府選民登記反應冷淡，是拜魯平和董建華之賜。前者指香港是經濟城市而不是政治城市，後者的關心民生不理政治，反映了香港民眾集體對政治冷感的趨向。

如果一九九七年下半年是「威照示，行照遊，議照抗」，但一九九八年的上半年，假如香港特區第一屆立法會選舉門堪羅雀，是否代表市民選擇「不平則鳴」的渠道，捨正路而用旁門？但如果選民熱中投票支持民主派，又是否對政府投不信任票。

從羣眾心理學分析，香港的抗議是以「項目式」反應做中心。昨天政府殺鷄行動，今天鷄販抗議，表面上這完全符合言論自由，但事實上表現出在政府推行策前，諮詢上缺乏溝通。

當然，只有天堂上的政府才是完美的，它的名字是烏托邦。以筆者愚見，特區政府又要馬兒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態度，製造出無可適從的局面：一則鼓勵市民投票，但又恐防人民參與對抗性的政治鬥爭。

香港以往的政治智慧（ 之不足 ）不值一提，譬如殖民地時代鄧蓮如的「共識政治文化」，簡直是侮辱了市民的智慧，任何

一個修讀過政治課的一年級大學生，也明瞭社會是充滿利益衝突，就是馬克思也提到階級鬥爭。

社會的共識是基本上承認了衝突的存在和需要。這一點是董建華的商人治港的政府要體會的。政府不能夠期望政治冷感的羣衆關心民生。

律師在金融界的地位

在美國的金融界，接受法律訓練的專才佔有極高的比率。如美國財政部部長魯賓，他是耶魯法學院畢業，曾短暫在律師行工作，轉行投資銀行家，在高盛任合夥人，再跳槽政府，入閣為財長。筆者數個牛津大學法學院同窗先後退出法律界，在英美及香港金融、財經界大展拳腳。

金融界招募和應用法律人才從兩方面着手。證券金融是被政府監管嚴密的行業，法例複雜而條文極多，法律知識較會計還派用場。第二，不少證券產品上市或向市場出售，投資銀行家依然靠律師起草公文、招攬書（prospectus），合同、擔保、抵押等文件。在討價還價的商討中，律師和銀行家並肩作戰，一切細則有法律後果，有法律知識的銀行家可事半功倍。

以香港和美國金融界市場的規模，人才和產品種類比較，簡直是小巫見大巫。

香港證券市場的專業化歷史甚短，資深從業員有高深學歷和專業訓練的有限。唯一增強實力的途徑是依賴外援。在紐約提供財經專門訓練的機構如Institution of Finance、紐約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等，人才濟濟。

即使加盟一些著名大規模證券行當分析員，也要經過激烈

的競爭，須有系統的訓練，和長時間由初級向上爬，老練的專家薪酬甚高，而且不少具有律師執業兼經濟學歷，不是泛泛之輩。

筆者在史丹福大學任教時，有機會到商學院旁聽金融課，院內名師如雲，登泰山才知天下小。不少教授年紀頗輕，長江後浪推前浪。就是名噪一時的美國副財長 Lawrence Summers也只有四十三歲，其他得力助手三十餘歲。經濟大師如 Paul Krugman（當時在史丹福任教）也是四十僅出頭。香港要跟進大潮流，人才是一個大問題。

諮詢制度的利弊

香港政治架構中的諮詢制度已顯露出無能之處。記憶中，十數年前，筆者在香港執業時，一位牛津大學教授替香港政府出任顧問和培訓政務官。他是筆者就讀牛津時同一學院的導師，他打趣問筆者，以我曾接受「用金錢能買到的最佳英國教育」的受益人，爲何沒有參加香港政府委任的諮詢職位？筆者自問才疏學淺，如何高攀殖民地政府？事實上，筆者公餘到大學兼職、研究和著作，充實自己。既然沒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又不能認同「當權者」的治港宗旨，爲何「霸着茅廁不拉矢」？可能香港政府和筆者沒有「起化學作用」的先決條件。

香港的諮詢制度多委任「名流」，來來去去一少撮人，令人懷疑他們沒有足夠本領和時間分身把任內職責辦好。筆者在美國一個慈善機構任無薪董事，每兩周開一次執行委員會會議。在參加之前，約法三章，倘若連續缺席三次，自動辭職。香港的名流賢達公職委任之多，試問誰能眞正認眞向一個機構付出同樣的時間和關注？

香港委任公職人士利益衝突也是世界罕見。除了專業知識，有充份的時間應付公職的挑戰，在向公衆交代中不應有利益衝突存在。在美國，不少大學校長和學者擔任公職，原因是

他們是「行外人」，沒有私人利益存在。譬如法學院學者能夠批評司法制度，但是執業律師不能，律師要依靠在法庭面前對法官謀生，利益所及，不便批評司法制度。

見到不少香港公職委任人一連串的委任履歷，不是社會之福祉。當然，樂於出任公職的人可能是極少數。政府是否沒有發掘多方面人才？或是香港政府只能局限於委任和它政策認同的人？這是香港諮詢制度中值得發人深省的基本問題。

「關係」值何價？

「關係」（英文譯作guangxi）掛在歐美商人口中的流行程度，正如娛樂界的「功夫」（英文譯作kung fu）一樣耳熟能詳。

關係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正如廣東俗語，「反轉豬肚便是屎」。關係弄得好，做生意通行無阻，水到渠成。關係弄壞了，全軍盡墨，身敗名裂，甚至惹上殺身之禍。

西方人士對東方的「關係」認為是最神秘莫測，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一位六大會計師行的高級合夥人向美國人介紹如何在亞洲做貿易，講足一小時「關係」的重要。演講完畢，一位美國聽衆提出問題：「如何得到『關係』之鑰？」亞洲講者無言以對，只能說閣下若不得到眞傳，還是不到亞洲爲妙。

亞洲專業人士花費在建立「關係」的精力是西方人士難以理解的。美國賓州大學的華頓商學院聘請了一位台灣裔教授開創新課程——海外華人的管理，似乎他將是關係學的開山始祖。

關係學在亞洲貿易的高峯期，聽衆甚多，筆者曾走遍美洲，設壇講關係學。今回亞洲金融風波，亞洲價值觀倡導者無用武之地，是否關係學也一蹶不振？

如果關係學是裙帶式的封閉思想，不值得發揚。關係不應

取代公平競爭，譬如名校取錄學生應透過公開考試。筆者任教的法學院，教授改卷不能知道學生的名字。即使是筆者任教的史丹福大學，兒子投考也沒有優惠待遇，唯有這樣，關係學不能應運而生，學校的水準才得以保持。

香港乃冒險家樂園

一些慈善名流「空心老倌」打腫面孔充胖子，在舞會拍賣皮草，高價競投，到付款之際，無「銀」以對，筆者見過不少。

最容易上當的是無知之輩，見人家卜居豪宅，出入名車，揮金如土，一擲千金，以爲是殷實商人，在任何社會皆有騙子和被騙者存在，太平山下老襯何其多。美國名言：「每分鐘便有一個笨蛋誕生。」

在金融市道走下坡之際，騙子便無藏身之地。金融騙子的慣技是將甲的錢拿來蓋乙的賬，如魔術師玩把戲，但當技窮之時，便原形畢露。

美國保障投資者的法例俗稱《藍天法》（Blue Sky Law），其原意是金融騙子可以說服無知的投資者，賣藍色的天空給後者。

解放前的上海十里洋場，紙醉金迷，稱爲冒險家的樂園，今天可以承先啓後的便是東方之珠的香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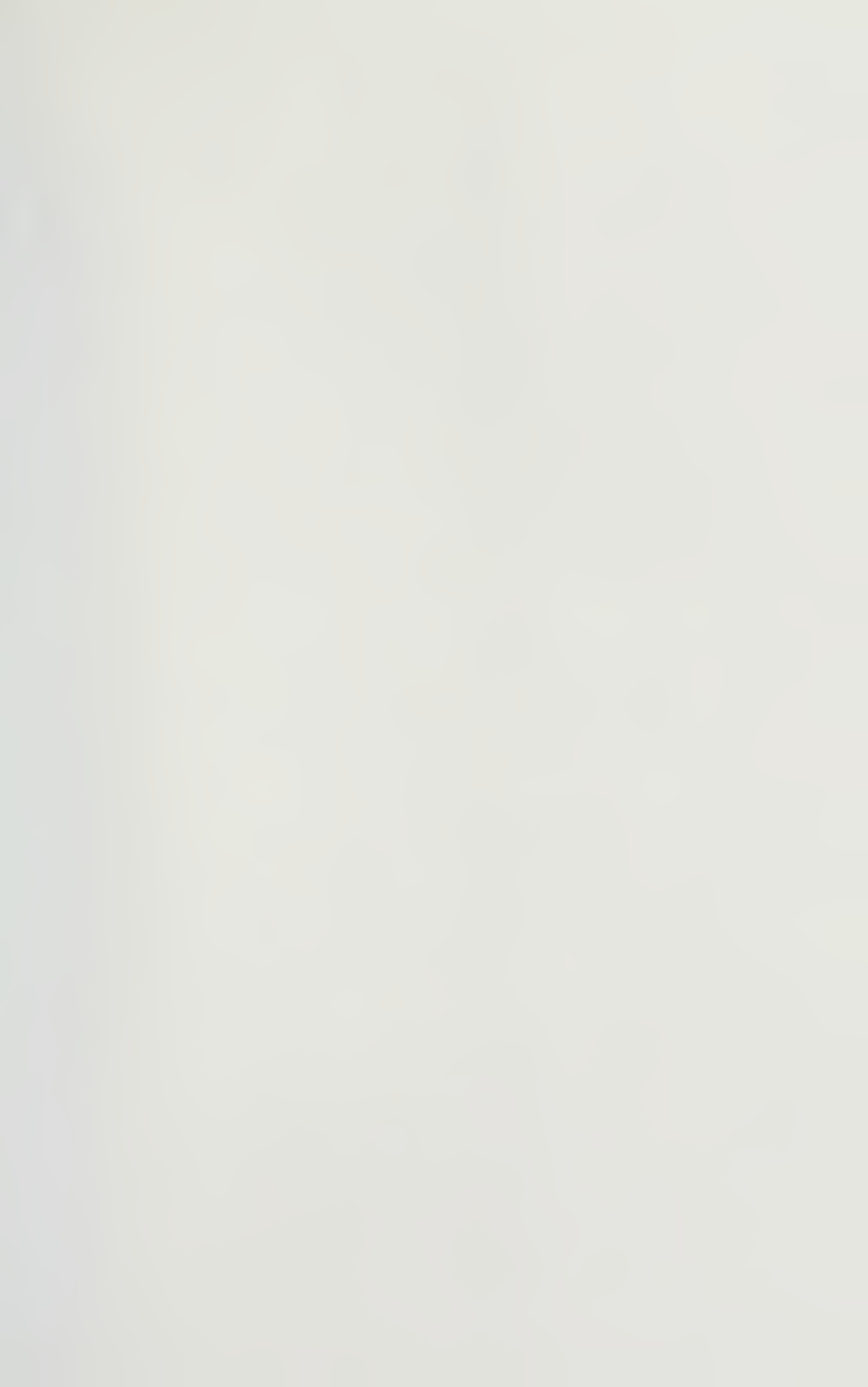
由窮光蛋到億萬富豪，轉眼間便打回原形。誰是富翁是計他的淨值而不是資產，不少擁有資產頗巨的人，如果負債纍纍，而資產不能在短期內在市場上兌現，根本上連窮人也不如。同樣地，企業出現現金周轉不靈，債主臨門不能兌現，也

可倒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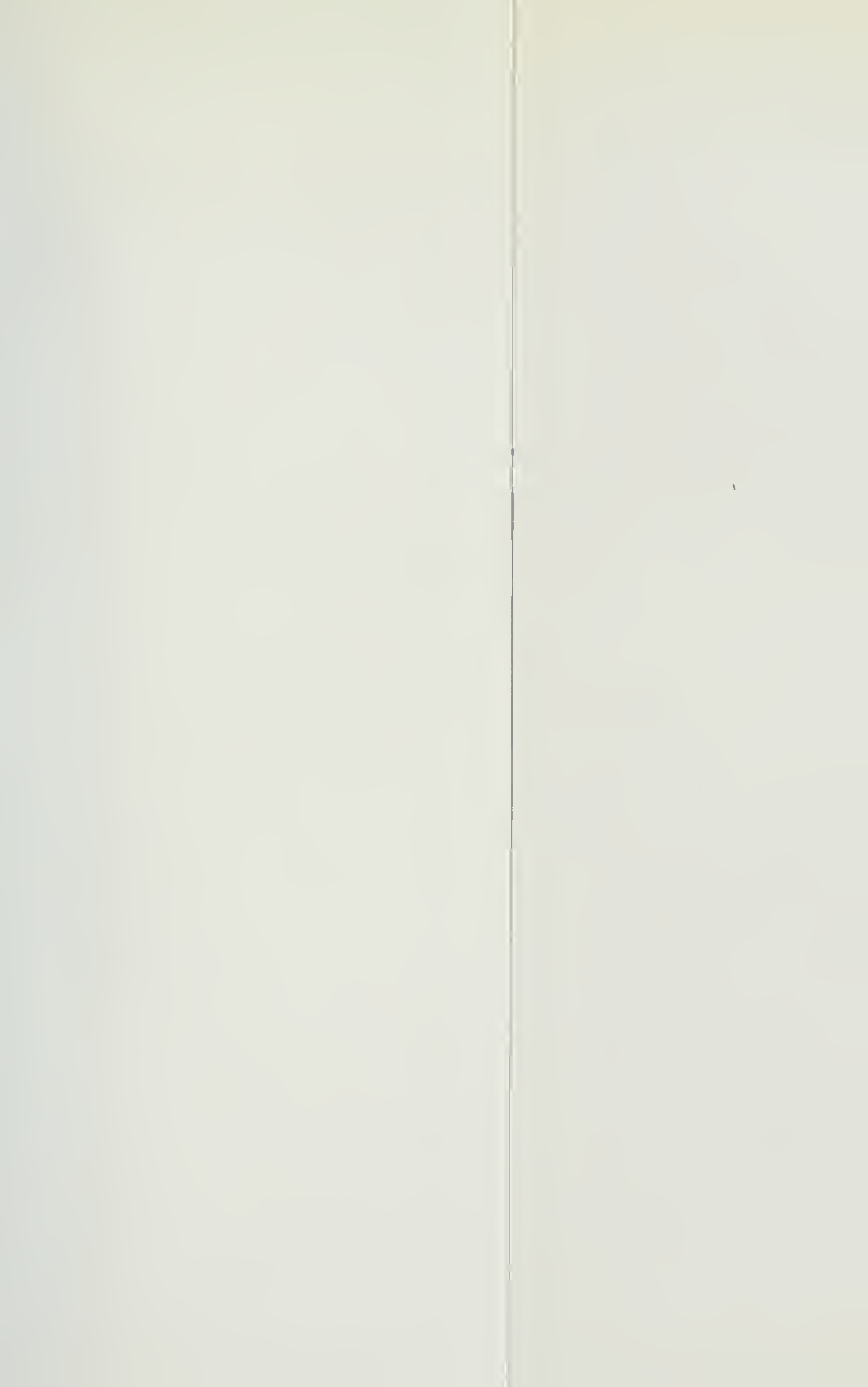
在經濟收縮時，有現金便可稱王。一些行業如明星、體壇球星先使未來錢，或左手來右手去，到要納稅之際，便四借無門。同樣地，不能變賣的產業如華廈，可能因爲「抵押」過度而變成欠債人。

高度投機性的行業是冒險家的樂園，也是他們的墓場。









本書作者梁福麟教授，美國律師行Lewis D'Amato Brisbois & Bisgaard合夥人。廣東省三水縣人。出生於廣州市。中學香港皇仁書院畢業，1972年香港大學文學士（一級榮譽）。就讀期間得包玉剛獎學金及辰衡圖書局獎學金；1974年英國伯明翰大學理學碩士，得Radcliffe基金獎學金；1976年牛津大學法學文學士；1977年倫敦格蘭寺大律師；1978年香港高等法院大律師；1981年牛津大學法學文學碩士；1983年哈佛大學法學院東亞法律研究院訪問學者；1983年澳洲維多利省大律師；1985年至1986年間，任香港大學法學院客座講師；1980年至1986年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法學研究參與者；1987年美國加州註冊律師；1987年至今，任加州羅耀拉大學法學院客座教授；1987年至1988年加州Pepperdine大學法學院客座教授；1992年至今，在加州羅耀拉大學亞洲研究課程顧問；1995年史丹福大學法學院講師；1988年至今，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中心香港文獻顧問；1998年南加洲大學法學院客座教授，1988年至今，美國國際法學會，國際法學資料，香港聯絡員；1989年至1992年間，任美國加洲律師公會國際法組執委。1993年得加州律師公會Wiley W. Manuel獎。著作：《97後香港前瞻》、《探測香港過渡前後》、《97後中港新面貌》、《香港主權移交前後》、《前瞻特區未來》由廣角鏡出版社出版，並經常在香港《信報》、《蘋果日報》發表文章。



梁福麟


ISBN 962-226-433-6
9 789622 2 4335
PRINTED IN HONG KONG
定價□港幣100元正

封面設計◇陳衛